

第十八辑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34260/08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刘云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2,000 印张：7.5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399·241 定价：0.91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回忆在湖南与叶剑英同志接触的日子·····	刘斐章(1)
抗日战争初期徐特立同志在长沙·····	黄英博(9)
记湖南《开明日报》·····	黎 澍(18)
忆塘田战时讲学院·····	邓晏如(23)
长沙文夕大火前后·····	席楚霖(41)
记张耀辰谈审判酆悌经过·····	杨宙康(49)
长沙沦陷时期日伪活动见闻·····	罗崑林(53)
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	邓一匙(62)
一九四三年日寇在厂窖的大屠杀 ·····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69)
日寇在岳阳的暴行和血债 ·····	吴健人、任伊平、刘又闻、吴荫泉(80)
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赵子立(88)
记第一次长沙会战·····	贺执圭(102)
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	罗文浪、邹继衍(113)
记第七十四军参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	罗文浪(128)
回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	陈应庄(134)
芷江受降侧记·····	严怪愚(140)
参与程潜起义活动补述·····	程星龄(145)

接管湘潭·····	杨第甫(151)
回忆湖南起义时的秘密电台·····	郑挹梅(165)
国民党三一四师积极准备起义及 被击溃的真相·····	祝 凯(177)
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	沈 舜(191)
记益阳“双十惨案”·····	蔡杞材(194)
林修梅生平事迹·····	阮观荣、凌晋良、黎兴中(200)
记北伐军勇将龚宪·····	彭铭鼎(213)
梁焕奎事略·····	梁漱溟(219)
左宗澍小传·····	左宗濂(224)
国语拼音专家黎锦熙·····	黎锦明(227)

补正·订正·质疑·勘误

坚持晚节，其乐融融·····	朱伯深(230)
关于湘雅医学院史料的订正·····	凌敏猷(232)
陈延年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俞兴茂(233)
《湘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勘误表·····	(235)

回忆在湖南与叶剑英同志接触的日子

刘梵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大火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同志都在长沙，同住在寿星街八路军办事处；起火以后，一同最后撤离火场。周恩来同志当时是南方局书记，抓全面；叶剑英同志的工作重点在军事方面。周总理主持长沙大火善后救济工作时，叶老到了衡阳，与国民党磋商如何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宜。我们演剧八队在周总理领导下，参加了长沙大火后的救灾活动。

正值长沙突击救灾工作的紧张阶段，敌人放出和谈的空气，大家心里对抗战前途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阴影，议论纷纭。救灾工作结束后，我们演剧八队仍调回衡阳。当时已是严冬岁尾，决定在翌年春节，开赴湘北前线进行劳军演出。我们每天排戏练歌倒也紧张，但一接触到敌人放出和谈空气的事，不免忧心忡忡。按理，蒋介石应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共投降，可是他始终不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真正的全民抗战，现在敌人又以和谈来引诱，他会如何呢？国共合作抗日前途又将出现什么局面呢？正是这些回旋在脑海里的疑虑，使我们产生一种愿望，很想出发湘北前线之前，得到党的领导同志给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这对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关系是很大的。于是，鼓起勇气到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我们的要求和愿望。

没有想到不久就得到办事处负责同志的通知，说叶剑英同志

可以给我们谈谈。我们十分兴奋，想早一点看到叶剑英同志。谈话的地点，就在我们住的成章中学。这是我们从长沙回到衡阳来的驻地，学校已放了寒假。时间在一九三九年春节之前。讲话内容只记得一些印象较深的片断。

叶剑英同志讲话一开始就分析了日军占领武汉后的形势。他说：不要只看到敌人气势汹汹的一面，他们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上海、太原，最近又占领了武汉。同时也要看到其虚弱的一面。敌人最大的问题是兵力不足，他们占领的地方越多，兵力不足的弱点就愈加暴露。敌人在华北、华东、华南都只能守着几个大城市和几条交通线。敌后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他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可以到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牵制他们。还可以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直到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

叶剑英同志着重指出，敌人是狡猾的，他们决不会坐等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占领武汉以后，有主张急进的少壮派，要求迅速猛攻，但他们中掌权的，知道自己兵力不足，中国又不是一个小国，不断地组织大规模进攻是有困难的，至少是在当前短期之内，不喘一口气是无法连续发动进攻的。不久前，日军到达岳阳的前锋又缩回去了，现在坚持在新墙河一线按兵不动，就是这个道理。但这并不是说，敌人已经没有力量再向我们进攻了。

叶剑英同志还指出：不久前敌人故意放出和谈空气，条件是只要国民党反共。这是敌人这次搞和谈阴谋的核心。所谓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是指此。但是，他们不会放弃军事。敌人最怕的是我们的民族团结，最怕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一团结抗日的局面被破坏，那么敌人就可以不费多大力气侵占中国。但是，敌人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要抗战到

底的，决不会退回到过去那种不抵抗外侮，专门打内战的局面了。敌人要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就要加强团结；敌人要我们倒退，我们一定要前进。敌人玩弄和谈，我们就揭穿他，坚持把抗战进行到底。

叶剑英同志说：敌人阴谋搞“和谈”诱降，既可看出敌人的阴险狡猾，又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敌人是被迫走向相持阶段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是静止不变动的。我们除了要揭穿他们的阴谋以外，关键还在发动群众，包括敌后的人民群众，要是能广泛深入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武汉失掉也不要紧，敌人玩弄阴谋也不顶事。真要相信人民，也决不会出现长沙大火这样的蠢事。

叶剑英同志最后要求我们说：你们就要到湘北前线去演戏劳军，宣传抗日，一定要宣传民族大团结，特别是国共团结。要宣传敌人有虚弱的一面，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只要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我们的演剧宣传，对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是有作用的，人家信心十足。我们想到要带些党和八路军的宣传品到前线去，散发给抗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促进相互了解，增强团结。于是，又到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去说明来意，要了一大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带到了湘北前线。

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以后，我们就开赴前线工作。先是在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军部，随后在所属二十一师侯镜如部的三个团巡回演出。在师部时，侯镜如竟集合全师军官加上师直属部队，要我作一次关于抗日形势的报告。我们认为不可放弃这个宣传团结抗日的机会，决定讲解、宣传一下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叶剑英同志对我们讲的话结合进去，结论是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就可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个师有个旅长叫艾颢，那次向我们索取《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最多，他要求系统地阅读党的报纸和刊物，并提出抗战结束后，国共是否还能合作等问题。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听说这个师起义了。

我们在前线工作了四十天，突然接到调回南岳的通知，派来接我们的敞篷大卡车也同时到达。当天集合到军部，第二天黎明出发，黄昏时赶到南岳，被安置在大庙对门的倪三泰客栈。正在分配床位时，来通知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领导在镇上南濠酒家设宴为我们洗尘，要我们马上整队前往。南濠酒家也在大庙对门，离客栈不到一百米，是南岳镇唯一的酒家。我们走上楼，看见已摆好四桌酒席，这时才知道请我们赴宴的主人竟是叶剑英同志。原来在武汉失守之前，朱总司令曾坐飞机到武汉，向蒋介石建议，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蒋介石想学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把自己的势力伸到敌后，这才有南岳游干班的创办。叶剑英同志被请来担任这个班的副主任，还带来了一个工作组。教官中有薛子正（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同志，还带有电台，住在山下一个叫做“桔盈圃”的院子里，离南岳镇不远。游干班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宴会时没有来，由政治部主任陈烈作代表。事后才知道，这位政治部主任是汤部的中将副军长，过去参加过共产党，比一般的国民党军官在谈吐上、作风上大有不同。他是当时宴会真正的主人，也是我们调南岳工作的顶头上司。陈烈陪着叶剑英同志走上来时，我们又突然发现陪同的还有田汉同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出主意调我们到南岳来，要我们配合学员的学习，每周组织晚会演出新剧目，从文艺方面

进行宣传，协助叶剑英同志在南岳的工作。当时他是政治部第三厅专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

这时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一见到叶剑英同志就包围上来，问这问那，象是久别重逢的熟人，确切点说，应该是突然见到熟悉的老领导、老首长。叶剑英同志也把这批爱国青年看成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兵”，也是相熟的朋友。大家有说有笑，他问我们到湘北前线演些什么戏？唱了些什么歌？士兵反映如何？同志们争着向他汇报。有的说，虽然是露天场子，收效还是很好的。士兵们都全副武装整队而来，席地而坐，安静得很。当演到激情的地方，突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有时，还有人带头喊口号：“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有的同志对叶剑英同志说，我们在前线还分送过《新华日报》。有一位军官问：我们打完日本，国共还能合作吗？这时田汉同志走过来对我说：“要注意一下环境，你们不要把那位中将主任冷落在一旁。”我连忙拉了几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和陈烈坐在一桌。那边包围着叶剑英同志的年轻人，还正在兴致勃勃地询问延安的文艺生活，又谈到陕北民歌，说这些民歌和抗日紧密联系起来就是好……我们这边，陈烈说：“请你们来不是把你们看成是个剧团，单只演戏。我们是请你们来当教师的，是当先生的。”我们想，这人好厉害。田汉已关照我，我们今后要在南岳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定要和陈的关系搞好，何况我们今后将直接归他领导。于是，我连忙说：“我们调南岳工作，今后在您的直接领导下，请您随时多多指示。”

当宴会快要结束时，突然有个四川口音的青年军官（很可能就是政治部的）提议要我们女同志唱个歌子。提议唱个歌，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人的态度、口气都使人联想到大官阔人举行宴会，要戏班子的旦角清唱消遣，大家很不高兴，赌气不理。一时

间气氛紧张。就在这时候，田汉同志突然站起来，笑着说：“我来唱一个。”他唱的是京戏《秦琼卖马》，音调很高昂，加上一点英雄落魄的苍凉，很有韵味。大家情绪好转。正在这时，只见叶剑英同志也站起来，很自然地说：“你们不是想听听陕北民歌吗？我来唱一个。”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更加活跃了，热情地鼓着掌。叶剑英同志那天穿的是一身灰布军装，腰间系着一根细细的皮带，脚穿马靴，身体健壮英俊，看去不到四十岁。他一只脚踏在一条长板凳上，就唱起来。

我们队的同志都没有想到，田汉和叶剑英同志会突然自己提议自己先唱起来，不但打破了僵局，而且态度很自然。这件事本身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这是一个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搞好统战工作的示范啊。搞好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抗战，而且叶剑英同志唱的还是经过改写宣传抗战的陕北民歌《开荒》：“开荒哦，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他平时说话本有点广东口音，但唱起歌来一点广东腔都没有了。

歌声才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八队同志要求他再唱一个。叶剑英同志也不推辞，接着又唱了也是经过改写的《延水谣》：“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又是一阵掌声、欢笑声，宴会变成了文艺晚会，叶剑英同志提议，欢迎“八队同志唱一个”。（叶剑英同志以后看见我们，不管是多数人在一起，还是只有个别人，总是喊“八队的同志”。我们队的同志在叶剑英和田汉同志的鼓舞下，也欢欢喜喜地集体唱了《红缨枪》等抗日歌曲，

在洋溢着欢笑的热烈气氛中，使人忘记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宴会结束时，都有些依依不舍的情绪，大家挤着争着去送叶剑英同志和田汉同志下楼，有同志在我耳边说，再请叶剑英同志

来给我们作次报告吧，这时叶剑英同志的声音掩盖了其他同志的讲话，他说：“下回要看你们的戏了。”

不久，我们参加晚会，组织第一次演出，演的仍是独幕剧，根据《最后一计》改的《英勇牺牲的杨队长》和其他节目等，演出结束后，叶剑英同志突然来到后台，他边走边说：“八队同志们，你们的戏演得好啊！”大家兴高采烈地围上来，叶剑英同志的手臂搭在叶向云的肩上，说：“你这个英勇不屈的杨队长演得不错。”叶向云对他说：“同志们想请您再给我们讲次话。”他笑着低声回答：“不行啊，这可不是我不肯讲。”叶剑英同志离开后台时，边走边高声说：“再演戏时一定要告诉我，我还会来看的。”

我们队上有个王平，喜欢收集抗战资料，他还到过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采访过，带回许多实物和照片。我们在南岳，为了揭发汉奸汪精卫，还利用这些资料，开过对比的展览会。王平那时不知道叶剑英同志已和叶向云说过那番话，又跑去找叶剑英同志，请他再给我们作次报告。叶剑英同志耐心地对他说：“八队同志，你们不要对我太亲热了，这对你们不利啊！我这个共产党是他们请来的。可是你们不同啊！要注意一下环境，注意一下工作方式。对吗？”王平回来对大家讲了叶剑英同志的这番话。大家回忆，到南岳来的第一天宴会上，是叶剑英同志和田汉同志带头打破僵局唱起陕北民歌和京戏，这次又提出要注意工作方式。大家经过一番议论，认识都有提高，懂得了既要生动活泼地打开局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和叶剑英同志公开接触过。可是我们演戏，他总是来看的，特别是从延安移植来的，内容是改造旧军人、搞好军民关系的《流寇队长》，他看了很高兴。还有前面讲过的那次小型对比展览会，他也看过，间接地传来了他对我们的鼓励。这都是调南岳工作头半年的事。

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或间接地得到叶剑英同志的消息了。南岳游下班也在逐渐地变化，传说第五大队是专门训练到敌后搞特务工作，监视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的。我们在南岳的工作已不象最初那么单纯，顺利，那么热情高涨。回忆那时叶剑英同志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青年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抗日战争初期徐特立同志在长沙

黄英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徐特立同志和王凌波同志来到长沙，住在犁头街口一家名叫临湘的小旅店里。徐老是我在长沙师范肄业时最崇敬的老师，对我的政治倾向早有所知；王凌波同志则是我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提篮桥坐牢时的难友，我们都是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判刑的。由于以上的关系，我参加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秘书，负责协助徐老接待宾客，处理来往文书，作讲演记录，等等。为了便于工作，有一段时期，我和徐老同住一室。因此，对徐老在湘任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湘代表期间的活动情况，比较了解。

（一）

徐老由陕北回到家乡长沙时，正值上海失守，南京吃紧，京沪一带人士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沙一时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许多人对战局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因此，每天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找徐老的人络绎不绝。综合来访者向徐老提出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1）抗战将来如何发展？结局怎样？（2）共产党的态度究竟如何？是真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还是权宜之计？（3）国共合作后，是否会再次分裂？对此，徐老总是根据党中央号召

抗战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耐心细致地给予回答：“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们共产党是坚决抗日到底的，是真诚讲团结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现在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至于国共合作后，是否再次分裂，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循环的，而是不断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同意分裂的，谁再搞分裂，只能自取灭亡！”这些精辟而诚恳的答复，使许多来访者消除了疑虑，对抗战前途增强了信心。

由于到办事处拜访徐老的人与日俱增，这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不安。他们迫于形势，表面上赞成联合抗日，可内心对共产党还是极端仇视，因此，时时刻刻都对徐老进行监视和干扰。省会警察局派出若干密探，轮流来办事处侦察徐老的行动。有的在周围守候观察；有的混在来访者中，装着认真求教的样子，提出一些带有敌意的问题。例如：“你们共产党讲抗日，究竟能出多少兵力？”“你们用梭镖、鸟铳，也能战胜日本吗？”有的还故意试探徐老，说：“我想去延安，可以吗？”对此，徐老都坦然作出回答，明知来者不善，还是尽量不使对方难堪。我们有些不理解，他告诫我们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党真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没有半点阴谋，有什么不可以同他们谈的呢？依我看，他们回去向主子汇报，正好达到我们宣传联合抗日的目的。”

经过一段时间，反动派对徐老光明磊落的态度和理直气壮的言辞，感到无稻草可捞，因此，对他的戒备，也就稍有松懈，不象以前那样严密了。

(二)

徐老当时已六十出头，但精力却非常旺盛。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四至六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接待来访者，便是阅读和写作。冬天，他从不在火炉旁坐一会。大家劝他歇一歇，他也只在火炉旁烘烘手就走了；夏季，他不放下工作乘凉，汗流浹背时，也只拿蒲扇摇几下了事。有时我们忍不住问他不怕冷热的原因，他说：“一个人做事要精神集中，全神贯注，这样就会既不感到冷，也不感到热。”据我所知，徐老在任八路军驻湘代表期间，他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协助恢复湖南自“马日事变”后被破坏的党组织；与国民党省政府交涉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发展进步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这里谈谈徐老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情况。当时不论是学校或其他单位邀请他去演讲，或者是对一些人的谈话中，他总是全力以赴，认真地抓住时机，理直气壮地阐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他在讲演和谈话中，经常有这样一段话：“如今对日作战，单靠国民党一党不行，单靠共产党一党也不行，尤其是单靠军队更不行。必须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绝对不许动摇、妥协，而要坚持持久战。”同时，他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常说：“有人认为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我们的部队素质也不如敌人。这场战争打不赢，难免不亡于日本。我认为这种观点对抗战是极端有害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可以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至于有人认为‘日本

帝国主义没有煤，没有铁，我们只要坚持六个月，日本就会崩溃，那也是不合乎实际的。敌人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是事实，但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对于持久抗战也是极其不利的。”

徐老在长沙公开讲演，除首先在银宫电影院（现改新华电影院）公开讲演一次外，我记得还有如下几次：应联大（西南联大前身，迁湖南时设在韭菜园原圣经学院内）邀请两次；应中央戏剧学院、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学联妇联等邀请各一次。在银宫讲演的题目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此外还应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邀请，每星期三去讲演一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徐老每次讲演，会场上总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讲完后，总有不少听众不愿离去，有的挤上台，围着徐老请教各种问题。徐老总是耐心而详尽地答复，直到对方满意为止。有时徐老出了会场，仍有不少人同他边走边谈，十分亲切。

除了在大会上讲演以外，徐老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界举行的小型座谈会。如学术界的薛暮桥、李仲融、杨东莼，文艺界的张天翼、邵荃麟、曹禺；妇女界的罗琼、王庚琪、梁淑德、孟素等，都曾邀请徐老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各种座谈会。至于个人的约会那就更多了，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徐老总是按时赴约。黄炎培由沪来长后，当即邀请徐老到他住处深谈两次；张西曼、赵君迈等路过长沙，也都邀徐老作过多次长谈。此外，专程来长拜访徐老的人也不少，如著名生物学家、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董爽秋教授，曾与恳谈多次后，请求徐老介绍他和儿子去延安参加革命。徐老认为他在中大任教对人民更有利，就进行了劝阻，只同意把他的儿子董玉清送往陕北（学习后参加工作时牺牲）。

当时有不少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要求徐老推荐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徐老把这一情况向延安作了汇报。延安指示要慎重吸收这批力量。徐老根据中央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吸收了一批有志青年，设法把他们送到了延安，在短训班学习革命理论。

徐老还注意支持进步报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田汉主办、廖沫沙主编的《抗战日报》上的重要社论，都是经过徐老过目、修改后才发表的。徐老还亲自为该报撰写过多篇社论和专文，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淞沪抗战的教训与国共合作》，同年十二月发表的《抗战到底与自力更生》等。经常向该报投稿的青年胡大愚、封凯等，也常将稿件送请徐老审阅修改。黎澍、潘开茨、杨荣国等创办的《观察日报》，也曾得到徐老的鼓励与协助。该报创刊时，黎、杨曾多次向徐老请示办报方针和报型问题，徐老当即将党中央的抗战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交给他们，还关切地问他们办报经费和印刷困难等问题。当听到都已有着落时，他才放了心。报纸出版后，逐日送徐老一份审阅。该报的重要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大都经过徐老过目修改。中苏文化协会从南京迁来长沙后，根据徐老建议，办了一个名叫《中苏文化》的刊物，撰稿者都是一些进步人士，如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萧敏颂等。徐老也为该刊写过好几篇文章。此外，徐老对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其他一些群众组织以及进步人士创办的各种刊物，都曾给予积极支持。“妇女抗救会”罗琼等主编的《湖南妇女》，吕振羽等主编的《今天》，徐老都亲往参加过编辑会议，有时还撰文支持。

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同时，徐老还鼓励和支持各界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为了适应当时文化界广大人士的要求，在地下党的策动下，首先成立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

的建立，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在成立会上通过宣言和组织章程时，就出现了意见分歧，敌我阵容分得一清二楚。当选举理事干事时，国民党省党部派来不少文化特务蓄意刁难，但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这与徐老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

当时湖南关押了不少革命同志，徐老到长沙后，即找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交涉释放“政治犯”。张虽满口答应，但拖拖拉拉，执行不力。徐老反复耐心交涉，张才应允将被关押人员名单交由省政府下令释放。可是下面又层层设卡，释放一个同志，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排除多少干扰。可徐老不厌其烦，常说：“这也是一种斗争嘛！当然不比战场上的战斗，那种战斗靠流血，这种战斗靠耐心，要耐烦同他们交涉，否则，一拖就完了。”

在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斗争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对一些“重要犯人”，国民党方面总是推诿说“没有此人”，“要查查看”，“可能改了名字”，等等。尽管如此，经过徐老耐心说理，加之迫于舆论压力，大部分同志都得以出狱。如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同志等三十多人，从地方监狱押到长沙陆军监狱后，徐老立即去探望，代表党和八路军慰问他们。并向他们讲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形势，要他们耐心等待恢复自由。这些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徐老立即将乔信明等同志的名单提交省政府，要求根据两党协议，一律从速释放。但省政府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将他们移往桃源县监狱关押，并传说有被杀害的可能。徐老再次赶往省政府据理力争，他们才不得不指令桃源县将乔等释放。又如王自申（解放后曾任中南政治学院院长

长)、黄涛、李服波等同志，都是经过徐老多次交涉获释的。先后被营救出狱的同志有数十人。大多数同志因倍受折磨，疾病得不到医治，长期缺乏营养，出狱后都须经过一段疗养，才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徐老对他们十分关怀，总是多方慰勉、照顾，这些同志感到了党的温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四)

徐老在工作之余，还刻苦学习，坚持不懈。他常把自己看过的，有教育意义的书刊或文章推荐给我们。他在百忙中除阅读毛主席一些单篇文章外，还阅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联共（布）党史》也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我当时读了一部都德《世界政治》，徐老看到后，拿去读了几遍，对书中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同意的观点，就在上面圈点，不同意之处，就在天地头上作眉批。徐老还重视对革命理论的探讨，撰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这篇文章，曾一再修改，交由陈碧莹（我的爱人，当时在办事处任收发）誉正，先后达五六次之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联合旬刊》上发表。可见徐老对读书、写作，是十分认真而又善于独立思考的。

(五)

徐老在长沙的生活十分简朴。当时他穿的是从延安穿来的那套灰布棉军服和另外两套单衫，里面是一件棉纱衣。吃饭时，总是大家都上桌了，他才放下工作来就餐。并不止一次地对大家说：“以后不要等我啰，我晚来一点吃是一样嘛，会吃饱的。”徐老最喜

欢吃蔬菜，不爱吃荤菜，特别是肉类。他曾对大家说：“红萝卜营养价值最高，不要烧得过烂，破坏了所含的维生素。”

在日常工作中，徐老对工作人员要求是很严格的。有一次，办事处收到印尼华侨寄来的一批捐献物资，全用木箱装着，上面商标是英文，大家不认识，不知里面究竟是何物。于是撬开一箱，原来全是虎牌万金油，大家随便拿了一些。徐老知道后，制止说：“这些物资是爱国华侨远道捐献给前线抗日部队的，我们丝毫不能挪用，请大家赶快放好，钉好箱子，要原封不动地运到总部（指八路军总后勤部）去。”大家都照徐老意见办了。

徐老对我的教育也是严格的。有一回，徐老的一位朋友（也可能是学生），镌刻了两颗精巧石章赠给徐老，印文为“师墨”、“徐特立印”。他非常高兴。随即命笔写了两幅小横披，盖上了这两颗印章。一张给我，上面是：“改变自己的思想，不是反省而是革命。”另一张给陈碧莹，上面写着：“我们不只是要说明宇宙，主要的还是要改造宇宙。”字迹苍劲，意义深长。这不仅在当时给了我们莫大的教育，而且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也是一盏指路明灯。

一九三七年徐老六十寿辰时，毛主席给徐老的祝寿题词中写道：“……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题词是写在一块鲜红丝绸上的。徐老十分珍视这个题词，把它珍藏在一个小包包里，随身带着，曾拿给我们看过。毛主席对徐老的高度评价，是完全符合徐老一生的实际的。

徐老从一九三七年冬回到长沙到后来离开，不过两年多时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他的积极努力，湖南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很快，停顿十年之久的湖南地下党组织恢复了活动，一批久陷囹圄的革命者恢复了自由，重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不少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徐老在这段时期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时，湖南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上有日本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特务、汉奸监视，生活条件也很差，可徐老全然不顾，并常说：“冒关系，我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记湖南《开明日报》

黎澍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先后攻占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估计国民党政府难以再战，乘机发表诱降声明，劝其参加树立“东亚新秩序”。当时长沙盛传日军将从南北两端进军，打通粤汉线。事实上，日军如果这样做，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国民党军不会抵抗。人们预料日军此着成功以后，湖南即将被分割为两半。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迁往沅陵。中共湖南省委迁往邵阳。以刘岳厚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地方派人士撤往茶陵。由此产生一个估计，就是如日军打通粤汉线以后，可能在湘赣边境发展抗日游击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军事部长聂鸿钧等因我与刘岳厚熟识，决定让我同他们一道前往茶陵，藉观动静。同年十一月，日军下岳阳。湖南国民党当局惑于“焦土抗战”之说，仓皇纵火，将长沙市区夷为平地。但在国民党军弃守岳阳以后，日军并未南下。已经外撤的机关团体一时既无法重返长沙，亦无他处可去。在这个情况下，刘岳厚决定在茶陵出版报纸，树一旗帜，《开明日报》于是创办。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开明日报》正式出版。刘岳厚自任社长，我担任总编辑，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姜运开、骆何民、张先畴、湛震、骆根青、马午、郑家弘、温涛、高山等。廖沫沙也曾参加。《开明日报》出版以后，因为茶陵

交通不便，难以大量发行。决定迁往衡阳。一九三九年底迁移完毕，次年一月重新出版。

刘岳厚系湖南国民党内与CC派对立的地方派首领。一九三七年十月，徐特立奉派在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利用刘与CC派的矛盾，在政治上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刘成了湖南的爱国民主人士。《开明日报》在茶陵出版，由于地处偏僻，没有什么影响。迁到衡阳后，刘与CC派矛盾很快以国民党与共产党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斗争十分尖锐。CC派首先通过打进报社的特务分子程全楚和其他不满分子对我个人进行排挤。社会上流传着他们制造的各种谣言，诸如“《开明日报》是《观察日报》的复活”（《观察日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一九三九年四月被迫停刊），“刘岳厚受共产党利用，做了共产党的傀儡”，等等。我和张先畴等于一九四〇年二月被迫离职。约在这年六月，我离开湖南前往桂林，骆何民继任总编辑。后来参加工作的有陈朗、魏莫千、汪叶舒、张里等。

CC派对《开明日报》这样一个由地方派出面而实际由“异党分子”主办的报纸的存在是很头痛的。他们想避免公开查封，因为这会引起刘岳厚反对，声张出去，不好下台。所以想尽办法迫使自动停刊。可是问题也就复杂化了。报纸继续出版一日，斗争就继续存在一日。刘岳厚在这场斗争中显出了积极的一面，有如实介绍之必要。

刘岳厚原是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后任局长，以擅长设计施工并有丰富经验自诩。三十年代初，CC派开始在湖南夺取国民党权力的时候，刘岳厚是代表地方势力奋起与CC派作斗争的活动家。地方势力依何键而存在，多数人思想保守，顽固反共，本无足取。但也有一部分人因长期与CC派斗争，反共意识反而不

甚顽固，乃至可以同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接近起来。在一九三七年冬何键垮台以后，这种倾向相当明显。刘岳厚办《开明日报》，明知是在同共产党合作，也就确实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对编辑部用人行政从不过问，事后极力承担责任。他同CC派斗争，言词委婉，而态度坚决。从这些事实看，说他受共产党利用，做了傀儡，并不为过。也正因为这样，CC派对报纸采取了一步紧一步的行动。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六日夜间，国民党便衣特务数十人，各持手枪，冲入开明日报社，反复搜查印刷厂，一无所获，随即点名逮捕以下十一人：骆何民（总编辑）、袁绍先（社会服务部长兼合作社经理。其人为湖南新闻界前辈，毛主席创办文化书社的资助者。现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高山（编辑部主任）、陆田（美术编辑，木刻家。现任广西美术学院教授）、魏奇英（校对。本名王锐聪，地下党员。现任湖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刘桂吾（会计）、侯镇南（刻字工人。解放后为湖南新华印刷厂工人，已退休）、张之健（排字工人、解放后为耒阳水运公司职工，已退休）、何福生（传达）、老刘（厨工）、易绍培（来客。世界语者。一九四四年死于湘桂战役）。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除滥捕的人以外，有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有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出版报纸所不可少的人，例如刻字工人，就是因为印刷厂缺少特号字模，不能随时铸出而设的，把这些人抓走，目的在使报社无法维持工作而自动停止出版，是很明白的。这些深夜捕人的特务分子有如蒙面大盗，他们拒绝出示证件，还拒绝说明身份，临走时说：“你们继续出版罢。”这话显然藏着一句话没有说：“看你们还出得成出不成？”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捕人虽多，但未一网打尽。湛震，一个非常熟练的编辑，刚从桂

林国新社回来，不在黑名单里面，幸而未被逮捕，立即接替了骆何民的工作。尽管遇到了不少困难，次日报纸还是照常出版。被捕的人，大约每月问话两、三次，问的全是无关宏旨的事。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刘岳厚终于决定以大量篇幅在报上发表长文，公开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蹂躏人权、摧残舆论、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全部事实经过。

该文以刘岳厚为代表的国民党湖南地方派集中攻击CC派，断言“外间以往对本报谣诼，对事之成份少面对刘社长个人之成份多，更非思想问题，全系感情作用”。文章还以一个忠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反对借口“异党分子”，迫害进步青年。内中所叙事实，现在看来，未免琐细。可是有时也流露出刘岳厚个人所特有的幽默感。当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中有个熊梦飞，是共产党叛徒，也到处指摘《开明日报》。文章反唇相讥说：“但不知熊先生究有何根据，而四处‘批评’本报也？若熊先生以为本报混有异党分子在内，则十年前之熊先生，不亦为人认为异党乎？……果异党分子可被人认定，而又反复若是，假设本报真有不少被人认定的异党分子，如十年前之熊先生其人者，斯亦不足道也矣。”

当天的报纸在衡阳大概只发行了少量，大量是派专人送到桂林，由我交国新社寄往国内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遭到这样一种完全意外的突然袭击，一时也无可如何，只得由新闻检查所出面，以“违反新闻检查”为名，判令停刊五天。到一九四一年九月，才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借口“言论荒谬”，勒令停刊。其时被捕人员多数已由刘岳厚保释出狱。骆何民最后在监狱看守梁某帮助下，于一九四一年五、六月间在来阳越狱，逃到桂林，转赴香港。刘岳厚本人在报纸停刊后，仍不能见容于CC派，被开除

国民党党籍。当时他已由原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推荐，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因此被免去职务。他的甘受冷落的精神，是很可敬重的。

《开明日报》是利用湖南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而存在的，但是不同于其它国民党报纸。它的言论表现了坚持团结抗战的政治态度，大量采用国新社从桂林发出的解放区和沦陷区通讯，进步倾向尤为显著。副刊所载诗文，颇多讽时之作。木刻家温涛、李桦等在《开明日报》创办木刻专刊，并创作大幅的“抗战门神”于新年随报附送。他们力图破除旧俗的精神，至今令人敬佩。《开明日报》还两度刊出《诗与木刻》副刊，后一次是由木刻家陆田与诗人高咏等合作，歌颂了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揭露了侵略者带来的苦难。如此等等，都是CC派制造种种借口，极力加以排挤的原因。所谓“刘岳厚受人利用”一类的话，即由此产生出来。

“文化大革命”中，湖南造反派不知前人为了发展进步势力的艰辛，诬蔑为“反动报纸”。有个造反派不远千里跑到北京找我“外调”，说《开明日报》是“反动报纸”。我当即予以纠正，指出他们这种说法完全违反事实，是非常荒谬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忆塘田战时讲学院

邓晏如

一九三八年秋，中共湖南省委在武冈县塘田寺（小集镇，现属邵阳县）创办了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以下简称塘院）。我是塘院研究部的学生，从学院开办到解散，一直就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这篇文章所记载的情况，大部分是亲身经历，有些事实来自吕振羽同志解放后的传授和档案材料。

塘院诞生的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到一九三八年秋，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为着自己民族生存忍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时刻都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进程是艰难的，长期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失陷，十二月南京失陷。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又放弃了徐州、开封、安庆。八月，九江失陷，日寇海陆空军围攻武汉，袭击南昌，进攻湖南。在这种困难局势下，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对亡国论、速胜论等谬论进行了彻底批判，阐明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要求全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战斗到底。同年八月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发表《保卫湖南宣言》，号召“全省三千万同胞紧急动员起来”，“到军队去，到游击队去，……到前线及围绕前线胜利的各方面抗敌战线上去，一

致为保卫中国，保卫武汉，保卫我们湖南而战。”在此紧要关头，为了很好地贯彻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适应战时的需要，塘院就象新建的一座灯塔，指引着抗日的航船奋勇前进。

创 立 过 程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根据振羽同志的提议，决定在武冈塘田寺创办塘院，并派振羽同志负责筹备。振羽同志得到省委指示后，立即拟定筹备计划，积极开展工作。塘院是当时湖南地下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冲淡学院的政治色彩，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赞助和支持取得合法地位，使学院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吕振羽、翦伯赞同志便与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经过一段努力，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同意任塘院院长，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同意任塘院董事会董事长，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委刘岳厚（子奇）同意任董事会董事。七月，振羽同志去邵阳走访第六区专员李琼和保安司令岳森，经过洽谈，他们都同意任塘院董事会董事。接着，振羽同志和雷一字同志去塘田寺察看院址和对筹备工作进行具体布置。有关行政事务性的筹备工作委托吕遇文（政三）（武冈县第九区立小学校校长）负责办理，他在当地有名望，塘院在他的大力支助下，解决了不少困难问题。在塘田寺对河借用了席宝田的庄园为塘院的院址。这里共有一百多间长年失修的房子，前面有一条河流（芙夷水）呈半月形围绕着，右边是彭石潭和彭石岭，左边和后面是吕家村、周家村以及大片稻田，可说是山青水秀，环境幽静的好地方。八月初，振羽同志回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徐特立同志汇报筹备情况。省委同意覃振任塘院的院长，赵恒惕任董事长，并以覃、赵的名义，向同意任塘院董事的人发出

聘书宣告塘院董事会成立。同时，还发函征求新的董事，由覃院长和赵董事长亲自写信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和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将创立塘院的缘起和宗旨告诉他们，并请其担任塘院的名誉董事。张治中回信表示谅解和同意，朱经农因要阻止塘院的创立，企图迫使塘院停办，回信拒绝。针对朱经农等人的阴谋，省委和徐特立同志指定聂鸿钧、王凌波同志与振羽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塘院按原计划继续筹备。八月底，塘院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振羽同志和大部分教职员以及各地的学生先后到达学校，九月十五日塘院正式开学。

组织机构和教师队伍

塘院成立了董事会，赵恒惕任董事长，张治中任名誉董事，刘岳厚、李琼、岳森、林拔萃（武冈县长）、吕惠阶、李心徐、李梯云（均当地绅士）、李荣柏（大革命时期湖南土地厅负责人）任董事。除董事会外，院有院长、副院长、教务长，院下设研究部、补习部、学生生活指导部、事务部、院长办公室等机构。院长覃振、副院长吕振羽（兼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务长先是张天翼（兼教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张调《观察日报》工作，由曹伯韩兼任（教政治经济学），后又由陈润泉（教自然科学）兼任；研究部主任李仲融（教哲学）；补习部主任先是雷一字（兼教日语），后是陈啸天（教国文）；学生生活指导部主任先由雷一字同志兼，后是游宇（兼教俄语）；事务部主任是吕遇文，院长办公室秘书是王时真（江明）。塘院的教职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文艺教师王西彦、国学教师吴季甄、游击战术教师杨卓然和王煜、音乐教师林居先和周白、国文教师徐昭和王时真、军事教官李华白、三民主义教师廉叶（国民党派来的）、地理教师姜国杰

(研究部的学生)、历史教师高剑莹(研究部的学生)、体育教师薛复(研究部的学生)。还有教务部的工作人员陈璧登和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许钟谋、杨染香同志。绝大多数教职员，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认真教学，积极工作，受到全院学生的信赖和尊敬。

办学宗旨和院训、院歌

塘院办学的宗旨，概括地讲，就是“树文化据点于农村”，“建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抗战时期，由于日寇的残暴，民族文化备受摧残，广大青年失学，徬徨四顾，亟需探求前进的方向。同时，游击队的发展与民众的组训，在城市与农村、前方与后方都需要许多青年干部去开展工作。因此，塘院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适应战时的需要，实施战时教育方针，除了让学生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还要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抗战形势，具备政治军事常识，开展民众教育，参加救亡工作，以农村为阵地，按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宣传抗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塘院的院训，开学之初，规定为“忠诚勤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又规定“精诚团结”、“英勇活泼”、“紧张严肃”十二字为养成院风的准则。当时塘院定的院训，是旧瓶装新酒，是想把它发展为救国的道德，就是要求全院师生员工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抗日救亡的战斗中作出积极的贡献。

塘院的院歌是：“我们是迎着大时代的巨浪，勇敢热情的青年聚集一堂，加紧学习，奋勇救亡，在这里锻炼得意志成钢，把思想武装，实行抗战救国的主张，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同学们，

起来！走向光明的路上，走向光明的路上！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我们是创造新中国的健将！”

教学方针、内容和方法

塘院的教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各样的干部。为民族解放输送人才。学院第一学期设三个班，即：研究部第一班、第二班，补习部一个班。共有学生一百二十余人，有的是各地党组织介绍来的，有的是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推荐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慕学院和老师之名而来的。一九三九年二月，研究部第三班和补习部第二班各招新生五十名，研究部第一班、第二班和补习部第一班各招插班生十名。学生以本省武冈、邵阳、新宁、东安、祁阳、湘乡、湘潭、宁乡等县为最多，也有来自江西、福建、湖北及东北各省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少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其中有一名姓陈的尼姑）。新生报到后，经过测试，按文化程度编班。各班的课程如下：

研究部第一班、第二班的课程：中山学说、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现代哲学思潮、军事常识、国际问题、文艺（选修）、外语（选修）。

研究部第三班的课程：中山学说、哲学概论、社会科学大纲、经济地理、抗战常识、文艺（选修）、外国语（选修）。

补习部第一班、第二班的课程：中山学说、国文、地理、历史、自然、社会科学讲话、抗战常识、英语（选修）、数学（选修）。

上述课程，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延安日报》、《新华日报》、《观察日报》、《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

党史》、《大众哲学》、《“左派”幼稚病》、《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书报编写讲义进行讲授的。每周振羽同志还利用周会或座谈会“中国革命运动史”和国内外形势发表演说，游宇、曹伯韩、雷一宇、阎丁南等还组织了“抗日民族战争讲座”。

塘院的教学方法是：教学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在这里既要学习，也要工作，学习和工作是为了民族生存，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

学生自治会和课外活动

塘院有学生自治会组织，在学院和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推动学习，维持治安，管理学生生活，开展课外活动。学生自治会主席先由王时真担任，后由高剑莹同学担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民众教育部、生活指导部、总务部、体育部。各部的负责人，有郑圭田、姜璟、姜国杰、雷震寰、薛夏等。有的部还在下面设队或组，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宣传队、歌咏队、壁报组、戏剧组、访问组、募捐组、膳食组、治安组、妇女组。队和组的负责人有我和吕健云、刘儒风、周持中、王翼飞、曹力进、申苏民同志等。每个学生要参加一至两项工作。塘院的学生，生气勃勃，非常活跃。他们经常召开和参加各种会议，如各工作部门的业务会，各种课程的研究会，分析国内外形势的讨论会，解决青年切身问题的座谈会，等等。特别是生活检讨会和文娱晚会，大家更加重视和更有兴趣。生活检讨会是不定期的，大约半个月开一次，主要是围绕工作、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充分发扬民主、谁对学校行政、学生会的工作、同学之间的关系、师生工友们的私生活有什么意见，都可提出批评和建议。晚会表演的节目有故事、笑话，山歌、渔鼓，大鼓，平调，地方戏，抗战歌曲，外国歌曲……花样繁多，同学、先生、工友、附近的农民欢聚一堂，十分融洽，这是一般的学校少有的。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以便战火蔓延到附近地区时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学院通过学生自治会以大量的时间组织和发动学生常到附近村庄去访问、宣传和教唱歌曲，还在学院内办了儿童识字班、成年识字班和妇女识字班，吸收附近的农民及其子弟参加。同时，还在对河街上办识字班，在水溪唐家（离学院七里）、油塘（离学院五里）办民众夜校和帮助当地办小学。民众识字班和民众夜校的课本是在通俗读物专家曹伯韩老师的指导下，由王时真等同志编写的，内容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单字造句到叙事，由群众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生活和抗日救国的大事。学生自治会还经常派宣传队、歌咏队、戏剧组到金秤市、白仓司、回龙市、塘渡口等集镇去进行宣传和演出，受到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通过宣传演出，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战时教育，有次我们去白仓司演出，观众达四、五百人。他们对剧中难民流离失所的遭遇伤心流泪，对汉奸的卑鄙行径切齿痛恨，对游击队的机智勇敢拍手称快。学院和学生自治会还派王翼飞（建中）和我分别与土匪部队联系，做他们的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以便将来开展游击战争时加以利用。还派人去水溪唐家、塘渡口帮助办织布厂和缝纫训练班。后来还派遣邵阳、武冈、新宁、东安、祁阳、湘乡、城步、绥宁、洪江等地的同学回本乡，以小学校为中心，办民众夜校，组织救亡室、读书会、歌咏队等，建立抗日救亡活动据点。一九三九年初，雷一字

老师和申苏民（剑涛）同学去邵阳县廉桥、水东江、两市塘、宋家塘、范家山、火厂坪（现在这些地方属邵东和新邵县）一带组织青年抗战服务团，先后成立二十余处宣传站、民众夜校、民众阅览室，大力宣传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两种势力的斗争

塘院自始至终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种是党领导的进步力量，坚决按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总方针，宣传抗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学习和工作；一种是以萧萍、方品等人为首的一股反动势力，他们从各方面进行捣乱和破坏活动。这两种势力的斗争相当激烈，一直延续到塘院被武装解散为止。开学不久，萧萍、方品等人，对学生和教职员工散布流言蜚语，在院内，鼓动一些学生闹恋爱、酗酒、打牌、斗殴，破坏学习秩序；在院外，偷窃群众的果、菜等作物，破坏群众的生产工具和船只，败坏学院的声誉，煽起群众对学院不满。他们散布悲观论调，主张消极抗战，反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他们这些破坏活动，学院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召开生活检讨会或大会进行揭露和批评。他们还想方设法在院内发展三青团员，建立三青团组织。甚至制造事端，拿出手枪威胁进步学生。同学们对此非常气愤，怒斥他们的恐怖行动，并要求学院收缴他们的手枪，交政府严办。在群众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承认错误，但矢口不承认有手枪。大家要求搜查，学院令其在第二天午前将手枪交出，并商请乡自卫队在对河街上和院门外张贴这样的布告：“查近日土匪滋扰我境，凡藏枪通匪之徒，限三日内向本队投案，交出枪枝，否则，一经查出，以土匪论处，决不宽恕”。萧萍、方品等人见形势不妙，就悄悄地离院到邵阳去了。

萧在塘院声名狼藉，因而一去不复返。方品等人回院后，改变了策略，他们伪装积极，想方设法与我们接近，伪装进步，想钻进我党和民先队组织伺机进行破坏。对此党组织早有戒备，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塘院第二学期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开学。在开学的前后，他们又制造舆论，到处散布说：“学院的寿命不长了，政府会来查封。”在此期间，院内院外有很多猜测，有些人怀疑塘院是“南方抗大”，并由此而提出这样一些疑问：“为什么一个青年，甚至以前不大懂事的青年，在塘院进步那么快，学习半年，就知道那么多事，懂得许多理论，能提出许多问题？”“塘院的教师，大都是学者、教授和作家，他们往常可以拿几百块钱一月，为什么在这里过艰苦生活，每月拿几块大洋，毫无怨言，难道他们都是傻瓜吗？”“为什么塘院只注重社会科学，而不象别的学校那样有物理、化学课程？”为了争取塘院能长期地办下去，振羽同志针对以上情况，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议上一一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解答，他说：第一，把学生进步快作为怀疑的理由，实在太幼稚了，只有自身力量的从速增长，只有作为抗战中坚的青年的飞跃前进，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因此，在我们看来，学生的进步还不够，还太缓慢了。第二，塘院的教师愿拿微薄的生活费，丝毫不足奇怪，在进行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的今天，只要不是汉奸，就得认清自己的责任，站在应站的岗位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神圣的抗战，就应选择最能打击敌寇和最能贡献自己力量的岗位努力工作，而决不应该谈金钱禄位。第三，我们是不是不注意自然科学呢？不是的。我们的课程表上有数学，有自然科学概论，而且在教学上，常常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毫无疑问，我们注重社会科学，也注重自然科学，尤其重视三民主义。我们不只是教育青年投身抗战，而最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坚定

青年对于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念，这难道不对吗？这次纪念周气氛肃穆，振羽同志义正辞严的讲话，表达了绝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的心声。大家听完后，都热烈鼓掌。

被国民党武装解散的前前后后

塘院从筹办之日起，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注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塘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阴谋扼杀。塘院被解散的前后情况大致如下：

早在筹办期间，朱经农就对塘院另眼相看，覃振、赵恒惕亲自写信给他，请其担任塘院的名誉董事，他回信拒绝，强调不能私办大专院校，并声称筹备工作必须按“合法手续”进行，企图迫使塘院停办。

塘院立案的问题，振羽同志多次请当时在教育厅工作的刘寿祺设法疏通，寿祺同志出力不少，曾耐心做该厅秘书主任周调阳的工作，望他给予帮助和支持，周虽同情，从中斡旋，但力不从心。塘院的立案问题终于没有得到解决。

开学不久，反动派曾在小报上发表文章，对振羽同志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他们造谣说：“教授吕某于北平危机时，贪生怕死，逃回湖南，纠集同类，以文化抗敌为名，进行阴谋活动，武汉危机，战火将烧及湖南时，又去武冈，假党国元老（指覃、赵）之名，开办塘田学院，愚弄青年，蛊惑民众，肆行敲诈剥削，昔日之穷教授，今则麦克麦克……（大意）”。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反动派大肆宣传：“塘院是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吕振羽是共产党员，不要上他的当”。接着，又采取毒辣的手段逼迫覃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话，妄图以此来削弱和破

坏塘院的影响和声誉。

长沙大火以后，张治中被免职，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从此以后，局势日趋逆转，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反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三九年二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异党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对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勒令停刊。在这股逆流中，国民党教育部长、CC头目陈立夫曾给薛岳发出电报，大意说：“据报，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的南方抗大，宣传错误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众，图谋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追究，制乱未萌……”。薛岳接到电报后，即以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令第六区专员李璆、保安司令岳森“派要员查明具复”。一九三九年初，李、岳转令武冈县县长林拔萃“派要员查明具复”。在此情况下，林便以电话约振羽同志去武冈，说“有事急待面商”。吕到武冈后，林将薛岳的训令给他看，并说：“我的地位不能帮你顶，只能帮你拖”，“你最好去请覃副院长、赵议长顶一下”，吕感到情势紧张，回院后，一面派人向省委报告，一面决定派陈润泉去长沙找赵董事长，必要时去找覃院长。二月，白仓乡谭乡长来院告知，说已接到林县长“查明具复”的训令，请学院代拟复文。学院对复文提了一些具体建议，要乡公所自行起草，并约好在定稿前通知学院派人去看一下。二月底，振羽同志到白仓乡公所，对复文稿做了某些修改。白仓乡的复文拖到四月份才到达薛岳那里，薛立即下令，一面严厉斥责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县长、乡长“忽视政令”，“虚词搪塞”，一面严令六区选派干员率兵前往塘院“勒令解散”。六区接到命令后，又转令武冈县选派干员率兵前往“勒令解散”。林拔萃得

令后，又约吕振羽同志去武冈面谈。吕偕王时真到达武冈后，方知第六专区和保安司令部已派团长文某率兵去塘田，武冈县保安团一个连也已出发，并派县教育局课长彭芳魁、课员周石安前去督办（是否有教育局长杨韶华，记不清了），还有六区保安团一个连由桃花坪直赴塘田执行任务。林拔萃向振羽同志表示，他已无能为力，并说此事全系县党部书记长易瑞芝和教育局长杨韶华搞的鬼。林拿出一叠由省发来和六区转发的关于塘院的电报给吕看，其中有陈立夫给薛岳的电报，有薛岳给武冈县长的电报，有薛岳给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和专员、司令转发给武冈县的电报。振羽同志看完电报后，林说：“老弟（指吕）看了这些电报，就知道陈立夫和薛岳把你当老虎打吧！恐怕自从有武冈以来，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案子了”，“塘院是没法挽救了，你赶快回去收拾。”

国民党三路兵马，是采取分进合围的形式先后到达塘田寺的。文某带的军队首先到达，驻在学院对岸街上，他亲自到学院会见事务部主任吕遇文说：“来时李专员再三叮嘱，请将此意转告吕院长”。经学院研究，由吕遇文主任给他写了“本院遵令停办”的条子，文于次日率兵回邵阳复命。另外两路人马，在彭、周的督促下，来势汹汹，摆开阵势把学院包围，他们将勒令解散的布告贴于院外，把查封签条斜贴于院门的合缝处。布告的大意是：“奉上令，塘田战时讲学院，自客岁创办以来，未经主管机关立案，擅自招生讲学，其所授之课程又多不利抗战之反动思想，显系别有作用，特勒令解散。”云云。

塘院被国民党武装包围后，全院师生员工便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必要的斗争。大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加强警戒，维持秩序，保护院产和人身安全。四月下旬，振羽同志和王时真同志从武冈回到塘田。他们渡河回院时，全院师生员工蜂拥而出，

将他们拥入院内，陈诉和探问，很多人流泪，振羽同志也不禁热泪潸潸。当晚党内开会，决定斗争方法和有计划撤退的步骤：

(一) 成立塘院结束委员会。以吕振羽为主任，陈润泉、游宇、阎丁南、李仲融、吕遇文为副主任，部分师生代表为委员。学生的撤退工作由阎丁南、李仲融负责；教师的疏散工作由游宇、曹伯韩负责；吕遇文负责院产和财务的处理工作。(二) 利用六区保安团某连与武冈县保安团某连的矛盾，抓紧做前者的工作（该连已有表示，只要学院办文，他们即可撤退），争取该连先行撤走，以影响后者。(三) 党员干部和学生，一部分撤至桂林，一部分回家或介绍工作，副院长和部分老师、学生留下来办理结束工作和等待省委的指示。(四) 加强全院团结，保持稳定情绪，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坏人造谣、动摇人心。(五) 深入做群众工作，尽量拿事实在院内外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争取群众的同情。(六) 遇事要与群众商量，尽量依靠附近村庄群众的帮助（国民党派来的军队有两个连驻扎在附近村庄），随时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态。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由桃花坪来的那个连，三日后即撤至对河。这样，武冈县派来的那个连就沉不住气了，彭、周即到院长办公室要求给一个全体员生离院的日期，同时还提出交出“院印”、“院牌”和全体人员名单的无理要求。振羽同志立即指出：随来的军队必须全部撤退过河，否则无法办理结束工作；结束日期，自军队撤至对河之日起，须二十天以上；“院印”、“院牌”并非政府颁发，无交销之必要；要全院人员名册，更没有道理，绝不能同意。争执达数小时之久，彭、周才勉强表示：立即向县里请示，只要上面同意，明日将军队撤至对河待命；可以不交出“院印”、“院牌”，须在结束前一两日内截角。但在名册问题上相持不下，振羽同志愤慨地说：“你们为什么提出这

样毫无道理的要求来阻止学院结束工作的进行？如果为了升官发财，可以拿我的脑袋去，何必在青年学生和忠于民族抗战教育事业的教职员身上打主意，难道想按名册对他们进行陷害吗？你们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我一切都不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可谈的，你们要想怎样就怎样吧！我明日就离院回家。”彭、周感到这样下去，无法复命，便于第二天同意不交出人员名册（可能已向上请示），并将军队撤至对河街上。

由于全院师生员工的努力和附近群众的帮助，结束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大约一个星期，人员的撤退疏散计划基本完成，全部院产和公私账目均已结清，剩余伙食费在同学们的要求下，大部分没有发还，当时经大家研究，决定把剩余的伙食费和处理院产的余款数千元拿出来作为基金，在桂林成立石火出版社（其意是：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以示对塘院的纪念。大家公推振羽同志为石火出版社的董事长，具体工作由曹伯韩、李仲融老师负责，曹任经理。

在进行结束工作时，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的“话别会”，邀请附近村庄的群众参加，彭、周和两个保安团的连长也应邀到会。会议从开始到结束，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中。振羽同志走到台上，才说出“同学们”三个字，就哽不成声。这时，全院人员（除几个反动的）连同外来的群众都嚎啕大哭。振羽同志的讲话刚结束，李仲融同志便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很多老师、学生、工友也上台讲话。无不表示愤慨和惋惜。院外的群众也议论说：“咯样好的学堂不许办，这是不要读书人。”

大约二、三日，曹伯韩、王西彦等进步老师和一些党员学生，便分别到目的地去了。吕振羽、游宇、阎丁南、李仲融、王时真等和一部分学生撤至油塘继续处理善后事宜。在油塘，根据

省委的指示，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一）办了两期党训班，第一期五、六人，第二期十余人，每期时间大约十来天，内容是抗战形势、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和策略、干部政策、群众工作方法等。结业后，先后成立金秤市、洞口、新宁、城步、绥宁五个省委直属支部。金秤市支部以王时真为书记，洞口支部以雷震寰为书记，新宁支部以郑圭田为书记，城步支部以肖强欽为书记，绥宁支部以李子华为书记。（二）印发了《塘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国各界人民申诉书》、《致覃院长书》、《致赵董事长书》、《告湖南省同学书》、《塘院全体学生告别武冈人士书》。（三）编写了《塘田纪念册》送省委印发（据说，省委同意，但未印发）。关于在几个空白点的县建立省委直属支部的情况，除新宁直属支部由李锐同志向省委汇报外，其余四个直属支部，振羽同志去邵阳向省委报告了筹建经过，并将支部成员的组织关系转至省委。

塘院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廿一日被国民党武装包围停办，武冈县政府勒令解散的布告是四月二十日公布的，《力报》于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塘院勒令解散”的消息。整个结束工作进行一个多月，大约六月底以前，全院师生员工安全撤走，胜利完成了省委交给的各项任务。

党的组织和领导

塘院直属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具体领导塘院工作的是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树彬同志。学院的党组织，一是三人小组（委员会），一是党支部。三人小组有两届，第一届的成员是吕振羽、张天翼、杨卓然，吕任组长。后来张调《观察日报》工作，杨离开了塘院。一九三九年二月组成第二届，其成员是吕振羽、游宇、阎丁南，吕仍为组长。支部成员开始是杨卓然、雷一字、林居先，杨任支

书；后来是游宇、阎丁南，还有王盛（已叛变），游任支书。振羽和天翼同志是以著名学者的身份进行活动的，不参加支委会，在一般党员中也未公开自己的政治面貌。学院的一切重大问题，经请示省委，由三人小组讨论后，交支部成员带到支委会进行具体研究，贯彻执行。塘院秘密发展党员四、五十人，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一百余人，他们是各方面的骨干，学习认真，工作积极。

省委和徐特立同志对塘院非常重视，曾多次向上级汇报塘院的情况，并经常对学院各方面给予指示。（一）塘院的创立，是由振羽同志提出，经省委和徐老研究确定的。当时的省委书记高文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指吕）想办一个战时讲学院，我们也很赞成。……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凡属赞成抗日的人都支持他，自己的子弟也送到他那里去学习（高文华同志就曾送自己的女儿廖文英〔高萍〕到塘院学习。”（二）徐特立同志曾将创办塘院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他写的《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月前，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办了一个学校，名战时讲学院，已经找好校舍，开始招生，由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当院长，吕振羽当副院长……不久前，我曾写信给泽东、洛甫同志，要求派几个下级干部去当学生，将陕公和抗大的学风带去，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三）塘院的教学方针、方法和作风，省委高文华、于刚同志和振羽同志一起在徐老那里开会，专门进行了研究。（四）塘院的主要教职员，都由省委调配，三人小组和支部主要成员，也是由省委研究确定的。（五）省委军事部长聂洪钧将振羽同志和党外朋友准备在日寇继续危害湖南时即发动游击战争的情况向长江局作了汇报；省委组织部长郭光洲将塘院做统战工作和被国民党武装解散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六）为了使塘院的工作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适应战时的需要，一九三八年十

一月，蔡树彬同志到塘院向三人小组、支部成员和部分学生党员骨干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大家听了传达后，深受教育，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从此，塘院更注重理论学习和战时常识的教育，课外活动和救亡工作增多了，军事课程抓得更紧了，当时还规定煮饭的“锅巴”不能吃掉，都把它晒干存放到仓库里，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干粮。(七)国民党派武装解散塘院，进行结束工作时，省委派李锐同志到塘院作指示，大意为：1.省委同意塘院党组织的撤退计划和措施；2.退过塘院事件，编写小册子，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3.塘院可在没有党组织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的学生党员中，各选择数人进行短期训练，由振羽、游宇、了南同志负责筹建这几个县的省委直属支部，同时建立金秤市支部。以上情况说明，省委和徐老对塘院十分重视，非常关心，及时给予指示，这是塘院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

深远的影响，难忘的人

塘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七个多月，但成绩很大，影响深远。第一，先后在塘院学习的青年大约二百五十余人，他们受到抗战形势的教育，经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很多人后来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进步作用。第二，学生中有四、五十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有些人成为党的中层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其中省属部、办、委、厅（局）或相当这一级的领导干部有十余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第三，受省委的委托，在武冈（洞口）、新宁、城步、绥宁、金秤市等五个空白点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后来党在上述地区的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第四，由于上述地区

有党的组织和当时采取流动的方式对周围几十里的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就使解放前夕党在四望山、河伯岑、四明山一带领导地下武装斗争有了较好的基础，得到一些党员与广大群众的参加和支持，终于取得了胜利。例如，一九四九年，金秤市支部有十多名党员就是党领导的湘中二支队第三团莫新春部队中的骨干，他们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四五年冬，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出席湖南工作座谈会时，对塘院有很好的评价。塘院的辉煌业绩和影响，将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

塘院之所以能够如此，应归功于党，归功于湖南省委和徐特立同志的正确领导。同时，对全院师生员工的辛勤努力，党外朋友的热情支持，广大群众的无私帮助，绝对不应忘记。尤其不能忘记振羽同志的功劳。振羽同志是我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创办塘院的整个过程中，他忠贞不渝，坚持真理，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刚正不阿，临危不惧；他治学勤奋，持论严谨，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他生活俭朴，作风民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为人师表。对他这种高尚的品德，我永远学习，铭记不忘。

一九八三年七月

长沙文夕大火前后

席楚霖

一、大火前的长沙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由湖南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黔阳县长，调任长沙市长，于八月二十五日就职。这时，长沙临近抗日前线，已经显得相当混乱了。撤退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都把长沙作为歇脚地，他们一到长沙就向省、市政府要房子、车子、民伕，稍不如意，便刁难责怪。从皖、苏一带逃来的难民、伤兵，充斥街头巷尾，有的甚至露宿在屋檐下。当时虽有救济站的设立，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大批难民和伤兵，也无法应付。他们饥寒交迫，就向政府请愿。当局置之不理，常发生伤兵与军警冲突的事，更令人头痛的是，日机经常窜犯长沙上空，投弹扫射。在我到任的前几天（八月十七日），日机十八架第七次轰炸长沙，投弹一百余枚，被炸二十余处，伤亡八百余人。这时，前方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谣言蜂起，人心惶惶。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十一月一日，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沅陵，市政府迁邵阳。逃难需要车船，而这些仅有的交通工具已被各机关占有，哪有老百姓的份呢？当时的车站码头更是混乱极了，因争夺一个坐位相互殴斗，造成流血事件经常有之。长沙象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

武汉失守后，日寇大举南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长沙危

在旦夕。各方人士都很关注长沙的命运：是守卫呢，还是放弃？是打呢，还是不放一枪让给敌人？正在这时，蒋介石来到长沙。十一月七日，我接到紧急通知，下午在蓉园（在小吴门外，原是何键的别墅）召开重要会议。我到蓉园时，客厅里已经坐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人员。随后，蒋介石由省主席张治中陪同进入客厅。他穿着一身黄呢军服，态度很严肃，大家起立欢迎，他只举举手点点头，嗯嗯几声，就训起话来。大意还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自欺欺人的滥调。我当时是迷信蒋介石的，认为他既来长沙，态度又很坚决，时局是有希望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那一套全是骗人的鬼把戏。原来蒋介石这一次来长沙，并不是布置如何保卫长沙，抗拒日寇，而是面谕张治中火焚长沙，不惜以几十万人口的古城，作为“焦土抗战”的牺牲品。

十一月十日晚上七时许，张治中在南门外陶广住宅召开了一次紧急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省府委员宾步程、易书竹，省保安处长徐权；列席的有省府总参议周斓、军管区参谋长滕杰、长沙警备司令酆梯、长沙市长席楚霖等十余人。张在会上首先讲话，大意是：日寇进逼长沙，难于坚守，但长沙决不能资敌。为了削弱敌人的力量，要采取“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办法，准备将全城焚毁，一点物资都不留给敌人。他说得很坚决，好象不是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传达命令。接着，徐权提出放火的办法说：“先放警报，使老百姓逃避后再用燃烧弹放火，这样，就好象是日本鬼子烧的。”他说的话很多，这几句我是有深刻印象的。徐权讲完后，张治中询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当时房子里很沉闷，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什么表情。坐在我旁边的宾步程，只是闭着眼睛在抽烟。在一阵沉默之后，有人表示烧长沙值得考

虑。张看到有人不同意，顿时怒容满面，说：“这件事我本不打算提出来的，予可（徐权别号）却要我告诉大家。放不放火是军事机关的事，我们管不着。大家切不可在外面说。要是有人听到省政府开会商议烧老百姓的房屋，那还成什么话！好了，好了，不必说了！”从张治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放火一事显然是受了蒋介石的指示，而他又已于会前与徐权等人商议计划好了的。这次会议也就证实了蒋介石来长沙的真正意图。

二、长沙大火经过

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上午，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纪念大会。晚间，我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团体人士约三百人参加火炬游行。当时形势紧张，很多店铺都闭户停业。我们游行时，还奉命动员明日开业。游行队伍经过水风井、八角亭、南正街等主要街道，一直到南门外才解散。看看表已经十点多钟了，我走到学院坪省政府，门岗已撤，屋子里灯火辉煌，满地是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我觉得很奇怪，心里想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大家就都逃走了呢？既然大家要逃走为什么还要我率领市民火炬游行，叫商人明早开市呢？我越想越害怕，跑到省会警察局找局长文重孚。警察说他不在局里，只见礼堂里堆满了桌、椅、板凳。又到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团部找副团长王伟能（市长兼团长），他正在打电话布置什么事，见到我马上迎出来。我问他张主席要明早派八百名民伕替军政部搬运军用品上车的事办好了没有？他说：“张主席已有重要任务给我。”我问他什么重要任务？他说是指挥放火（他是北区放火指挥）。我听了大吃一惊。急忙赶到市府，通知未走的人员赶快向邵阳疏散。我由市府奔回南门外回龙山住宅，沿途看到手执干柴和洋油桶的军人三五成群，

源源不绝地由南门进城。我刚一进门，勤务兵对我说：“张主席来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家。主席已搬到二里牌公馆，他要你回来后打电话去。”我随即打电话给张，他问我明早军政部要的八百名民夫办好了没有，我说：“刚才正为这事找过王副团长，他说主席另有重要的命令给他，他无法办这件事。”张说：“我没有给他什么命令呀！”我本想把王伟能受命指挥放火的事告诉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只“唔”了几声就把电话筒放下了。我为了保全自己脱离危险境地，略加考虑后，便赶快坐上小汽车逃命。这时，只见天心阁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我督促司机加足马力向湘潭方向驶去，沿途混乱情况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拖儿带女的，提箱背包的，裹着被条背着老人和小儿的，哭的、骂的，争先恐后，络绎不绝。路上塞满了大小汽车，人挤人，直到天明时才到达下摄司。

三、大火后的长沙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到达衡阳，我首先去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把十一月十日晚省政府召开秘密会议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同时也将十二日晚上同张治中打电话以及火烧长沙的惨状和我的思想顾虑都说了。何成濬安慰我说：“你是不同意放火的，他们可能因此不通知你。现在日寇还未到长沙，你可回长沙看看动静。这事不至于牵连到你身上，因为你提出了你的意见。”我在他的督促下，便驱车回长。刚到下摄司时，遇着一辆从长沙方面来的小汽车。车上坐着陈诚和蒋鋈欧。心想他们都逃出来了，我还去长沙干什么呢？乃取道湘潭，赶到市政府迁去

的所在地邵阳。

十一月十四日接到张治中的电报，要我速返长沙。我星夜离开邵阳，次晨赶回长沙。这时的长沙市真是满目凄凉，一座繁华古老的城市，已变为断壁残垣、遍地瓦砾的废墟。全城房屋被焚毁者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计五万六千二百余栋），仅有中山东路国货陈列馆和极少数的建筑物未被焚毁。可见放火计划周密，做得彻底，烧得干净。灾民们三三两两在废墟瓦砾中挖着、哭着、骂着，寻找他们想要寻找的东西；被烧死的残骸也有些还未掩埋。特别是皇仓街的粮仓，余火未熄，也有人在火中取谷。我见到这一残民以逞的悲惨情景，深受良心的谴责。

当天，我去二里牌唐公馆见张治中。张从房里出来，愁容满面，精神萎靡，仿佛大病了一场似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唉，我这次吃了亏了！”我望着他，一时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相对多时，才谈到火灾善后工作。张说：“已决定成立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由尹任先任主任，你为副主任，你们要好好的干。”当时政治部第三厅的田汉、洪琛也协助抚慰灾民、安顿伤病，清理废墟，恢复交通。

长沙大火，惨重的损失是无法掩饰的，单是死伤人数就无法统计，其他财产损失不可数计。人民遭此浩劫，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惩办纵火罪犯，发放救灾物资。在人民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如何向公众交代呢？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民愤。于是，组织军法会审，判处长沙警备司令鄧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省会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三人死刑，于十一月十八日执行枪决。张治中受革职留任处分。蒋介石却装出一副同情人民的慈悲像，假惺惺地准备巡视灾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张治中决不会布置放火。真正的纵火犯是蒋介石，鄧、徐、文三人不过是

作了蒋的替罪羊。

我在酆梯等三人被处决后，就向省政府呈请处分。当时省府给了我免职留任的处分。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张治中主持的最后一次省府常会上，以“办理火灾善后异常出力”为理由，又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这都是国民党掩饰罪责的官样文章。

杀了酆梯等三人，革了张治中的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民的愤怒，但几十万元的救济抚恤金并不能对全市十几万人民的损失有什么补益，尤其是商界人士损失巨大，无法弥补。因此，他们纷纷向政府请愿。国民党行政院为了收拾人心，派周震麟、赵恒惕、仇鳌、彭允彝、胡彦远等人回湘调查和慰问。周、赵二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到达长沙，进行了一番查询，次年一月三日行政院提出报告称：“查火灾经过，具如中央政治部宣布。省府组织临时救济委员会，办理急赈及恢复市场，清理街道，维持交通秩序等事，甚为得力，仅救济一项用费达九十余万元。受灾难民十二万余人。现市民逐渐来归，市面日益活跃。经与省府商议，请陆续举办小本借贷，俾维灾民生计。……省府当局事前疏于防范，而事后救灾之切，负责之诚，补过之勇，弥堪嘉当。”这份给省政当局抹脂涂粉的电文，曾刊载于当时《国民日报》上，成为旧社会官官相护的一个生动例证。

前面说过，大火前从苏皖一带流亡到长沙的难民，数以万计，这些人虽已走出了大部分，而来不及逃走，葬身火海的人仍有不少。对此，政府无法交代，但又害怕责难，于是玩弄花招，把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搬出来，搞了一篇谎话连篇的报道：

两湖监察使高一涵曾为长沙大火一案，亲自前往调查，已将查得情况向监察院详细呈报。兹因高于调查该案时，曾对长沙大火前之各地留长难民情形关怀查察，旋悉该批难民已

于大火前悉数疏散；嗣于回署后据湖南赈务分会陶主任履谦、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难民总站程主任永言会函电告，略谓：“此次长沙大火，各方对于在长沙难胞之安全关怀殷切，函电查询者极多。查长沙大火前，滞留长沙难胞原有三万一千人，经本会本站赶筹疏散内地，至大火前一日止，已悉数安全离长，无一遇难受惊。请代宣布，藉释众念”等语。高氏以来电所言各节与所查尚属相符，已允代为宣布，以慰人心，云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一日长沙《国民日报》明明是说疏散了大部分，这里硬说是悉数疏散了；明明是不少难民被烧死，却硬说是无一遇难受惊。这种自欺欺人的鬼话，又有谁会相信呢？

国民党当局除了玩弄欺骗伎俩之外还采取了恫吓手段。例如：当时有一部分人发起共谋长沙的复兴问题，号召各界灾民推派代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八日齐集湘潭县商会开会协商进行。国民党当局害怕他们聚众开会，指使《国民日报》于开会前一天以“敬告长沙受灾同胞”为题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名曰“敬告”，实是警告，有几段是这样写的：

“此次大火经过，具如中宣部、政治部之所宣布。……今有人焉，于中央说明以后，另持谬论，复妄冀以其谬论掩蔽火灾之真确说明，是其另有作用，彰彰明甚；复有人焉，于领袖处置之外，另作狂妄要求，或另持荒谬偏见，是其别有居心，又复彰彰明甚。

此次长沙大火，虽未能把握时机，究不能指为地方当局之驱纵，更不能根本反对焦土抗战之实施。”

在受到恫吓的情况下，湘潭的会议开是开了，仅仅成立一个“长沙市民救济火灾复兴长沙委员会”，选了一些执监委员。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会址竟设在长沙国民党省党部内。这当然只是一块空招牌。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记张耀辰谈审判酆悌经过

杨宙康

张耀辰，安徽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初期，任国民党军法执行总监部军法官。长沙文夕大火之后，蒋介石为了推卸焚毁长沙的罪责，组织军法会审，对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进行审判。张耀辰是这次军法会审的主要承审员，又是执行酆悌等死刑时的监刑官。因此，对这次会审经过知之甚详。一九三九年春，我在沅陵施则凡（安徽人，任湖南军管区司令部军训处长）家会见了，便中谈及此案真相。兹将当时的谈话内容概述如次。

张耀辰说，会审之前，他在岳阳前线。一天，突然接到电令调他回长沙。他到长沙后，即往蓉园会见钱大钧。钱对他说：“长沙大火案要进行军法审判，在这里找不到军法官，只好调你回来。我虽然挂了审判长名义，但我不懂军法，一切听你安排，我只能配配相。”钱还叹息地说：“这次真糟糕，三个罪犯都是自家人！”

张说，开庭审讯时，公案上堆积着市民控诉状和放火罪证，如放火队的白旗等。首先被提审的酆悌，身着长袍，面色灰黑。钱大钧略问姓名、年龄、籍贯后，即由他进行讯问。据酆悌供称：蒋介石曾有手令给张治中，说撤退时要将长沙彻底破坏。张曾召集他和保安处长徐权讨论过此事，并令他负责草拟一个放火计划。计划内容大致是：调用一个团的兵力，装成是从前线退下来的，先

期分驻全市各处。暗中将军队编组，基层以五人为一小组，配备放火器材；若干小组编为一队，由队长统一指挥，按指定地区执行放火任务。另外，还配备摩托车携带汽油，插上小白旗为标志，四处逡巡补火。同时，预定在放火之前，先放假空袭警报，使居民往郊外逃避，并勒令未出户的居民立即离开，然后开始纵火，各按指定区域同时进行。这个计划曾送交张治中审查，并由张召集徐权、鄧悌讨论过两次，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后，才决定作为实施计划的。关于执行纵火任务的指挥官，鄧悌推荐他指挥的警备第一团团长蒋雪琴充任，但张治中却指定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负责。鄧将张器重徐的意思告诉徐崑时，徐表示感激，欣然接受任务。

张耀辰说，十一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省会各界群众举行大会，并准备火炬游行。那天，张治中曾通知鄧悌，要在小吴门外飞机场检阅放火队伍。按规定，这种检阅应该一切都如实演习。因此，各单位都携有放火器材到检阅场集合。但等了大半天，张并未到，鄧悌和接受检阅的队伍只好各自回去了。鄧悌那天回去后，再没有见到张治中，也没有接到放火命令（张说，后来审问文重孚、徐崑时，他们都说没有接到放火命令）。起火后，他莫知所措，连部属的下落也不知道。

张谈到钱大钧和张治中的态度时，说钱、张都想为鄧悌减轻处分。张治中为此曾多次到钱大钧那里商谈，也曾面托张耀辰帮忙。但鄧悌在法庭上说话很不得要领。一再提醒他，暗示他，他总领会不到。最后，他请求准许他写信给蒋介石，想作书面申辩。关于庭上笔录供词，也要求经他自己校阅。法庭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他在供词上修改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写给蒋介石的信，虽然很长，但通篇是“束发受书，粗知礼义”，以及如何“不

敢辜负校长的教训和提拔”等空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什么辩白。张耀辰说，他和钱大钧看了这种情况，爱莫能助，只是空着急。

判决稿和全案文卷上报后，钱大钧对张耀辰说：“我看鄧悌头脑不清醒，你到拘留室去和他谈谈，不作开庭审讯的形式，看他是否清醒些。”张到拘留室与鄧谈了很久，鄧还是不得要领。最后张只得摊牌说：“你看这么一件大案子，是否只应该由你一个人负责呢？”这一问，鄧才如梦初醒，赶忙答道：“那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张紧接着问道：“那么，你的意思还有谁应该负责呢？”鄧说：“徐处长应该负责。”张耀辰谈到这里，还惋惜地觉得鄧悌说得太迟，因为审判的文卷已经上报了。

张耀辰和钱大钧研究拟判时，张认为判得太轻是批不准的。于是，拟判鄧悌十年徒刑。但判稿上呈后，蒋介石说判得太轻了。张治中感到事情危急，再三要求钱大钧去向蒋说情。当钱向蒋说情时，蒋说：“我八年前就要杀他的。”（当时张耀辰也和湖南军区军训处科长蔡杞材谈过审理鄧悌的事。据蔡说，蒋介石的话是：“这个东西我早就要杀他的。”）钱大钧知无可挽回，乃嘱张耀辰改判死刑。张改判送核后，见蒋介石下楼散步（蒋当时也住在蓉园），足足兜了半小时的圈子才上楼去。随即传张上楼，对他说：“判死刑是应当的，但罪状上不能写‘纵火殃民’不能有‘纵火’二字出现。”张旋改为“瀆职殃民。”再呈后，蒋介石说：“文官叫瀆职，武官要叫辱职！”说罢，亲笔改“瀆”为“辱”。

蒋介石批准鄧悌等处死刑后，钱大钧问张耀辰，按审判程序，下一步该怎么进行。张说应按第一次开庭那样，由审判长宣读判决书，问犯人服不服；如不服，可以提出上诉。钱听了连声说：“不行！不行！我看不宣判了”。张耀辰对我说，钱在得到蒋的同意

后，派长株警备司令俞济时执行对鄢悌等三人的死刑，并派他为监刑官。鄢悌等三人均系黄埔军校学生，在长同学多，张想到万一出了意外，他承担不起责任，于是极力推辞。钱对张说：“不要紧，一切由俞司令负责，与你无关。你只到场走一趟好了。”钱还嘱咐他向鄢悌等三人保密，佯称将他们押解南岳，不日起程，如要写信给亲友，可赶快写好，以后就不能与外面通信了。在行刑的先天晚上，鄢悌写了十多封信。其中一封约他妹妹（或妻子）快来一晤，有“迟则恐难相见了”的话。

张耀辰在谈到执行死刑情况时说，第二天早晨，他将鄢悌等三人押上汽车，到长株警备司令部门口停下，鄢等表情很惊慌。张先进去会见俞济时，随即通知将三个犯人带下车到另室休息。张同俞略谈片刻，即同往犯人休息室，并由张向犯人宣读判决书，然后说，有什么遗物、遗言，都可以由俞司令负责转到。三人都默默无语，各自取出现金、手表、戒指等物，请求转交亲属。其中以鄢悌现金最多（一千多元），但他手指上戴的白金戒指却未取下来。一切交代完毕，三人即上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枪决。张耀辰说，行刑时，他站在刑场后面的山头上，三人倒地后，他才走到刑场查看，发现鄢悌手上的白金戒指不见了。俞济时即下令不许任何人离开刑场，必须将失去的戒指查出来。他们故意避开一下，移时，戒指也就回到了死者手上。张亲自监视入棺，并在棺上记明姓名，然后离开刑场。

以上是我亲闻张耀辰所述。事隔多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一九六二年五月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长沙沦陷时期日伪活动见闻

罗崑林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到长沙西乡龟头市找国民党肃奸队副队长傅国雄谋事，因而加入了“肃奸队”，并于八月下旬奉傅令打入沦陷区日伪组织。在整个长沙沦陷期间，我在日寇设立的“长沙复兴促进办事处”任书记，同一些担任伪职的中统特务以及与“肃奸队”有过联系的汉奸先后发生联系，还和当时在长沙的一些日寇、日伪组织头目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因此，对长沙一九四四年六月到四五年八月日寇侵占期间日伪的活动情况以及国民党的特务、游击队和日伪之间的关系，有个大概的了解。

日寇在长沙的侵略机构及其活动

“开部队”（代号。真实番号不详）是当时驻长日寇的最高军事单位。其司令部设小吴门外某处，司令官姓“本庄”。“开部队”直接出面的情况不多，一般多由其配属单位主要是特务和宪兵出面活动，胡作非为。我所知道的情况有：

湖南复兴部——初名“复兴部长沙支部”，总部设汉口。一九四五年春改名为“湖南复兴部”。它打着“复兴湖南”、“建设新湖南”之类的招牌，具体策划并执行占领区内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等活动，诸如汉奸的搜罗、傀儡组织的设立都由它一手包揽。这个组织开始设在中山东路何键私宅，后迁至二里牌

唐生智私宅。负责人宫永义文大佐，为人老奸巨猾，是个老牌特务，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宫永调走后，由佐方孝平少将接替。

“复兴部”内设政务班和经济班。政务班长先为堀川芳雄大尉，后为水洛龙雄大尉（化名吴立夫），主要任务是物色汉奸，拼凑伪组织。此外，有关文化侵略活动，也归其管辖，曾先后设立“日语夜校”（校址在息相街）、“复兴三一小学”（原北正街圣公会内），以及“复兴巡回剧团”（设犁头街）、“湖南文化协会”（设中山路原邮电局）、“留日同学会”、“教师联合会”、“佛教协会”等汉奸团体。鉴于长沙是湖南占领区的重心，特设“长沙复兴促进办事处”（地址在息相街），专司政治控制和文化侵略活动。

长沙沦陷时，原长沙《大公报》人员逃散，但部分机器、铅字未及撤走。“复兴部”利用原《大公报》校对陈某出面，诱使部分工人回来复刊。从此，《大公报》便成了替日寇效劳的汉奸报纸。陈某任经理，袁某充主笔，报社事务实际上由“复兴部”政务班驻社指导员柳内池（后由水谷继任）、井本（任编辑，原系《朝日新闻》编辑）操纵。该报每日出四开一张，以吹嘘日寇侵华军事胜利，宣传“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共同防共”为主要内容，并标明系“反共协会”主编。

“复兴巡回剧团”是清一色的汉奸话剧团体，演员二十余人，女性居多。团长况正德，原籍江苏，副团长龙啸吟，长沙人，系流氓打手。剧团成立后，曾去岳阳、湘阴等地进行“慰问皇军演出”。

“复兴部经济班”是策划设立和控制汉奸经济的组织，它的主要活动是掠夺沦陷区的物资。据我所知，先后设立的有：控制商业行业的长沙市商会，由陈焕章任会长（陈为中统特务，“肃奸

队”潜伏组长，笔者即在他手下任联络员)，控制工商业职工的工商总工会；办理一般汇兑及存放款业务，兼收五金、矿产，用食盐交换军用物资的永兴商业银行；垄断木帆船运输的复兴运输公司；掠夺沦陷区粮食的湖南人民粮食公司；专替日寇运输物资的复兴船团办事处；借“平价”之名销售日寇剩余物资的长沙公立市场等。

长沙宪兵队——驻教育会坪，队长古川武。全队真正的日本宪兵不过四、五人，其余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密谍，其中有方志武、李少山、胡继琪（均为湖北人）等。它的主要活动是侦查、搜捕和屠杀抗日爱国人士。在审讯中国人时，总是使用灌冷水、汽油之类的毒刑；被捕者多无生还。

岳麓宪兵队——驻河西深湾镇，队长佐藤（化名场佐藤），系日本军曹，在长沙市万寿街另设有分驻所，由出口信雄驻守。全队日寇仅三、四人，其余都是无恶不作的汉奸密谍。其活动情况与长沙宪兵队同，而凶残狠毒则尤过之。据说在河西曾活埋过一些中国人。其中作恶最多的汉奸有肖震（又名肖牛伢子，长沙水陆洲人），其次是黄剑昆（益阳人）、丁咏石（长沙人）等。他们除捕人杀人以外，经常以“检查”为名，对船民实行抢劫。

“开部队特务队”——驻南门外枫树山，是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汉奸密谍机构。全队三十人左右。队长张韬，河北人，留日学生。副队长杨叔循，四川人。主要任务是替日寇训练汉奸特务，搜集情报。活动区域除长沙城乡外，远及浏阳、平江、益阳和常德等地。

“宗宫公馆”——在城北余家塘一号，头目为宗宫室大尉。这个特务机关没有正式名称，只以居家形式榜其门曰“宗宫公馆”。它的任务也是收买汉奸密谍，搜集情报；活动范围则超出了湖南，

深入到重庆等地蒋管区。

以上所述，是我所知道的日寇在长沙设立的主要侵略机构。它们疯狂掠夺民间物资，残酷迫害杀戮中国人民，使沦陷后的长沙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驻长日寇十分贪婪残暴。当时长沙地区食盐奇缺，每斤盐在乡间可换谷一石。日寇将原长沙海关仓库专作储存食盐之用。每当起卸食盐时，附近贫苦市民常冒险前往扫取散盐。日寇守库官兵发现了就追逐殴打。有一次，我的孩子在仓库码头边扫盐，见一小孩被日军捉住关在仓内，驱使军犬活活咬死。守库的下级军官常串通大西门一带的中国盐商、盐经纪盗卖库存食盐，攫取暴利，以饱私囊。分配到部队的食盐、食糖等物，也经常被官兵盗卖。日军部队中香烟配给极少，一九四五年以后甚至连续两三个月没有配给。其官兵偷窃食盐、食糖向民间换取低级纸烟，成了普遍现象。我家当时住大西门河街，就多次同日本官兵交换过。

水洛龙雄平日一本正经，我总认为他是廉洁奉公的。后来，据替他当过女工的金嫂告诉我，在日寇刚宣布投降时，水洛由湘潭（那时他已调任湘潭“复兴部”少佐部长）来长待命，忙着托人在各金饰铺打了大批金叶捆在腰间，并将伪储币兑换大票面的关金券，数额惊人，即此可见其平日搜括之厉害。

长沙地区的汉奸伪组织

侵华日军为了便于指挥汉奸，对各占领区都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办法。长沙地区的汉奸伪组织与南京汪伪政权和武汉伪政权均无联系。

“长沙市保卫总队”是日寇于侵占长沙之初，利用原国民党湖南省会警察局的人枪（均不过四百）成立的。总队长为原国民党

警察局西三分局局长邓笃恭，下设东南西北四个分队，任务是替日寇拉伕(后改为派伕，再改为雇伕)；委派各街街长，诱骗市民复归，帮助日军维持市区治安。它采取散发传单、标语等办法，提出“农民复耕，商人复业，工人复工，建设新长沙”之类的欺骗口号，但效果甚微。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伪长沙市自治筹备处成立后，该总队即改称长沙市警察总队，由伪自治筹备处长唐令欧（即唐天德）推荐汤剑萍任总队长，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安徽人张业超任副总队长。同时增添了一批警官，增设了警察分队和分驻所。其任务是维持治安、搜集情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并帮助日寇公开推行鸦片、开设赌场、妓院的毒化政策，本身则靠征收特税、娱乐税、花捐维持开支。这样，伪警察总队为了多捞一些钱，对烟、赌、娼极尽包庇之能事，并从而侦察游击队在本市的活动。

“长沙市治安维持委员会”设立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委员长为张芝文(长沙东乡人，原经营油盐杂货业，曾任街团 团总，天心坊坊长等职)。委员由张芝文在长沙士绅中搜罗，除谢菊生（德茂隆酱园经理）和陈焕章外，其余都不在长沙，亦未征得本人同意，实际由张唱独脚戏。同年十一月，伪自治筹备处成立后，维持会即宣布撤销。

在长沙维持会出笼的同时，还在靳江河设有靳江河四乡（即长沙河西四乡）治安维持总会，会长为靳江河大地主子弟梁伯翘，年仅二十多岁。主要替日寇派粮、派副食品、征集民伕。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到日寇投降时止。

长沙市自治筹备处设在国民党财政厅旧址，处长为唐令欧。唐是平江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在何键的第四路军任团长和军犬训练班教官、主任等职。并由余如愚介绍，参加了国民

党的国际间谍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后在薛岳的九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高参。长沙沦陷之初，他从平江到长沙活动。由于他父亲唐炳初也曾留日，是亲日派，有些驻长日寇头目又同他们父子是旧交，因此，这一次到长沙，就住到了日寇复兴部长沙支部。该筹备处成立后，下辖内四镇和外四镇，处内分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司法等五科和秘书室、合作指导室。财政科长陈国藩，建设科长杨堃，教育科长唐耀章(先为邓某)，司法科长邓笃恭，合作指导室主任李仰贤。此外另设长沙市税捐所，唐润泉为所长(后因卷款潜逃，改任余权)。筹备处于次年五月收场，存在时间仅半年。

伪长沙市政府是一九四五年六月成立的，唐令欧任市长。原自治筹备处的二级机构，除改司法科为省检处、改警察总队为警察局外，其他无变动。

日寇为巩固占领区，进一步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将设置省级傀儡政权作为湖南复兴部的主要任务。水洛龙雄闲谈时曾对我说，他们想拉何键、赵恒惕等出面成立伪省政府，但一时无由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因此，伪省主席的头衔就有落到唐令欧身上的可能。当时，在汉奸群中唯一能与唐争宠的是黄雁九。黄是长沙东乡的大地主，早年在日本学过医，以亲日著名，嗜好烟赌。一九四四年，他自行投到“开部队”效劳，为本庄所赏识，介绍给宫永义文，一时倚为左右手。黄起初没有挂任何头衔，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日寇的红人，凡想在日伪机关中求得一官半职的，都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曾伙同汪记汉奸田练江，勾引国民党杨森、王陵基部队的团长金友松、刘天培等投敌，成立了由金友松指挥的兴亚自卫团，在长沙东乡及湘阴、平江、浏阳一带蹂躏人民。黄雁九曾扬言，省主席一席非他莫属，并向日寇表示他可

以整训“和平军”。一九四五年春，日寇成立了湖南人民粮食公司、永兴商业银行，均派黄担任董事长。黄即利用这两个经济机构操纵金融市场，掠夺民间粮食。他曾怂恿日寇继续开发湘潭锰矿，他从中主持其事。

在争夺日伪省主席的活动中，唐令欧以日伪长沙市政府为基础，积极收罗爪牙。黄雁九除抓住一些日伪省级机构外，还插手长沙县日伪组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日伪长沙县自治筹备处成立，主任辜天保就是由黄推荐的。该处各科、室、局负责人也大多是黄的爪牙，直到第二年六月，设立日伪县政府，由盛先茂任县长后，才换上盛的亲信。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黄雁九拉拢一批汉奸，拼凑了日伪湖南省政设计委员会，作为日伪省政府的筹备和过渡机构。该会设主任委员四人，即黄雁九、唐令欧、刘晴初、宋寿梅。刘晴初曾在何键的四路军总部和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任参谋长，当时是湘潭的汉奸头目。宋寿梅是浏阳大地主，何键统治时期历任县长。该会委员有辜天保、叶寅亮、刘竞西、刘郃生、刘祖茂、邓笃恭、柳菊生、汤剑萍、徐直、黄飞龙、舒辅世、汤武、局既、周可均、梁应麟、陈雨湘等十八人。主任委员四人，不分正副，反映了唐、黄争夺日伪省主席的僵局。刘、宋仅仅是作为缓和局面的陪衬。由于日寇内部意见不统一，日伪湖南省政府始终未能成立。

“三位一体”内幕

沦陷后的长沙，遍布日寇、汉奸、国民党特务和游击队，他们在奴役和剥削人民的基础上结合起来，政治上遥相呼应，组织上相互渗透，相互维持，奸特一体，日蒋难分。

唐令欧充当汉奸头目是受蒋介石集团支持的。抗战前我就认

识店，一次在日伪市政府谈及旧情，他知道我曾在报界多年，托我拉国民党长沙日报社社长周之舞下水。后来，他又托我按期送后方报纸给他看。我就陆续给他送了周之舞办的《长沙日报》和国民党九十九军出版的《阵中日报》，他给我四十万伪货币作为酬劳。一九四五年夏，我同中统特务、日伪长沙市青年队指导员谢友诚闲谈，他讥讽我说：“王绍章早就在唐令欧那里拿了很多钱，你才拿这点。人家吃头道，你吃二道。”王绍章是中统特务、“肃奸队”潜伏组长，我属他领导。我这时才明白唐令欧早与他们挂上了钩。日寇投降后不几天，中统特务胡念榆来到长沙，要我一起前往青石井唐令欧家。见面后，胡说：“我虽不在陷区，但听说唐先生在长沙维持得很好，对我们的潜伏人员也有照看。外边说唐先生还另有任务，究竟内情如何？”唐回答说：“我住在平江家中时，中央就要我跟唐生明去南京打入汪精卫的组织，我因条件未成熟，没有去。长沙沦陷后，平江县政府转来薛司令长官（指薛岳）从江西发来的电报，要我打入伪组织，我才进城。我现在还保存着电报。”他接着谈了经余如愚介绍参加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情况后，又说：“只怕外面不明真相。”胡安慰说：“既是中央要你打入的，那就不要紧，做我们这种事的，都是无名英雄。”

国民党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进城后，长沙汉奸群丑除黄雁九在逃外，自唐令欧以下，一部分被该部调查统计室逮捕关押。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军统局驻湘专员、第四方面军调查统计室前负责人金远询和继任负责人唐乘骧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处理汉奸情况。我参加了这次会。金远询当场发了一张油印的《汉奸案三百余件审理经过简要说明》，还谈了审理的大致情形。他着重谈到在审理的全部案件中，名副其实的汉奸要算唐令欧，应移交法院重处，对黄雁九却只字未提。当时在场的长沙中央日报社社长段

梦晖提出，唐曾因掩护美国飞行员而受到日本人的处分，不能以汉奸论处。后来唐令欧被移交法院审讯，胡念榆亲自出庭为他辩白，说他不是汉奸。唐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旋即“保外就医”，由其亲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署长余籍传担保出狱，潜逃无踪。

抗战胜利前夕，黄雁九终日打牌，抽鸦片，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胜利后，黄在湖北被捕；半年后，湖北高等法院认为其汉奸罪证不足，竟予释放。

金友松、刘天培等日伪军头目，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都被国民党政府委为先遣军司令。我了解一点刘天培的情况，想以揭发隐私相要挟，敲他一笔钱。当我带着日闻通讯社请求补助的信去见他时，他慷慨解囊相助，并郑重说明：“我刘某在沦陷期间始终与中央有联系。”

一九八三年二月

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

邓一超

一九四一年，日寇在我省常德地区用飞机空投大量感染鼠疫的跳蚤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杀害我国人民。当时，我在省卫生处任主任技正，曾以防疫特派员的身份，率领防疫人员前往协同防治。现就回忆所及，将日寇这次投掷细菌的经过记述如下。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十六）早上六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寇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尤以关庙街一带，投下的数量最多。

空袭警报解除后，市民将这些东西扫集拢来，共约四、五百斤（有些屋顶被击破，室内也散落了一些敌机空投的东西），除由警察局取了一点存于玻璃瓶以备检验外，余尽焚毁。

常德地方当局即将空投情况和处理经过电报省政府，并派专人将两瓶毒物送省化验。与此同时，警察局另将敌人所投下的谷麦等一包，送东门外的广德医院进行了化验。据原广德医院医师谭学华提供的材料证实，该院当时将敌机投下的谷麦取出一小部分，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然后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

用革兰氏染色法，在显微镜检视下，发现有许多革兰氏阳性杂菌，但也发现有不少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与鼠疫杆菌图谱极相似。再用无菌方法，抽出患腹水病人的腹腔积水约一百CC，分别装入三个灭菌试管内。在第一、二试管内，放入敌机投下的谷、麦，而在第三试管内则投入由当地粮食行取来的谷子少许，以作对照。经温箱培养后，取出三管中的沉渣作涂片染色检查，结果在敌机所投下的谷物培养基中，又发现有革兰氏阴性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甚多，而对照管中则未发现。

十一月五日下午，常德县卫生院、防护团、广德医院和当地国民党军警机关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敌机在常德投下谷麦及棉絮块等物的问题。根据敌机反常的空袭情况和广德医院不正规的初步检验结果，发现敌机投下物中有类似鼠疫杆菌的存在，判断敌机投下的东西是带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于是，急电省卫生处，报告敌机在常德市上空投下谷、麦等物的经过，请其即派专家前来检验，并进行防治工作。

敌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

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十二岁的女孩蔡桃儿，由其母背着到广德医院急诊。据其母诉说，她家住在城中关庙街，父亲是铁匠。先天晚上，患者吃了晚饭，到夜间九时左右，忽然畏冷、寒颤，继而发高热，周身疼痛，整夜吵闹不安，等等。经谭学华医师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界的淋巴节液，涂在玻璃片上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同敌机投下物中所发现的细菌相似。根据患者住在敌机投下谷、麦等物较多的关庙街，再联系敌

机空投的日期和发现死鼠，结合患者起病的日期分析判断，这一病例是鼠疫症。因此，收留住院，隔离治疗。当夜，患者病况更形严重，多方抢救无效，十三日上午九时许死亡，距起病时间仅三十六个小时。在死亡前，曾再作血涂片检查，发现涂片上满布鼠疫杆菌，以后在死者的肝、脾组织中，也发现有一些同样的细菌。蔡桃儿的死是日寇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的确凿罪证。

继蔡桃儿无辜死亡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上，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据后来了解，蔡桃儿一家就死去两人。疫势严重地蔓延，市民们谈虎色变。至次年二、三月间，疫情流行才缓和下来。在这一段时间内，死于鼠疫的约在六百人以上，其中大多数是腺鼠疫(淋巴腺)。

防治和证实鼠疫的经过：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政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可能性最大，但无设备证实空投物品所含细菌的性质，必须慎重处理。因此，急电重庆国民党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得到复电的大意是：不得谎报疫情，有关国际信誉。后来知道真正发现了鼠疫病人，才开始重视，派医疗防疫队到常德。其时距发现鼠疫病人已有十多天了。

省卫生处在电告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同时，向省政当局提出了假定以防治鼠疫为对象的防疫工作计划。其中主要是设置防疫管理机构，负责进行防治工作。以六个月为期，约需经费十余万元(伪法币)。这个计划提出后，经财政厅、会计处和审计处审查，认为疫情尚未证实，经费预算无所凭借，因此拖延下来，没有及时提交省政府会议正式通过。后来常德市已经发现了鼠疫病人，再次来电催促防疫，卫生处又找有关单位商洽。他们推托责任

说，这是地方性事件，应由常德地方当局拨款办理，又说事属战争性质，应由中央政府统筹拨款。经过为期一周的往返磋商，初步在省政府会议上通过了卫生处所拟订的工作计划，但经费被核减至二万余元；在中央拨款未到达之前，由省政府陆续垫付。省医疗防疫队临出发前，还是由卫生处垫借五百元才成行的。

十一月十一日，由我和护士长林慧清率领医事职业学校学生五十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到达常德后，即向专署报到，并会商防疫办法。随即开始调查疫情，召集市区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开会，宣布成立常德联合防疫处(后改为湘西防疫处)，并征求与会人员对鼠疫发生后应如何协助防治的意见。会议决定：一、迅速设立隔离医院，收治发热和可疑的病人。同时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二、敌机空投物类最多的鸡鹅巷、关庙街、高山巷划为疫区，派兵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直至疫情消灭时为止。在封锁期间，居民日用生活物资，指定购买地点，分别供应。三、在常德全市开展灭鼠灭蚤工作，动员市民捉老鼠，并规定死鼠应烧埋，活鼠须上缴。四、在常德西门外郊区建造火葬炉，专门焚烧疫病尸体，以免鼠疫蔓延。五、加强疫情报告管理。除公私医院、诊所一律登记病号，以备随时查核发现鼠疫外，并规定居民、旅社，凡有病发热者，必须报告防疫处派员调查，以便鉴定是否鼠疫患者。六、为防止疫病外传，在船舶码头、汽车站及通往乡村的交通线上设立检查站，凭预防注射证方准外出。七、开展防疫卫生宣传工作，并组织防疫卫生检查。

隔离医院设在东门外约二华里的韩家大屋，是迁走十余户居民，利用其房屋临时改建的。房屋周围挖了一条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引水灌注，使与外界隔绝，并防鼠类窜入。沟

上架设了活动木桥，以便随时出入。这个医院陆续收治了一百二十多个病人，其中多数死亡，少数得愈。原因是设备条件太差，护理质量也不好。

常德鼠疫发生后，重庆国民党军医署和卫生署，派来德籍犹太人专家伯力士（R·Polrzer），负责剖验鼠只和测定跳蚤的工作。由防疫处规定各保甲每天共送活鼠一百只，交他进行解剖。这个专家在常德工作了两个月光景，解剖了五、六千只老鼠，断定常德市流行的鼠疫是老鼠和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

火葬炉设在西门外，前后共火化了三百六十余具尸体。当时群众对火葬很有抵触，我们强迫实行，并将已掩埋的染疫尸体也挖出来火化。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一些群众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或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如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头病死了，其家属就在深更半夜偷偷地埋在自家菜园里。

为了防止疫病外传，在常德市的六个城门口都设有检查站，由防疫人员对出进行人进行预防注射。由于事前没有做好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群众顾虑很大。有的因逃避注射而偷爬城墙出城；有的半夜爬城墙进来；有的则花钱买了别人的注射证作假证明。如在农历春节前，有一个家住桃源县马鬃岭的李姓布贩到常德贩布，住在旅社中。他不愿注射防疫针，而买了一张注射证，以便出境。忽一日头痛发热，怕被发现送进隔离医院，于当夜雇舟潜行返家，第三天就死了。他家的两个儿子、媳妇和一名幼子相继患同样的病死亡，并波及邻居，共死去十四、五人。他的岳父是个巫师，闻讯赶来为他设坛祈禳，事后也得了同样的病死亡。经省卫生防疫处防疫人员由常德驰往防治，历时半个月，方得扑灭。这次在桃源县发生的是肺鼠疫流行。

后

重庆派来的医疗防疫队头一批共二十多人，由军医署训练班的细菌学教授陈文贵率领，于十一月十七日到达常德。陈文贵与我有同学关系，他听了我们介绍防治情况并检查了广德医院所制的染色细菌玻片之后，说：“根据流行情况和证据看来，鼠疫是很可能的。但政府考虑是否真正为敌机投下的鼠疫杆菌，还须作尸体解剖，剖验得到确切证明后，方可肯定。这样才能使国内外科学界信服无疑。”我当时对他说的这番话深为不满，因为他对地方的疫情报告太不信任了。但他是中央派来的，自己对于细菌学没有他那么熟悉，又拿不出实验证据，只好唯唯听命，并设法找一个疫死的尸体给他作剖验，以便把日寇进行细菌战的罪行肯定下来。

恰好在十一月二十日傍晚，防疫人员在常德东门外拦住了一副抬往郊外埋葬的棺材。死者龚得胜，是个住在鸡鹅巷的裁缝，当天上午因病身死，其家属怕遭火葬，故潜行抬往郊外掩埋。拦住棺材后，防疫人员勒令抬往隔离医院的外围空地上，同时派人看守。次日，由陈文贵和我共同进行尸体解剖。我们将死者心脏的血，以及从肺、肝、脾、肾和腹股界淋巴腺取出的汁液，当场作玻片染色，并将血及器官的汁液注射到四只荷兰猪和两只兔子的腹腔内，同时还作了细菌培养等程序。从玻片染色的材料所见到的细菌，与广德医院所制的两张玻片上的细菌形态比较，不仅完全相同，而且更加清楚。至此，陈文贵才表示，当真象鼠疫杆菌。上述用作试验的动物，在两三天内都病死了。我们又对这些动物进行解剖。此时细菌培养基上的细菌也生长出来了。经过检查，发现无论是动物体内的或培养基上的细菌，都与死者体内的细菌一模一样。在真凭实据面前，陈文贵承认常德的疫病是鼠疫杆菌所致，并根据他们自己的调查材料，判断为敌机空投物品所

导致的鼠疫。他将这些情况立即电告重庆军医署，建议加紧防疫工作。

常德鼠疫流行严重并经过剖验证实以后，中央和省方陆续派出了二十个医疗防疫队约二百余人，在常德进行紧张的防治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预防措施。例如，敌机空投物类较多的地区，都经过“滴滴涕”消毒两三天后，才解除封锁，严格执行交通检疫制度，由外地来的船只，一律须距河岸十丈左右停泊，等等。全市防疫工作，直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才基本结束。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滔天罪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却没有报道过片纸只字。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也没有向远东国际法庭正式提出控诉，这是使人无法理解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按：为了使本稿内容更加充实，我们曾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前往常德市调查访问。常德市政协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应邀到会的有当年目击日寇投掷细菌以及从事防治工作的陈若水等先生。他们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提供了一些第一手材料。会后，又收到原常德广德医院医师谭学华的来稿，叙述日寇在常德投下细菌的发现经过。我们根据座谈会记录和谭学华来稿，对本稿作了修改补充，并经过作者校阅认可。

一九四三年日寇在厂窖的大屠杀*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滔天罪行。一九四三年五月发生在我省汉寿县厂窖的大屠杀，就是其中极为凶残的一件。

厂窖，是湖南汉寿县当时的一个乡——作新乡（现在是南县厂窖人民公社），有四千多户，将近二万人口。它位于南县西南洞庭湖的北岸，正处在澧水和沱江的下游。这里，沟港纵横，田土肥沃，盛产稻谷、棉花、苧麻、湘莲、鲜鱼，是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

日本侵略军攻陷洞庭湖滨的南县、安乡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使湖区人民陷于敌人魔爪之下。灭绝人性的日寇，在厂窖周围二十华里的地区，进行了三天血腥大屠杀，烧毁了无数的房屋和船只。

对于这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上从未揭露过，官方作战报告中也只字未提，仿佛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他们有意识地掩饰自己消极抗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

* 本文是根据一九六五年九月实地调查访问的纪录，同年十月十八日厂窖公社人民武装部提供的补充调查材料，并参阅了李震一所写有关厂窖血案的稿件和其它文献资料，加以综合整理的。

国民党军临阵溃逃

一九四三年夏，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夜，华中战场日寇配合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纠集兵力，向洞庭湖西北地区进犯。

日寇这次的进犯是蓄谋已久的。其主力从华容、藕池口出发，又从岳阳调集大批汽艇，自洞庭湖东部出犯，围攻南县、安乡。驻扎在这一带的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和第四十四军，在日寇的大举进攻下，土崩瓦解，临阵溃逃，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南县、安乡相继失守，日寇的铁蹄蹂躏到汉寿县境。

其时，南县、安乡和华容三县大批扶老携幼的难民以及公务员、警察、学生等，慌乱奔命在萧公庙、西港、草尾之间一段狭长的地带。由前线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也夹杂一起，乱作一团。他们准备由西港逃往洞庭湖南岸，但是日寇已四面包围了。

日寇三千多人，汽艇六十多只，从陆上、水上分几路包围厂窖，空中则有飞机不断低飞侦察，更番扫射，掩护地面部队前进，形成了以厂窖为中心的包围圈。日寇开始包围时，国民党军队东冲西窜，想夺路逃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在萧家湾争先恐后地抢渡过河，有的卸下铺家住户的门板，有的寻找树条当作渡河工具，结果因渡河而淹死打死的不知多少。大多数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国民党官兵三五成群，将轻重武器任意丢在德伏、全固、连续等内湖和其它沟港河汊里^①，拦路抢夺老百姓的衣服，给自

① 我们这次到厂窖调查时，据群众反映，国民党军队丢下的轻重武器，除当时被日寇捞起运走一部分外，近几年来，当地农民在挖粪池、修路、开港、整堤时，还挖出过不少枪支。有的农民在莲子港外河打鱼，也多次捞起过枪支、手榴弹。现在保存在厂窖公社人民武装部的一挺捷克造轻机枪，就是一九六四年冬积肥运动中在全固湖挖出的。

已穿上逃命。

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五月九日，细雨霏霏，乌云密布，大地笼罩着惨淡阴森的气氛。从鸡窝岭渡河以及由汀溪洲南下的日本兽军，开始把魔爪伸向厂窖一带。

早饭过后，全副武装的兽军，象一群恶狗向厂窖东边的瓦连垅扑了过来。农民陈腊九身躯高大，兽军一见面就把他捆在屋前的大杨树堍上。经过一阵野蛮的拷打之后，突然用尖刀剖开他的肚子，血流满地，顿时惨死。

兽兵端枪、举刀，在垅子里横冲直撞，见人就砍。贫农王长生的父亲，被手持大刀的兽军“咔嚓”一声砍倒在地下，接着又在肚子上戳一刀，结束了生命。王长生在麻地里熬磨了大半天，也被三个兽军发现，一刺刀刺在左手上，倒地以后，兽军又在他胸脯上刺进一刀。发狂了的兽军，用脚把他踢翻过来，在背上及两腰边各剜了一刀，使他立时昏过去了。王长生至今身上还有五处明显的伤疤。农民王仲林一家人没有跑得赢，被兽军堵住了大门，父亲王树清刚从田里用牛上来，走到门前就被兽军狠命地当胸一刀，砍死在禾场上；弟弟王达章躲在门弯里，被兽军发觉，抓住刺了五六刀而死；岳父和岳母躲在他家，同样死在兽军的刺刀之下，连一个不满十个月的小孩，也被兽军一刀刺死了。

当时，入了反动会道门同善社的宋梅甫一家，专搞迷信活动，扬言只要躲到他家里，就可保生命安全。因此，招引许多人到他家躲难。大屠杀开始了，兽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宋家，见人就杀，无分男女老少，结果一共杀死了八十多人。

方圆四五里的垅子里，到处是一片恐怖，逃命的老百姓，东

一群，西一堆，跌跌撞撞没个归宿。这都是被兽军烧屋杀人时撵出来的。从梅家障到风车拐三里多长的堤上，兽军紧紧追杀，杀死杀伤了好几百人。有的农民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中，还不停地喊“救命！救命！”

在厂窖北端的裕成垸，日本兽军挨家挨户地进门搜查，把人们赶到禾场上，四面架起机关枪，逼迫人们成排地跪下。然后喊起年轻力壮的男子，到沟港里去摸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枪支；年轻的妇女则被拖进屋里去强奸。贫农廖翠槐跪下后又被掳去当伕子，他亲眼见日本兽军五花大绑的绑着三个年轻人，被刺刀戳死在堤上；另外绑着一个老年人，也在堤上被杀得半死不活。恶魔们沿途抓人，抢东西，把抓到的一百多人反捆在地主杨伯辉屋后的两排杨树上，每株树上捆三、四个人。一个腰挂大刀的兽军军官下令用机关枪密集扫射，霎时间枪声一响，绝大多数人饮弹殒命；少数没有打死的，兽军又用刺刀乱戳，一个个被杀得鲜血淋漓。

五月十日是日本兽军在厂窖屠杀的最高峰，兽军象发疯一样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青年妇女便强奸，奸了以后又杀。贫农刘子福的哥哥胸部挨了鬼子几刺刀，辗转在地上打滚，求死不得，他父亲也被杀死在屋后面的沟里。鬼子走后，他不顾危险下沟去掏父亲的尸体，简直插足不进，因为这一条四丈长、八、九尺宽的小沟，就丢进了上百具尸体。

瓦连垸农民粟显光全家六口，被四、五个端着刺刀的鬼子包围在家，他本人想逃走，刚冲出大门就被一个鬼子一刺刀刺死了。大弟弟看到哥哥被刺死，想找东西反抗，不料被另一群鬼子发现，猛扑过来抓住他，一阵乱刀将他活活砍死。第二个弟弟刚逃出门口，又死于敌人的枪弹之下。其母亲和一个十来岁的侄儿，也同

样被鬼子刺死，只剩下弟媳周菊秀被鬼子轮奸后，气息奄奄。还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其媳妇因怀孕快分娩了跑不动，被赶上来的鬼子捉住，在她肚子上猛刺一东洋刀，快临产的婴儿，从母亲肚子里鲜血淋淋地流出来，一抽一搐地颤动，鬼子们却毫无人性地拍掌哈哈大笑。

日寇的汽艇上架着机枪，经三岔河到龚家港后，端着三八大盖枪的兽军，马上蜂涌登陆，见人就捉。捉到的人，都被一串串押到龚家港尾西头河滩，用机枪扫射。只有一个姓鲁的人死里逃生，侥幸跑出来了。在日本兽军的疯狂屠杀下，从萧家湾到莲子港、龚家港一带的沙滩上，到处有死尸堆积，不知牺牲了多少同胞。

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厂窖地区，大屠杀的方法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他们除了任意枪杀、刀刺和用粗棍在身上乱打以外，还使用了绞舌头、刺肛门、火烧、盐腌等等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汀汊洲的陈况生、陈若林两兄弟，被日本兽军捉到后，先用刺刀绞舌头，再在口里灌泥沙，最后用刀剁成几块，丢在哑河里。罗裁缝一刚满周岁的男孩，被兽军一刺刀从肛门刺进去，顿时毙命。贫农毕成举的幼儿睡在箩筐里，兽军烧屋时被活活烧死，他自己挨了七刺刀，被摔倒在堤滩下，立刻晕死过去了。陕北一个姓周的农民，被兽军剁了好几刀，通身抹些盐，再用坛子在身上乱滚，周身磨得皮开肉绽，动弹不得。抬回家后三四天，就因头部溃烂死了。九十多岁的戴老婆婆，来不及逃走，被兽军杀死在自己屋里的水缸旁边。德伏湖陈姓妇女的周岁孩子，被两个兽军一丢一刺，活活给刺死了。农民高华丰的孙子才一岁多，也被兽军当胸刺一刀，扛在肩上走，走了半里多路，顺手往烧屋的火海里一丢。

日本兽军的野蛮的屠杀，曾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莲子港人

杨素凡，在当地小学担任语文教员，兽军用刺刀刺他时，他不顾一切地握住敌人的刺刀，结果两只手的手指全被砍掉了，恼羞成怒的兽兵立刻将他杀死。农民胡百挑抢住一个兽兵的刺刀，一拉一扯，他的手指割断了，当场被兽兵活活刺死。弟弟胡百兔，跟两个兽兵扭作一团，结果还是被杀死了。

厂窖大屠杀的被害者，有本地居民，有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更多的是附近各县逃来的人。从南县逃来的难民，有的在船上被杀害，有的刚上坡就被兽军抓住杀掉了。莲子港上坡的一个地窖里，竟丢了七十多具尸体。国民党南县县政府的人员逃到厂窖时与敌人遭遇，都被打死打伤或者被俘。有些人在逃散后又被兽军捉到杀害，如会计黄某躲藏在一户民家的床底下，被拖出来杀死的。被俘的人，有的虽幸免一死，也受尽了侮辱。有一个职员身受兽军七刺刀，半夜从死尸堆中挣扎起来，因地形比较熟悉，得以死里逃生。一个逃出来的乡长又被抓了，兽兵在晚间饮酒时，把蜡烛放在他的头上点着，用人头作灯台，借此取乐。

以上所述，只是厂窖大屠杀中一些零星、片断的资料，但是，也如实地揭露了日本兽兵的凶残暴虐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这次大屠杀连续了四天，究竟死难人数有多少呢？据厂窖公社人民武装部的调查材料，总数达二万四千多人^①，其中本地居民有七千多人，外地难民一万二千多人，国民党军队五千多人。现在的全成大队第一生产队，大屠杀时是作新乡五保四甲的半个甲，共有五十户，二百多人，就被日本兽兵杀死了八十二人，全家杀绝的有四户人家。此外，五保三甲被杀害的有九十七人，全

^① 加上厂窖附近武圣宫、三岔河、游港等地死六千多人，总数在三万人以上。

家被杀绝有十一户。一两个甲的情况如此，整个厂窖地区的杀戮之惨，也就可想而知了。

穷凶极恶的日本兽兵，随时随地蹂躏我国妇女，来满足他们的兽欲。荷花咀街上妇女熊菊之，在厂窖观音堂前面棚里被强奸后，兽兵又用酒瓶塞进她的阴部，肿痛流血不止，拖了三、四天才死去。十五岁的少女云金秀，被兽兵拖到麻地里轮奸后，躺在地上寸步难移，事后经人发现，才背回家里。五保三甲五十多户，就有几个妇女遭到兽兵强奸，有的被三、四个兽兵轮奸。在好些地方，兽兵强奸我国妇女之后，又把被奸的妇女杀掉。对毫无人性的日本兽兵来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由外地逃到裕成垸的两父女，女儿只有十六、七岁，被兽兵捉住要强奸时，她坚决抗拒，父亲也苦苦哀求。兽兵脱下她的小衣，用刺刀猛刺阴部而死。求情的父亲也同遭杀害。

兽兵分批分段地进行搜杀，杀了第一遍，唯恐躺在血泊里的有呻吟未死的人，于是另一批兽兵又来进行复查，查了一遍又一遍。兽兵们在屋里进行复查时，床底下、草堆中、地窖里，检查得非常仔细；在杀人场上复查时，用粗棍或枪托尽力敲打那些被害者，听到略有呻吟，便立刻补上一刀。有的人被杀得半死不活，神志还有些清楚，急忙忍痛屏声地忍受着兽兵的敲打，幸免最后一刀，才保全性命。

除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奸淫以外，日本兽军还大肆烧毁房屋、船只。据一些目睹者控诉，兽军进入厂窖地区后，边杀人，边放火。一栋栋的瓦屋或茅屋，被兽军放火烧掉了。瓦连垸三里半的长堤上，有一百多栋房屋，全部烧光。烟火弥漫，鸡犬不留，到处是一片火海，枪声、马嘶声和鬼子的嚎叫声。人们在火海中踉跄奔命，惶惶然不知逃向何方是好，有些人冲出火场，又被兽军

乱枪打死。

当时从太白洲、厂窖、汀溪洲到龚家港的河里，摆满了船只，都是华容、南县、安乡等县逃难来的。因为下面的河道被日寇的汽艇截住了，无法走出去。兽军一来就大肆烧船，他们把船上的篾蓬子扯下来，淋上汽油燃烧，顿时火光四起，沿河十里，烈焰腾空。所有大小民船全被烧光。历时四天四夜的惨痛浩劫，烧掉了二千五百多只木帆船，三千多间房屋。

日本兽军来到后，所有人民财产未及转移的，均被洗劫一空。小孩颈上带了银钏，马上就有脑袋搬家的危险。瓦连垸农民帅海清的妻子，手上带有两只玉钏，被兽军抓住剁掉了一双手，抢走玉钏，最后连痛带吓地失去了知觉。所有民间的车辆、牲畜、粮食、衣服、银钱等，都被兽军掠夺一空。

这些兽军在烧杀抢劫的同时，对中国人民财产的糟蹋破坏，无所不尽其极。他们住进民家后，有柴火不烧，把大红衣柜、雕花木床打烂做柴烧，抢来的猪、牛不杀，而活活地在猪、牛屁股上挖块肉吃。在玉成垸一带，将没有烧光的谷米撒满大堤，作雨天垫路之用，临走时，还在没有吃完的饭菜上屙些屎，在不爱吃的坛子菜里撒些尿。总之，他们不让留下一样好东西，以逞“皇军”的威风。

兽军窜犯到厂窖以后，还掳去一些精壮男子给他们当伕役，逼令抬炮、挑运抢劫到手的东西。单是瓦连大队第四生产队，当年就被抓去十六人，至今音讯杳然。

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厂窖地区大规模的屠杀、奸淫、纵火、破坏、掳掠等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国民党自欺欺人的谎言

日本兽军的汽艇，从草尾、茅草街过河，到西伏垸，再到龚家港，另一路从藕池经安乡、武圣宫到萧家湾。在汽艇上登岸的兽军，配合陆路上的兽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厂窖地区长驱直入时，国民党一两个军的部队，吓得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正当日本法西斯兽军在厂窖血腥屠杀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关，恬不知耻地制造谎言，说什么“敌艇围拢洞庭南岸，迭次登陆均未获逞。南县东南我军，奋力击敌。”^①“我军在洞庭湖西南两岸以新阵容出动后，滨湖战局已趋稳定。沅江、汉寿、常德、澧县、津市均安谧如常。”^②真是自欺欺人。

尤其无耻的是，在厂窖大屠杀一周以后，国民党第七十三军的残兵败将，早已狼狈不堪地退到了沅江县，重武器全部丢光了，军长汪之斌本人也蓬头垢面，靠着他的秘书带路，化装逃到了沅江，惊魂未定。这时候，中央社却还在吹嘘“我汪之斌部与敌作殊死战，前仆后继，伤亡殆尽。”^③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普遍报道了“南县县长黄其弼壮烈殉职”的消息：

“南县县长黄其弼氏，于此次洞庭西北战役中，在县指导民众，协助国军作战，始终未离县城一步。及敌军窜入县城，黄氏仍继续奋战，誓与城共存亡。后虽为僚属强拉登舟，

① 中央社重庆五月十日电。载一九四三年重庆、长沙各报。

② 中央社长沙五月十一日电。载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重庆、长沙各报。

③ 中央社长沙五月十九日电。载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重庆、长沙各报。

终被敌寇迫及殉难。湘省府对其临难不苟，壮烈牺牲之精神，深表钦敬。除已发给黄氏家属恤金五万元，并入祀忠烈祠外，复呈请中央从优议恤，以慰忠魂，而励忠贞。”^①

几天以后，各报又登载了湘省各界发起追悼黄其弼的消息。据说薛岳还以兼省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在耒阳（当时省政府所在地）举行的追悼会。他对黄其弼的“临难不屈，以身殉职”，深致哀悼之意。并宣布从优给以抚恤。

黄其弼果真“壮烈牺牲”了吗？没有。他在南县沦陷前不久，带着县政府一批撤退的人枪，仓皇离开县境，本想由水路退往沅江，因中途遇敌汽艇，又改向厂窖行进。后来，黄其弼逃出来了，到长沙见薛岳，薛借故不见。大概是因为原来决定要“入祀忠烈祠”的“好男儿”，竟没有按照他的主观愿望“壮烈殉职”，感到有些尴尬吧。

劫后景象触目惊心

经过日本兽军一场极端野蛮的大屠杀以后，厂窖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凄惨景象，以致后来有人称之为“惨窖”。

在厂窖，无数同胞遭到了屠杀，堤边，沟港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被刀砍、枪杀的男人、小孩和被奸淫后复遭杀害的妇女们的尸体，四周淌着大滩的污血。太阳一晒，臭气薰蒸，人们过路时，总要扯些艾叶捂住鼻子。梅家障的一条沟里，泡了百把具死尸；后来草草掩埋了，每逢阴天下雨时，还在出血水。好些田边的粪座，成了埋人的土坑，有的一个坑里埋了五六十具尸体。

^① 中央社长沙五月十九日电。载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重庆、长沙各报。

德伏、全固、连续等三个内湖的水都染红了，泡满了尸体，变成了三个血湖。

许多村庄烧成了一片瓦砾。举目望去，到处都有烧塌了的房屋，树木烧成了焦炭，硝烟味浓烈扑鼻，窒息着人们的呼吸。地里，土里，扔着大包小包的包裹。沱江河里漂满了烧焦的破船，在劫后十来天里，天天有尸体顺流而下，群众不敢下河担水吃。劫后景象，真是惨绝人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日寇在岳阳的暴行和血债

吴健人 任伊平 刘又闻 吴荫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上旬，日寇由武汉分两路进窥湘境。一路溯江而上，于十一月十一日清晨抵岳阳县北城陵矶，当晚即窜据县城。一路沿铁路以东地区梯次并进，十三日抵县北的西塘、白湖与原四区的小桥坳等地；翌日继续南犯，直抵新墙河北岸。先头部队渡河后，越过县南黄沙街、洪桥一线，窜入湘阴边境的大荆街与长乐街地区。二十日起，全部撤回新墙河北岸据守。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时为止，盘踞县境达七年之久。因此，我县人民遭受日寇洗劫、烧杀，较之本省其他地区更为惨重。据国民党岳阳县政府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日寇烧毁的民房达九万八千余栋。以县城来说，先锋路、棚厂街、县门口、学坡岭、滨阳门、卫门口与西门正街等处，完全成了一片瓦砾，幸存的房屋极少。农村情况也很凄惨，日军足迹所至，人民的财物、牲畜、房屋尽遭洗劫。特别令人痛恨的是，无辜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经围掳后，便成为日军天绝人性地侮辱、蹂躏和残杀的对象。据统计，我县因被轮奸、强奸而死的妇女，遭集体屠杀与零星捕杀、烧死、溺死的群众，达四万人以上。至于被掳失踪与受战祸拖累而冻死、饿死、病死的人，更难以数计。

岳阳沦陷之前，城内居民即已逃避一空。日寇进城两日后，设立警备司令部，并划定梅溪桥为难民收容区，由宣抚班派人四

出招诱居民回城，但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所收容的只是仓促未及逃走的少数老弱病残而已。

最可耻的是一小撮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早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中接受了投降哲学的真髓。当日寇还在武汉时，就准备好了迎接“皇军”的计划。汉奸费竹如、周勉之二人潜赴武汉接头，岳阳沦陷的第二天，他们就公开出面活动，组织维持会，分任正副会长，配合宣抚班，大唱“日华提携”、“共存共荣”等无耻滥调，并布告城乡“踊跃输将”，“协助皇军作战。”在他们的布置和诱降下，前岳阳县中校长方大猷（又名畅九）与曾经留学日本的冯宜伯，出任伪县长与伪主任秘书的职务。县以下的地方维持会，也在他们的策划下相继成立。所有这些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傀儡，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例如，金沙乡大地主梁燮洪，早在一九三九年秋日寇跨过新墙河后，就急忙携带猪羊等礼品，到长湖镇上迎接，随后在米广山办起地方维持会，逼奸妇女，勒索财物。直到一九四一年冬，由于民愤极大，才畏罪自缢而死，由另一地主周佑生继任维持会长。黄沙街镇的维持会，则由平桥河地主何被秧等出面组织。他们在各地设立招待所，利用一批流氓地痞充当爪牙，肆行搜括。招待所里应有尽有，除酒肉和鸦片、赌博外，还强拉妇女逼充临时营妓，以博取日军的欢心。但日寇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三五成群地四出劫掠财物，强奸妇女。当他们兽性疯狂发作时，虽六旬老妇、十龄幼女，也不能免遭蹂躏。甚至颠倒伦常，逼令父奸其女，子奸其母，日寇则旁观鼓掌，发出狼嚎般的狞笑。倘有违抗不从，立即当场刺杀，血肉横飞。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五名日寇在金沙乡上甘冲屋掳一少女轮奸后，不顾她已奄奄一息，又强逼邻舍六十八岁的吴葵清去行奸。吴愤怒已极用拳头击日寇，当场被日

寇用木棍活活打死，倒插于粪窖中。双冲屋吴晚家（二十五岁）被日寇掳获欲行强奸，她诱敌至水边，乘隙纵身跳入塘内，当即被日寇开枪射死于水中。蒋天垅的蒋吴氏力拒奸污，用菜刀砍伤敌手，结果连她的丈夫蒋味书及弟蒋魁元、邻人傅坤臣都被日寇当场杀害。又，曲家冲的陈蒋氏、傅家墩的朱吴氏、渠许的许满姑、同屋的李张氏、杨轩的杨周氏、李家庄的李氏、梁家墩的梁吴氏、烟家塘的梁氏、肖家墩的梁氏、熊家嘴的胡孙氏，都是被掳后因拒奸与敌格斗而死的。类此事件，不胜枚举，在国民党县政府的残余档案中，尚有记载可查。此外，麻塘章姓大屋章某被寇掳去挖战壕，因体弱动作缓慢触怒了日寇，适有人挖出四脚蛇一条，日寇即逼他活活吞食，顷刻毒发，肢体肿胀而死。原七区火家岭村庄有居民七十余户，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日寇前去扫荡时，青年男女闻讯逃避一空，仅留老农四人守屋。日寇纵火烧屋时，将六十二岁的周学忠、六十九岁的王东海、五十八岁的杨显清三人捆绑投入火中活活烧死。留下五十七岁的许清述给他们挑了一天水，临走时也绑在树上烧死了。

日寇对我县同胞进行集体屠杀的暴行，更是惨无人道。兹纪述几个典型血案如下。

（1）一九四二年十月，日寇在原七区的奸掠暴行，激起当地人民的切齿痛恨，自发地夺枪袭击敌人的事件日益增多，抗敌武装组织也活跃起来。湖北白螺矶与岳阳城陵矶两地调来的日寇旅团长池田和伪保安团长李瑞臻率领所部，配合当地伪军，以“清乡”名义分别驻扎在昆山、罗坳、黄土咀与山望冲等处，包围了洪山一带纵横二十华里的地方，大举扫荡，历时七天七夜。日伪军先将洪山、廖家桥、罗坳至珊栖港一带房屋尽行焚毁，然后四出搜捕逃往山上的居民，先后集中到附近五个刑场，分别用机枪、手

榴弹和刺刀进行屠杀。事后，仅在珊瑚港一带棉田里就发现尸体五百多具；另外死于池塘、路边以及山林的，共计有一千八百余人。洪山附近花屋胡家、刘古望与云家坳等屋场七十余户均被杀绝。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民间称为“昆山血案”，也有称为“洪山血案”的。

(2)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寇在原四区新墙河南岸漳溪街巷里屋场后的小塘滩上，把从附近抓获的居民二十六人，挨次逼令跪在塘滩上，用刀砍头后，将尸体踢入塘中，登时鲜血染红了满塘清水。该地余全万屋场余湘爹一家六口，大媳妇被日寇轮奸后抛入塘内溺死，小媳妇被日寇兵掳去，老嫖倌活活烧死在余全万屋内。其余长子余磨生、次子楚仔和他自己都被砍头抛入塘内。当地人民至今称小塘为血水塘。

(3) 一九四一年十月，原四区上垅湾余家墩方大彩的次子方朝佩与余芹芳次子余幼伢，因仇恨日寇暴行，乘隙共同杀死一日军军官，被日寇抓住，连同方大彩本人、女儿方友龄、以及余芹芳的妻子刘氏并三子、四子共七人，带至敌驻地。日寇剥去他们的衣服，嗾使一群军犬活活地将他们咬死后，即用尸体喂狗。

(4) 一九四二年十月，原三区金沙乡人民，乘夜将该地米家庄与齐家门两处日寇临时修筑的汽车路与小港所架便桥破坏，翻毁日寇军车四辆，日军官兵死伤五人。于是日寇先后从该地附近黄伏里、晓里冲、肖家坡、梁德新屋、梁德大屋、谢公道、烟家塘、杨家里与米家庄等村围住居民共一百六十七名，分别牵至烟家塘后坡与米家庄等地进行屠杀。在烟家塘后坡被杀死的人，都是用绳索绑在树上，然后用刺刀贯穿胸部，让被刺的人慢慢流血痛死。当时有个青年农民黄义洲，同在绑杀之列。他眼看凶犯快到身边时，拼命鼓足气力将绳索挣断，侥幸从虎口逃出。其他当

场被刺死的人，由于痛苦不堪，有的嘴角抽搐，有的两脚在地上踢出了一个坑，有的反过头去将树咬了半边，有的死后弯着腰，象一张弓挂在树上，惨不忍睹。

(5) 日寇二次进攻长沙未逞、退回新墙河北岸时，到处搜索掳掠。有一次，日寇搜索到麻塘区麻布大山小坳西麓的章姓二屋，将藏匿在屋内的十余个男子牵到屋前塘边用机枪扫射，塘水为赤。

(6)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日寇在徐家凉亭一带掳获男女百余人，带至许佐卿屋前八斗丘田中，四面包围，用刺刀和指挥刀进行一场血肉横飞的屠杀。当时有的群众凭着赤手空拳与日寇进行搏斗，但终无一幸免者。

敌人的疯狂屠杀与蹂躏，不仅没有吓倒岳阳人民，反而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和仇恨，自发抗击敌寇。有的自动协助中国军队运输，或者侦察敌情，充当向导，有的敢于赤手空拳与敌人作生死搏斗，有的参加地方游击队，配合军队进行敌后袭击。因此，在抗日战争后期，日寇三五成群四出劫掠之事大大减少了，而大队人马的“清乡”、“扫荡”大屠杀，随之相继发生。从下面一些抗日事迹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广大人民英勇不屈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窜据原七区小桥坳后，四出劫掠。适当地人民收得国民党溃军散枪二十余枝，组织起民众抗日武装（任伊平参与其事），乃乘敌至增衣坳（离小桥坳五华里）劫掠时，予以伏击，杀死日寇一人。随后日寇率队伍百余人并马驮小炮两尊来围捕，纵火烧掉方塘周其昌新屋一栋。群众乘日寇纵火时，突然从方塘后山鸣号出击，毙敌四人。日寇仓惶逃遁，丢下炮两尊、马两匹。

同年十月，驻新开塘西塘与上龙湾桥附近村庄的日寇，肆行

奸淫掳掠。当地大山农民廖山阶，愤恨日寇暴行，投身地方游击队充当侦探，经常出入于日寇周围，予敌以沉重打击。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寇侦知，乘他回家，派兵逮捕，绑在树上，用煤油淋烧，廖山阶从容就义。

一九三九年冬，黄沙乡贫农尹端选、周沧波、周宜春及贫民君玉山被掳后，拒绝为日寇带路，并拒交少女，怒骂日寇，与敌搏斗，均惨遭杀害。永美乡农民蓝碧光、廖竹林、袁清辉、李仁义、彭德明、罗义士等为抗日军队作向导及运送弹药，在战斗中均不幸中弹阵亡。

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开乡农民李湘涛、傅功吾、易胜清、廖言生、刘伯生、廖阶生、廖忠义、廖士生、廖廣寿、谭江帆、邓定洲等，协助抗日军队充当向导，运输弹药。除刘伯生谭江帆二人负重伤外，其余均阵亡。

同年十月二日，协南乡农民汪青山，年三十岁，自动参加游击队，担任侦察，率队袭击日寇，首先潜入敌军驻地大平坳，被敌发现捕获，用开水灌入口中烫死。

十月三日，协南乡农民蒋生勤、蒋克勤、黄任荣、黄春荣、杨铁等五人，被日寇掳去带路。蒋生勤知我军游击队在原三区黄伏太设有埋伏，乘机引日寇进入包围圈，毙敌五十余人，缴获武器甚多。蒋生勤等五人，当时亦被敌杀害。

十月二十四日，协南乡中心学校学生金继贤，年十四岁，被日寇所掳，勒令带路。金继贤乘机引敌进入抗日军队的埋伏阵地（湘阴金沙里），毙敌八十余人。日寇恼羞成怒，立即用刺刀杀死了金继贤。

十月，日寇二次进犯长沙未遂退回时，有一股日寇由高桥经三港咀北撤，路过官堂田周家。当时有彭有客之妻周氏、谭周铺

屋谭光彩之妻李氏、谭安仁之妻周贤珍、谭体光之妻汪三珍等四人，躲藏在一草楼上，被日寇发觉，将该屋围住，呼叫她们下楼。她们明知下楼必遭奸污，坚定地守住楼门不下。日寇蹂躏未遂，纵火焚屋，四个妇女壮烈牺牲。又原二区马家坡妇女易环，年二十六岁，被掳后拒奸，与敌格斗，惨遭杀害。新墙河北岸童城桥青年应申生、系哑巴，参加河南岸的人民游击队。某次回家侦察日军情况，被驻在附近晏家大山日寇获悉，将他唤去，用军犬咬死。

十二月，金沙乡农民蒋清和、李和清、李少成、张文周等四人，先后被日寇掳去带路。他们乘敌不防，夺取武器，杀死日寇，带伤脱险。又农民柳长青、黄文昇二人，合力擒获日寇上村省三，装在麻袋中送交县政府。

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金沙乡农民张正秋、谢乃宾，乘日寇撤退时，主动为追击部队当向导。他们携枪走在队伍前头，在湖仙山地区发现大队日寇，即从侧面突然向日寇猛烈射击，后在追击部队包围下予敌以重创，缴获甚多。

同年十一月中旬，原四区新墙李时禄，农民李楨祥之子，年二十余岁，深夜率挺进队于上屋大塘冲袭击日寇，自己由屋后高塍上用绳吊下去，携带轻机枪一挺，手榴弹多枚，与挺进队前后夹攻，将盘踞在大塘冲的日寇三百余人全部歼灭，缴获武器弹药甚多。

同年十一月，金沙乡农民梁盛生、梁质臣，利用手榴弹与火药爆炸日寇仓库两座，二人以身殉国。又大山屋农民蒋福成、下甘冲农民吴理成，罗家堰农民陈光前、荷盘铺农民侯玉林、江家元农民蒋素琴、湖仙山农民吴俊全及荷盘铺青年农民侯文安、潘树松、徐义祥等，均系在破坏日寇交通或夺取日寇武器时，以身

殉国。

同年一月，日寇由长沙退回新墙北岸后，在高地架设大炮，使南岸国民党部队不能凭河防守，日寇却经常过河打捞。某次到南岸任福屋行劫，有任蘊农父子二人，仓促未及逃避，日寇进屋即开枪射击。任子被打死，任蘊农也应声倒伏于天井边，幸未中要害。日寇随即纵火焚屋，扬长而去。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当日寇大举南犯攻占长沙时，后续部队源源南下，沿途劫掠。从日寇刺刀下逃出来的金沙乡农民黄义洲，由于仇恨日寇的血腥暴行，连续夺得敌人不少武器，并自动组织游击小组，袭击与阻击宿营及南进的日寇，缴获甚多。

一九四四年十月，有岳阳、临湘交界处桃林乡农民王吉生，在日寇由洞庭湖水路登陆时被挟带路。他知道抗日军队预埋的地雷所在，即诱敌进入地雷阵地，自己撞线触发地雷，与日寇同归于尽。

以上所述岳阳县人民英勇抗击日寇，壮烈牺牲的事迹，仅是我们调查所得的一小部分，遗漏甚多。尚望知情者予以补充，以彰忠烈。

一九六四年四月

编者按：我们将本稿寄请岳阳市政协审阅。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岳阳市政协樊友芝副主席邀请知情老人高冰绪（中学历史教师。已退休）、冯大德、易植吾等，进行座谈讨论。他们对日军在岳阳暴行有亲身经历和见闻，认为本稿所述史事真实可靠，并就稿中某些地名、人名的讹误作了更正。特致谢忱。

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赵子立

一、国民党第九战区的成立和辖区

抗日战争时期，第九战区于一九三八年武汉战役时成立。辖赣西（鄱阳湖西部属九战区，东部属三战区）、鄂南（长江以南属九战区，以北属三战区）和湖南全省。由陈诚任司令长官。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薛岳代理陈诚的司令长官。

一九三九年日军陷南昌，赣江以东划归三战区。一九四〇年第六战区成立，临资口以西划归六战区，至一九四四年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才又将沅江、益阳地区的部队临时改归九战区指挥。

二、第九战区的地理形势

第九战区的地理形势，东面是鄱阳湖和赣江，西面是洞庭湖和湘江。赣江、湘江之间有幕阜山脉、罗霄山脉、武功山脉。这些山脉的东斜面直到赣江，其西斜面直到湘江。故九战区的地理形势大体说是东西对称的。

三、对日军进攻长沙的估计

一九三九年夏，南昌失陷后，九战区对日军进犯长沙的企图作了如下估计。

（一）日军将以主力使用于岳阳、通城方面，其重点将保持于

左翼（即新墙河上游——汨罗江上游——平江地区——浏阳以北地区相连之线上）向长沙包围进攻。这是基于日军的惯用战法（即包围和利用地障包围）和战场地理形势（即利用洞庭湖、湘江这个地障进行包围）来估计的。

（二）在进攻长沙时，日军或将以一部分兵力由江西武宁地区和高安地区向西进攻，以策应湘北主战场方面的作战。

四、我军作战计划

根据我军保卫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和上述的地理形势与敌情估计，来策定九战区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的方针是：以“后退决战”之目的，先以一部兵力利用第一线至长沙地区的空间，将重点保持于右翼，进行逐次抵抗，俟敌到达长沙地区，再以全力与敌决战而歼灭之。在这个作战计划的指导要领中，强调不要陷于内翼遭受敌人的包围，而要机动地“争取外翼”来攻敌人的侧翼。

这个作战方针概括为两句话八个字，即：“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所谓“后退决战”，就是不在第一线上和敌人决战，而要退到第一线后一定的距离，才与敌决战，这就叫“后退决战”。就湖南来说，不要在第一线新墙河与日军决战，而要节节抵抗，节节引退，到捞刀河或较捞刀河更向南的地方，才与进攻的日军决战。

为什么要“后退决战”？其目的何在？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争取主动”，一个是“争取优势”。

“争取主动”，就是说：如果在新墙河第一线与日军决战，日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多大兵力，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全由日军决定。这样，主动权在日军手中。不在新墙河和日军决

战，退到新墙河以南的地方再与日军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地点、兵力、方式、方法，完全由我军决定。这样，主动权就在我军手中。这就是主宰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的作战方式。

“争取优势”，就是指在新墙河与日军决战，日军的装备好，兵力大，日军是优势。在新墙河以南与日军决战，湖南人民破坏了交通，日军的大炮、战车、骑兵不能通过，前方部队逐次抵抗，削弱了日军；我方则可以军民联合不断袭击疲惫的日军。这样，在新墙河，日军是优势；到汨罗江，双方是均势；到捞刀河，我军是优势。这又是主宰战场，变劣势为优势的作战方式。

“争取外翼”，就是要机动地到敌人包围线外边去，才好击敌侧背，不要到敌人包围线里边去，以免侧背受敌。作战计划判断日军对长沙的包围，其左（东）翼要经过平江——浏阳这条线，故我以这条线以西为内线，这条线以东为外线。

怎样争取外线？（1）于绪战中在湖北地区担任逐次抵抗的部队，当日军向我右（东）翼猛攻时，我右翼要顶住，撤退时，要由西北向东南撤退，先撤左（西）翼，后撤右（东）翼，逐步转移到平江、浏阳以东，准备于决战时由东向西攻击日军侧背。如撤退时右翼顶不住，先撤退了，左翼就撤不出来。（2）决战时，战区的控制和后续部队，只宜以一部由南向北正面进攻，主力依情况要从平江、浏阳线以东，向西攻击日军侧背。

九战区在各个时期策定的作战计划，其方针和指导要领，基本上都如上所述。至于作战计划中的战斗序列及兵团部署，因战区在各个时期指挥的部队，多寡和番号不同，不作赘述。

五、第一至第四次长沙会战

（一）第一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

会战开始后，代司令长官薛岳让参谋长吴逸志率领长官部非作战单位、非作战人员，撤到耒阳，只留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和一部分必要人员，在长沙组成指挥所。至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这个指挥所退到淞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内指挥作战。

赣中高安、奉新、靖安方面和赣北武宁方面的日军为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在高安、奉新、靖安以西地区的我军，为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所指挥的第一集团军(第五十八军、六十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四军和康景濂游击纵队。武宁以西地区，为我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所指挥的七十二军、七十八军。高安以东地区的日军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首先进攻，我高安附近阵地一度失而复得，战斗虽激烈，日军没有进展。奉新、靖安地区日军，继高安日军之后向西进攻，经我三十集团军前线部队节节抵抗，将其拒阻于上富地区。嗣经我十九集团军控制部队增援反攻，日军退回奉新、靖安、安义地区原阵地，与我军对峙。武宁方面日军同时向西南进犯，经我三十集团军前方部队节节抵抗，将日军拒阻于铜鼓地区，经三十集团军控制部队增援反攻，日军退回武宁地区原阵地与我对峙。

鄂南通山、通城地区为日军三十三师团。在通山以南地区为我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所指挥之暂编五十四师和地方游击部队。在通城以南地区为我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指挥之二十师。日军三十三师团调集兵力，突于九月十七日经白沙岭、长寿街向平江以东地区急进。这为九战区计划作战者始料所不及，急以通城以南的我二十军变换正面，由西向东节节侧击日军，以樊崧甫部由北向南尾击，并由东向西侧击，几经战斗，将日军

抑留于献钟地区。后来这股日军与由湘北到捞刀河的日军，同时北撤，归还通城、通山原地区。

湘北临湘、岳阳地区为日军第六师团。会战开始前，又由其他战场调来第三、第十三师团的主力 and 炮兵、工兵、战车、汽艇等部队。在湘北方向的炮兵、工兵、战车、汽艇等部队。在湘北方向的我军，为十五集团军关麟征所指挥的五十二军、三十七军、七十九军和王剪波游击纵队。会战开始后，又增加了七十军。湘北日军于九月十九日开始进攻。我十五集团军在新墙河以北前进阵地、新墙河阵地、新墙河至汨罗江中间阵地，以及新墙河至湘阴的江防阵地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为了争取时间消耗敌军，有的为了掩护友军占领或撤出阵地，作了坚强的防御，有一定的牺牲。如五十二军守备新墙河前进阵地金龙山、比家山的赵公武师胡春华营和覃异之师史思华营，当日军以步兵、炮兵、战车、空军协同进攻时，屹然不动，与阵地共存亡，为会战争取了时间。至九月底湘北日军进至捞刀河地区。十月初命令控制部队第四军、七十三军、暂二军和十五集团军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反攻。由湘北到达捞刀河的日军旋亦北移，我军跟踪追击，至十月十日恢复了原阵地。

此次会战，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日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说是“长沙大捷”，有些夸张。

（二）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过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

会战一开始，薛岳又将长官部非作战单位和非作战人员撤到耒阳去了，而以参谋长吴逸志、高级参谋饶少伟、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和一部分必要人员组成指挥所，留在长沙。至日军渡过汨罗

江逼近长沙时，指挥所退到了朱亭。

赣中高安、奉新、武宁地区的日军为三十二师团，只有一部在这里守阵地，主力转用于湘北方面了。在这方面的我军为罗卓英所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六十军、新三军、新十二师）和康景濂挺进纵队。武宁地区我军为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所指挥的七十二军、七十八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赣中、赣北的日军没有行动。战区于新墙河阵地失陷之后，急调第一集团军一部，第三十集团军主力，赶赴长沙作战。但为时过晚，没有来得及参加战斗而还。

鄂南通山地区日军的兵力，番号不详。通山以南地区我军，为湘鄂赣边区总指挥李默庵所指挥的暂编五十四师和三个挺进纵队与日军进行游击战。

原在湘北岳阳与鄂南通城方面的日军，为第六师团、四十师团、三十三师团主力。在会战开始前调来的有第三、第四两个师团的主力、十三师团一部、独立十四旅团主力、独立十八旅团主力。临时调来的还有炮兵、工兵、汽艇、伞兵等部队。在这方面的我军，为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指挥的第四军、二十军、五十八军、三十七军和王翦波挺进纵队，随后又增加了二十六军。会战于九月六日开始。

日军一部从六日开始，进攻我新墙河前进阵地。经我五十八军反击，日军又退回原阵地。从十七日开始，日军大举向我新墙河、南江桥阵地五十八军、二十军、第四军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战区指挥所有两个分歧的意见：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死守，才能争取时间，不能一战即退。另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按计划进行逐次抵抗，才能争取时间，保存力量，有利于尔后的决战。结果是照前一个意见执行，不到三天，守军就被日军打垮下来。杨森只

好将这三个军的残部收容于梅仙、平江以东山地整顿。

在新墙河、南江桥阵地将要被日军突破时，我们不得不迅速部署汨罗江地区的作战。这时，指挥所内又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要将刚由江西开来平江附近的二十六军和原在汨罗江南岸的三十七军占领铜官至湘阴的湘江东岸和湘阴至岳口的汨罗江南岸之线，坚决拒阻日军的进攻；以战区直辖炮兵在岳口地区占领阵地，支援汨罗江南岸的作战；将战区控制部队第十军推进至金井——福临铺线策应作战。另一个意见，认为前一个意见是最危险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的要求，将汨罗江抵抗线向东延伸至三眼桥，在日军向我进攻时，以空间换取时间，向捞刀河地区实行逐次抵抗，保证我右翼不受日军的包围；炮兵部队要使用于岳麓山；第十军要向长沙市区方向进出，与日军争夺外翼，这样来争取时间，等待后续部队的到达，再行决战。但结果仍是实行前一个意见。很快，第二十六军被日军包围于岳口地区，伤亡严重，失去了战斗力。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占领阵地时，被日军击破。第十军到达金井及其以西地区，大部分一师一师、一团一团地拨归三十七军陈沛指挥，均被日军击破，向南溃退。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最后率兵一团被日军包围于孙家桥，乘夜突围南遁。这样，汨罗江以南二十六、三十七、第十这三个军没有发挥应有的战斗力，而一败涂地。幸炮兵撤退得早，未受损失。

当日军在九月中旬之初突破汨罗江，正要南下时，我两个战斗力较强的生力军到达战场。一个是七十四军王耀武部，由赣东开到了浏阳以东地区。一个是七十九军夏楚中部，到达长沙以西地区。这时候，对怎样使用七十四军这个问题，指挥所又发生了两个分歧更大的意见。一个意见要将七十九军守长沙和捞刀河下游，重点保持于长沙。将七十四军使用于捞刀河上游，重点保持

于沙市街。一个意见认为那是要命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侧击日军”，将七十四军停止于浏阳地区。日军南进，我军西击正好打上日军的侧背。如七十四军拉到沙市街，则是我军西进，日军南击，正好打上七十四军的侧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胜败之机，不可不察。但结果仍是认为保长沙要紧，坚决执行前一意见。果然，七十四军于长途行军之余，疲惫不堪，被日军纵兵一击，打得落花流水，向南溃退。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逃到衡阳，长官部指挥所撤到朱亭。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沙降落伞兵，二十八日到了捞刀河和长沙。正在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时，奉命守长沙的七十九军忽然传来捷报，日军于三十日由长沙和捞刀河撤退了。奇怪，日军为什么要撤退呢？这很清楚，日军是在进行“大扫荡”，没有空间目的，它后方没有建立安全的补给线，随军携带的弹药用完了，就要撤退。十月八日，日军渡过新墙河，双方恢复了原阵地。

日军达到扫荡目的后，退回原防。重庆和长沙却把失败说成胜利，吹嘘为“第二次长沙大捷”。当中外记者集体来长沙采访时，笔者报告作战经过，只好照作战计划的理想乱说一通，而把会战经过的真相隐瞒下来。会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了检讨会，枪决了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免了第十军军长李玉堂的职。

（三）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

会战开始，薛岳让吴逸志率领长官部非作战单位，非作战人员撤到耒阳，只留参谋处长赵子立和一部分必要人员组成长沙指挥所。至日军进攻长沙外围工事时，这个指挥所便移到岳麓山进行指挥。

赣中南昌、安义地区，赣北武宁地区的日军为三十四师团。在南昌、安义以西和奉新地区的我军为罗卓英所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新三军）和康景濂挺进纵队。会战开始后，南昌、安义的日军分向高安、奉新进攻，与我新三军和康纵队战斗了三天，就退回原阵地了。会战中，战区兼前敌总司令罗卓英至浏阳以东指挥浏阳方面的作战。武宁以西地区的我军，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所指挥的七十二军、七十八军。会战开始前，王陵基率七十八军开平江以南地区，准备尔后参加长沙方面的作战。会战开始后，武宁地区的日军向修水进攻，与我七十二军战斗三、四天，就退回了原阵地。

鄂南通山地区的日军，兵力甚小，番号不详。在通山以南地区，我军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劲修所指挥的三个挺进纵队。会战期间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斗。

湘北岳阳地区，鄂南通城地区原有的和新调来的日军有第六师团、四十四师团一部、第三师团主力、四十师团主力、独立十四旅团一部和炮兵、工兵、战车、汽艇等部队。在这方面的我军，为杨森所指挥的五十八军、二十军、三十七军。这方面的日军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我军利用新墙河、南江桥前进阵地，新墙河、南江桥阵地，汨罗江前进阵地逐次抵抗，迟滞日军的前进。尔后五十八军、二十军转移于平江以东山地，三十七军转移于平江以南地区。日军到达捞刀河地区，战区以直辖部队第十军固守长沙，以炮兵在岳麓山占领阵地，支援第十军作战。日军元月一日开始攻长沙。经过长沙前进阵地、外围阵地、核心阵地的战斗，逐堡逐屋争夺，至最激烈时，我第十军的炊事兵、饲养兵、号兵都参加了白刃战，终于保住了长沙核心阵地。当日军正向长沙攻击时，战区以杨森指挥的五十八军、二十军由汨罗江以南，

以王陵基指挥的七十八军、三十七军由平江以南，以罗卓英指挥的二十六军由浏阳以北；七十九军于浏阳西南；战区直接指挥的第四军于株洲以北；七十军、七十三军暂六师于岳麓山以北渡过湘江，九十九军于临资口渡过湘江向长沙及其外围地区的日军进行猛烈的求心攻击。日军攻长沙受挫，又陷于重围，遂仓皇撤退。我南面各军向北追击，东南各军向西侧击，北面各军向南迎头截击。特别是五十八军、二十军方面的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夺路北行，发生了激烈战斗，在道路两侧的每个山头 and 村落都反复争夺，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者数次。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长沙核心工事的争夺战。日军独立第九旅团南下接应北退日军，亦被击破。到元月九日，日军才退过新墙河，我军恢复了新墙河和南江桥的原阵地。

会战后，很快有中国及各盟国记者集体前来采访，由笔者如实地作了会战经过的介绍，并拿出会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给他们看。有的记者说，作战计划与作战经过基本一致，在战史上是罕见的。我们并在未清扫战场之前，让中外记者参观长沙和湘北战场，使他们见到了日军的遗尸。

（四）第四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

第四次长沙会战发生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即长衡会战的前期。

会战开始，薛岳和参谋长赵子立率一部分必要人员组成指挥所留长沙。其余非作战单位、非作战人员撤往耒阳。这个指挥所于日军渡汨罗江后移岳麓山指挥。薛岳于东线日军向浏阳进攻，西线日军向益阳、宁乡进攻，正面日军迫近长沙时，由岳麓山去耒阳，随后撤到郴县。

在赣中南昌、安义地区，为日军三十四师团的一部。在这个

地区的我军，为第一集团军孙渡所指挥的新三军、五十八军和康景濂挺进纵队。会战开始时，五十八军调湖南作战。赣北武宁地区的日军番号、兵力不详。在赣北澧溪、鄂南九宫山地区的我军为王陵基所指挥的七十二军、暂十六师和盛瑜挺进纵队。会战开始时，王陵基率七十二军参加湖南方面的作战。在湘北岳阳、鄂南通城方面的日军（即参加会战的日军）其兵力番号如后文所述。会战前在新墙河、南江桥及其以南地区的我军为杨森所指挥的二十军、三十七军、四十四军，在临资口、沅江、益阳地区担任湖防的我军为九十九军、七十三军。

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前，九战区对于敌情判断和作战指导，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湘北、鄂南集结庞大的日军，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日军到处抓伏向湘北、鄂南输送。湘北、鄂南日军占领区，到处禁止行人通过。看情况比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集结的兵力都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别是抓这么多的民伏干什么用，值得考虑，这不是“扫荡”，似有空间目的。大敌当前，九战区必须依情况重新确定作战方针，做好作战准备。第二个意见认为：日本太平洋战场处处需要兵力，决不会再向中国战场增加兵力发动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不敢再攻长沙。至于抓民伏，更有一个“妙论”，说是“到南洋去做工的”。一不研究情况，二不整饬战备。笔者正在焦虑中，恰巧副长官王赞绪要到重庆去，我请他将上述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建议说：“日本海军不能保证其太平洋交通线的安全，现在我们虽不敢判定，但日本或许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可能。果尔，除了第九战区的兵力以外，似宜调集第六、四、七等三个战区的兵力，准备在衡阳与日军决战。”因为我认为，靠九战区一个战区的兵力在长沙决战，是没有胜利希望的。

在会战之前，对日军集中的兵力不可能知道全部番号。在会战中逐步了解到，日军在这次会战中使用于岳阳、通城方面向南进攻的兵力计有第三、十三、三十四、四十、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独立十七旅团和炮、工、战车部队，海、空部队，总计不下二十万人。这样，日军的兵力和部署变了，我们的兵力未增，部署未变，仍然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模式进行作战，把古人说的“战胜不复”这句话忘掉了。

日军这次进攻，在初期先采取钳形攻势，其东线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六日左右先后击破我新墙河线、沮罗江线、金井——社港线之四十四、二十、三十七、七十二、五十八军，正向浏阳前进。其西翼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六日左右，破坏我洞庭湖封锁，击破我九十九军、七十三军，攻占沅江和临资口，正由这两个地区向益阳和宁乡进攻。

薛岳由岳麓山去来阳后，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在东西两线作战对我不利，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状况完全不同，长沙只应做为一个持久的防御线来迟滞消耗敌军，以利于尔后衡阳的决战，不应死守。但受命守长沙的第四军以两个师守长沙，一个师守岳麓山。我不同意，认为应以一个师守长沙，两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失守，长沙难保，守住了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我命令第四军调整部署，张德能打电话给我说：“长官走时，未让我归你指挥。长官让我把两个师放在长沙，一个师放在岳麓山，我不敢变更。”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在来阳的薛岳，问：“我留在这里是否指挥第四军？”薛答：“你不指挥。”这一下子，我气得打哆嗦。我认为看房子可以派副官，联络可以派参谋，把我放在长沙，究竟目的何在？我要电话向重庆报告这种情况，但电话要不通。恰巧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率七十九军、七十四军、一百军前来支援长沙作战，

在途中打电话问我长沙的情况。我除将情况告知他外，并说明我留在岳麓山，既未履行参谋长的职权，又不能指挥长沙守军，以后九战区作战好坏，我不能负责任，要王将此话报告蒋介石。这样我还不放心，当第三战区副长官兼吉安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打电话来问我长沙的情况时，我又将对王说的话对他说了一遍。打过这两个电话之后，很快，岳麓山对外的电话都不通了。

东线日军在浏阳地区阻止我东线部队西援长沙，西线日军由沅江下益阳，由临资口下宁乡，阻止我西线部队东援长沙。正面日军于六月九日开始渡捞刀河南进，阻止我后方部队北援长沙。六月十日，发现日军一万余人在靖港登陆。十一日，又发现日军约二万余人由三汊矶登陆。这两部日军直攻长沙和岳麓山。湘江开放后，日军运来炮兵甚多，压制了我岳麓山炮兵的火力。至十七日，岳麓山外围阵地均失守，长沙核心阵地也有一部被突破，这一天的战斗十分激烈，情况十分危急。是晚，张德能同我在电话上研究当夜和翌日如何作战。我说：“我早就主张把重点放在岳麓山，还可以多打几天。”张说：“现在变更部署如何？”我说：“我不指挥你，我不能决定，我只建议，由你决定。你认为能变更过来时，你就变更好了。”当夜张德能变更了部署。日军乘夜进攻，以汽艇和火力封锁了江面。第四军主力渡江部署发生了紊乱，过了江的少数部队未能在岳麓山及时占领阵地。十八日日军猛攻，岳麓山阵地全部崩溃。在岳麓山占领阵地的炮兵第十四旅破坏了大炮，也同第四军一起溃退。我同指挥所的几个人率一个手枪班向南突围，追上张德能，建议他赶快收容部队向岳麓山以西打游击。张说：“你看，部队收容不起来，怎样打游击！”

我回到郴县，薛岳对我说：“委员长让张德能去重庆报告作战经过，你同他一起去吧，帮助他作好这个报告。”我到桂林会同张

德能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当即把张逮捕下狱。并对我说：“薛长官有信来，告你协助张德能守长沙不力，你也得找保在外候审。”军委会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为审判长审理此案，签判张德能徒刑五年。蒋介石批示：“张德能判处死刑。至赵子立既未负指挥责任，应勿庸议。”此案遂告结束。

在第一至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湖南人民破坏日军后方交通，协助我军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写得仓促，四十年前的往事，一时回忆不清。请知情者予以教正。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

记第一次长沙会战

贺执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当时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被派在会议秘书处工作。在大会期间，蒋介石对抗战建国问题多所指示，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说：“抗战转入第二期（武汉沦陷后）以后，国家的财力、物力和兵力较之第一期要困难多少倍。我们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就是要从多方面节约财力、物力和兵力，不当用的钱不用；不当用的物资，不用。”他特别强调，不当打的仗或者无把握的仗，不打。他说：“各个战区不到有利时期和有利地带，尽可能与敌避免决战。因为抗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将来还要建国，建国更需要财力、物力和兵力，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中央抗战建国的最高决策。”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这番“训示”的真正含义。南岳会议之后，薛岳升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被调充长官部军务处长。尔后，我和薛岳多次谈到抗战问题。我认为岳阳为湘北门户，特别是城陵矶为洞庭锁钥，长在敌手，则八百里洞庭成为敌寇纵横的世界，对本战区战局前途影响甚大。因此，不止一次地向薛岳建议相机收复岳阳、临湘。薛岳回答说：

* 贺执圭同志来稿原题为《我所知道的日寇三犯长沙的经过》。这里选载了有关第一次长沙会战部分。本文曾送全国政协常委赵子立同志校阅。

“你这个意见是好的，但我们更应从全局着眼，你不是听过委员长的指示吗？抗战转入第二期，对日寇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不到迫不得已时，尽可能避免决战。”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解释说：“我们今天固然要抗战，今后更要准备建国。如在敌优我劣的形势下，勉强向敌求战，本钱弄光了，将来拿什么去剿共，拿什么去建国呢？”薛岳这番话充分说明，蒋介石反动集团始终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湘北几次战役就是在这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原则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驻咸宁之日寇第十一军团长冈村宁次，由鄂中、鄂北分别抽调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主力和独立炮、工兵各一联队集中临湘、岳阳两地，会同原在岳阳、通城的第六、第三十三两个师团，积极准备向湘北进犯。估计其总兵力约在十万人左右。

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一）赣西支战场由罗卓英之第十九集团军负责守备，并辖有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孙渡第五十八军，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刘秀荃的第四十九军等六个军，在赣江以西沿新喻、高安、奉新，靖安南北之线，向南昌及南浔路方面之敌，采取持久防御的对策。与敌兵力约为五与一之比。

（二）湘北主战场以王陵基部第三十集团军辖韩全朴第七十二、夏守勋第七十八两个军，配备在渣津、修水幕阜山区，向赣北武宁方面之敌，采取机动防御。

以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辖杨汉域第二十军及李玉堂之第十军（系临时配属）在平江以北南江桥、九岭一带地区，向鄂南通城方面之敌进行持久防御。

以关麟征部第十五集团军，担任新墙河正面之防御，该部辖

张耀明第五十二军、陈沛第三十七军、彭位仁第七十三军等三个军（临时配属指挥）。新墙河防线，右起杨林街，左抵洞庭湖东岸之九马嘴，由第五十二军扼守；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之江防，由第三十七军守备；第七十三军控制在汨罗江地区，任第二道防线之守备。

（三）、战区直辖部队为欧震第四、李觉第七十、张衡哲二和新六等四个军，控制于长沙以北浏阳及粤汉路株洲以北三角地区，以备策应各个方面之作战。

（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崧松甫辖五个挺进纵队（每纵队等于一个师，但装备较差），进出鄂南地区，担任敌后游击。

（五）、洞庭西北岸，常德、澧县、南县、华容等县，分别由第二十集团军万福麟之五十三军、霍揆章之五十四军担任警备。

第九战区兵力，除第十九集团军在赣西，第二十集团军在洞庭西岸之七个军不计外，在湘北正面者，尚有十一个军，连同五个挺进纵队和直属炮、工兵，总人数约有二十余万，超过敌人一倍多。

当发现敌人进攻新墙河时，薛岳在长沙长官部召集高级幕僚及直属炮、工兵指挥官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首先指定参谋长吴逸志率领长官部大部人员撤往衡阳二塘（后转至耒阳），其余留在长沙指挥所的，除我外，计有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高参曾举直、炮工兵指挥官王若卿、蔡时雨以及少数参谋人员。其次在研究作战中，当时与会人员提出了三种对策：一、应按照原定方案作战，如新墙不守，应在汨罗江之线，利用既设阵地与敌决战；二、利用纵深地带逐次抗战，依战况的推移，再视情况而定；三、将敌诱至捞刀河以南，左翼依托湘江，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薛岳在听了各方意见后，初尚踌躇，最后他说：“由

于长、岳之间的交通我已彻底破坏，应该诱敌至长沙郊区采取反包围与敌决战，但须先向委员长报告裁定后才能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薛岳对长沙的坚守是毫无决心的。这反映在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上。

各战场的具体战斗经过如下：

（一）赣西方面

敌一〇六师团主力，于九月十四日由赣江西岸向高安蠢动，另以一〇一师团之一部约一联队，同时由南浔铁路西侧武宁方面向修水进扰。因系佯动，由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分别遏止于高安、修水以东地区，相持至十月六日，敌即退回南昌及南浔铁路原地了。

（二）湘北方面

甲、新墙河北岸前哨战斗，揭幕于九月十八日。当天拂晓，集结岳阳方面之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各以一个大队附炮兵一部，分向第五十二军赵公武、覃异之两师警戒阵地金龙山、斗篷山、雷公山、小乔岭、铜鼓山等地先行炮击二小时；八时许，步兵开始进犯。敌、我不断增援，相持至十九日拂晓后，金龙山、斗篷山两处阵地因比较突出，工事全被敌炮轰毁，守兵赵公武部胡春华营，自战斗开始，即誓死坚守阵地，已与敌相持达三昼夜。在战斗中，除七个负重伤的士兵先后退出阵地外，其余自营长以下全部与阵地共存亡，无一生还。黄昏前，阵地陷入敌手。

二十日晨，敌集中大部炮兵火力轰击雷公山草鞋岭一带阵地，敌步兵亦各增至一个联队，更番猛犯，激战至二十二日黄昏。守备草鞋岭阵地的覃部史思华营已伤亡过半，覃异之以电话命令史“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史回答说：“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坚守不退，以身殉职。同日晚间，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全

部被敌突破。第五十二军原在北岸之张汉初师，亦同时撤回新墙河南傅家桥地区，为军预备队，新墙河北岸战斗于焉结束。

这次前哨战斗延续了五昼夜，而敌人自此窜抵长沙城郊，费时亦不过七日，而且中间经过五道防线的阵地。这就说明，前哨战斗是认真激烈的，它起了迟滞、消耗和挫伤敌人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尽管蒋介石的抗战不是那么积极的，而下级官兵中仍然有不少人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能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可惜他们的壮烈行动，在整个战役中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他们的鲜血，在蒋介石、薛岳避免决战的“决策”之下，算是白流了。

乙、新墙河战斗，新墙河本阵地，右起杨林街，中径簪口、新河镇，左抵荣家湾洞庭湖边。

二十二日，新墙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陷敌之后，关麟征令第三十七军除留罗奇师守备营田外，悉调至前线协同第五十二军巩固新墙南岸阵地。这晚，由于敌我调整态势，正固战斗暂趋沉寂。但集结临湘之敌第三师团之一部（约一个联队），于同天拂晓前密乘船团，协同敌洞庭湖舰队约千余人，在敌酋东藤少将指挥下，先以一部在鹿角、九马嘴两处分别强行登陆。

二十三日午前，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沿新墙河岸发起全线总攻，并以主攻指向新墙镇、荣家湾之间铁道正面。当天午后，荣家湾、新河镇、杨林街三处阵地，同时被敌人突破。此时，窜入洞庭湖海陆混合之敌——洞庭支队，乘新墙河南岸第十五集团军崩溃之际，经荷叶湖窜入湘江之营田附近，在飞机掩护下，于二十四日拂晓分别在营田及其附近之新洲、白鱼圻等处强行登陆，与守备该地之第三十七军罗奇师发生战斗。守军虽经得到第七十军一个团的支援，仍未能阻止登陆之敌向汨罗江以南发展。而关麟徵的第十五集团军主力在新墙南岸防线被击破后，一直向南溃

退，其先一部竟退至株洲以南醴陵附近之线。其时，不仅经营一年以来在新墙河畔誉为铜墙铁壁的所谓“伯陵防线”（薛岳号伯陵）全部瓦解，而且长沙方面亦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新墙河畔的战斗，就在这样可耻的情况中结束了。

丙、幕阜山、九岭方面的战斗，集结在通城、大沙坪地区担任助攻之敌第三十三师团，为着策应新墙河北敌主力第六、第十三师团之作战，于九月二十一日开始蠢动。先以一部向通城以东大围地方进行所谓扫荡，同时以主力向麦市、桃树港进攻，得手后，越过幕阜山天险之天岳关，迂回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在九岭方面阵地之右侧背。二十二日，敌之一股竟窜至渣津附近；二十三日，续向龙门厂、长寿街一带窜扰。其主力亦于同日窜到南江桥东南地区。杨森部第二十军及临时归其指挥之第十军在南江桥、龙门厂等地稍事抵抗后，即向平江及其东南献钟、永和市一带山区退却。因此，平江于二十五日即陷敌手。这就是幕阜山、九岭方面战斗的概要经过。

其次，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之第七十二、七十八两军，战斗力较杨森部之二十军更差。当二十三日敌第三十三师团越过幕阜山脉时，即退入九岭山区。修水方面，一时成了真空地带。

丁、汨罗江防线的弃守，汨罗江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岳阳陷敌之后，更为湘北战场主要的防线，原由陈沛第三十七军担任守备。二十二日，新墙河前线告紧，该军除罗奇一师守备营田江防外，梁仲江、李棠两师调新墙前线，支援第五十二军。所遗汨罗江防务，战区改派第七十军接替。但该军当时尚在长沙以东永安市及浏阳附近地区，距汨罗江畔约有一百华里左右之远。国民党部队的行动素来迟缓，特别是在前进的时候尤其如此。二十三日午后，新墙河且九岭全线先后被敌突破后，关麟徵集团军

和杨森集团军除少数担任掩护及失去联络之小队，在敌人渡过新墙河时，就近退入汨罗江两岸一带山地之外，杨集团向浏阳南北山区，关集团及战区直辖之第四、暂二、新六（该军原驻株洲以南）等军，直向株洲以南渌水之线纷纷退却。原向汨罗接防之七十军，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亦于二十四日在向北前进中，转而南向醴陵方面撤退。因此，汨罗江两岸在二十四日完全成为真空地带。

敌二十五日侦知汨罗南岸之守军已向南退走，即分别由岳口、长乐、新市、汨罗渡江，调整部署后，二十六日分三路向南追击：一路，由汨罗沿铁道正面，一路，由长乐沿长、岳古大道，一路，由平江沿长平公路及以南地区直下长沙。汨罗江防线，就此落于敌手。

当敌人突破新墙河防线进逼汨罗时，薛岳决定将其指挥所南撤，放弃长沙。当时我向薛岳建议：“诱敌深入战法，不等于完全放弃要点抵抗。长沙是湖南省会，不可不守。”薛岳的回答大意是，目前的情况，新墙阵地既陷敌手，汨罗江南岸防线，由于敌水路方面的威胁，也无法稳定。如在长沙决战，现在关集团主力已受打击，王陵基所部不仅战斗力薄弱，并且还远在幕阜山区，第二十集团军尚缩在平江以东地方，赣西方面之罗集团计算不能及时赶上，只剩了第四军，孤军注入守长沙，仍然陷于被动，无补战局。为着争取主动，主宰战场，免再受制于敌，取得最后胜利，应撤到株洲以南醴陵、渌水之线。薛岳说的这些话，听来似乎有理，实际上他既缺乏作战的决心，又怕搞垮他的基本部队第四军。我为薛岳打算，在南撤途中，再一次向他提出确保长沙的建议，理由是：“长官兼长湘政，似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军远撤渌江，万一敌人窜驻长沙后，一时不再前进，旷日持久，再图

恢复不易，岳阳即为前车之鉴，对战局及长官前途似均不利，第二，醴陵至渌水一线，并无防御设施，万一敌人跟踪前来，我军喘息未定，而且此次一退数百里，各军在退却中伤亡逃散当不在少数，如再失利，势必引起中外哗然。为着争取主动，迫敌适可而止，应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左翼紧靠湘江，在战略上形成反八字态势。并在捞刀河以北金井、福临铺之间留置有力之一部，给敌以不意之打击。如此行动，似较比全部撤至渌江之线为妥。”薛岳考虑之后，始下令撤往长沙、浏阳以南各军就地停止于株洲、浏阳之间，并令关麟徵集团军后卫之覃师、梁师各以一部设伏于福临铺附近山地，从事敌后活动。

戊、敌军窜抵长沙外围的情况，二十五日，敌由汨罗分路向长沙进犯。二十六、七两日，先后在福临铺、金井等地，受到覃、梁两师一部伏兵的袭击，因而前进的速度比较的减低了。但到二十八日上午，敌第六师团主力经白水窜抵捞刀河以北桥头铺附近地区；第十三师团同时窜到了上杉市，第三十三师团之门协联队，在二十九日上午亦窜抵永安市附近。截至二十九日止，长沙城郊东北六十华里左右地区，悉陷敌蹄之下。

但是，敌寇自二十三日下午突破新墙河防线向南进犯，到二十九日主力到达长沙外围为止，为时已整整一星期。由于携带粮弹均已用尽，而后方补给由于长、岳交通破坏，全赖空投。同时，平江以东、汨罗以南，尚有未曾退去的国民党小部队。因此，敌窜抵上杉市、永安市一带地区后，有所顾虑，停止前进。十月一日，敌酋第十一军团长冈村宁次，认为击溃我九战区野战军之目的已达，即下令开始北撤。四日越过汨罗，七日上午全部退回岳阳、临湘、通城等地原来盘踞的老巢。

当敌于十月一日开始撤退的徽候传来以后，薛岳初尚怀疑，既

而得到确报，即令逗留长沙及已经退到株洲、浏阳、醴陵一带之关麟徵集团和战区直辖之各军，转向长沙外围推进，相机向北退之敌跟踪追击。二日上午，第十五集团军所属各军进出浏阳、永安市等地之线，战区直辖之第四、暂二等军进出黄花市、捞刀河南岸地区。三日晨，渡过捞刀河，分向平江长乐、新市、汨罗之线“追击”前进。五日午后，进至汨罗南岸，六日渡过汨罗江。由于与敌相隔一日半行程，直至八日午始进抵新墙河南岸瓦九岭之线，始终处于跟踪状态，并未发生接触。

其次，右翼平江以东的“追击”情况是：敌第三十三师团为了掩护正面主力部队之撤退，在社港、猷钟、嘉义、长寿、龙门厂等地节节进行掩护，防御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三十集团军的侧击。其侧卫曾先后在嘉义、长寿街、龙门厂与杨森部先头发生局部战斗，但仅限于小部队之接触，并未追及其主力部队。敌第三十三师团亦于七日上午全部经南江桥、九岭退至通城、大沙坪一带。杨森部于八日下午进至九岭及杨林街以东之原来阵地。

左翼方面之敌，即洞庭支队，在一度进驻新市之冈村宁次于二日午后经汨罗、河夹塘乘浅水舰艇北窜后，原在营田登陆之敌亦仍从水路向岳阳撤走。第九战区既无水上部队，亦无所谓追击。第一次湘北之战，敌人从九月二十三日黄昏前突破新墙河防线，二十八、二十九日之间，先后窜抵长沙郊区，十月七日仍窜回岳、临地区，历时十昼夜。包括新墙北岸之前哨战，则为十八昼夜，至此遂告结束。

综上所述，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而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九战区长官部。因其既无抗战的决心，而表面上为了欺骗人民和个人的种种打算，又不得不虚张

声势，摆出抗日的架子。首脑机关的矛盾和部队之间的派系问题，具体反映在战场上就是上下不一致，相互不协同，张惶混乱，进退失机，予敌以可乘之机，造成部队的严重损失。在一退数百里的过程中，伤亡溃散的员兵，虽无法作出全盘精确的统计，但据我回忆所及，事后对各部队的补充，如关麟徵集团军共辖十八个团即补充了六个团；彭位仁七十三军九个团补充了三个团；杨森第二十军只六个团即补充了二个团；王陵基两个军十二个团补充了三个团。总之，参加战役只十一个军共补充了四十个团，损失之大可以概见。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国民党只不过是“送客出门”。但在战役过程中，以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分别在报刊大肆宣扬在新墙河南岸、汨罗江畔、福临铺附近、长沙外围等处如何血战，如何歼敌，如何侧击、追击、堵击，等等。说什么“薛长官神机妙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将失败说成“长沙大捷”，实际是自欺欺人而已。

尤其可耻的是，敌退后，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竟集合秘书室和副官处人员，胡编了一个《新战长沙》的剧目，强迫长沙、湘潭各剧院演出一年之久。剧中称薛岳为元帅，他自封诸葛亮，道白时说什么“山人吴逸志自有道理”，丑态百出，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国民党这次的溃败，还给民间造成巨大的灾难。战后，我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各地巡视一周。据我所知，单就上杉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栗桥、高桥、金井、长乐街、新市、汨罗、营田、长寿街、龙门厂、甕江等处而言，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就有二百七十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八千多人，被强好的妇女不

计其数，其中包括八岁的女孩和八十三岁的老嫗。又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岳阳限于新墙河以南，华容虽未经过战事，但由敌洞庭支队抢走的粮食不少）等县的报告，在此次日寇进犯期间，除抢走了约五十万担粮食外，在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了。

湘北民间所遭受的浩劫，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怯懦无耻。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

罗文浪 邹继衍

一九三九年秋末，侵占鄂南崇阳、通城与江西南昌之日寇，从湘北、赣北同时向我长沙发动大举进攻，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部，立即调集重兵分途迎击。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抗日战争第一次长沙会战。当时罗文浪任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军（军长李觉）十九师五十五团三营少校营长，邹继衍任同一个军的一〇七师三一九团少校团附代理副团长，都亲身参与了这次会战的几个战役。现就我们当时在战斗中目睹耳闻的情况，回忆叙录如次。

一、战斗前敌我兵力部署形势

日本侵略军于一九三八年冬侵占武汉、一九三九年春继犯南昌以后，在湖北方面，先后进驻阳新、通山、通城及湖南岳阳等地；在江西方面，攻占南昌外围新建、奉新、靖安诸县，对我第九战区形成扇形包围。占据以上地区之敌军，据情报汇集所知，计有第三、六、九、三十三、三十四、一〇六等师团及一些特种部队，总兵力约十五万人，统归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直接指挥。

国民党第九战区所辖作战地境，东起鄱阳湖与第三战区衔接，西抵沅水流域联结第六战区。针对敌军部署，我军即在其侵占地区的外围，凭借山脉、河川、湖泊，构筑野战工事，建立防线与之对峙。当时隶属国民党九战区战斗序列的部队，计有：①部署

在赣西北的守军。第一集团军卢汉所属的两个军，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属的两个军与附属的一个师，驻修水一带的机动部队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的两个军。②部署在湖南境内的守军。第十五集团军关麟徵所属三个军；第二十集团军杨森所属的两个军，直属战区的第四、第九十九两个军；直属战区的机动部队第八、五十四、第七十军及七十三军的一个师。两省合共十七个军，加上特种部队，总兵力约为四十万人。

二、会战中各阶段的战斗经过概况

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日军从赣北、湘北同时向我长沙地区发动进攻，其主攻方向指向湘北，赣北作为助攻未曾深入。湘北战场的作战经过，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以第六、第一〇六师团为主力约三万余人的兵力，附以大量飞机，对我新墙河第一道防线开始发起进攻，其前锋约一个联队，即受到河防北岸草鞋岭前进阵地的坚强抵抗。当地守军五十二军一个加强营，利用优良地形和既设工事，奋起迎战，顽强阻击，坚持三个昼夜。军、师长多次令其相机撤团主阵地，但该营营长督率所部，死守阵地，坚不撤退。在这几天激战中，杀伤了大批寇军兵员，给予侵略者以迎头一棒。最后，营长以下全营官兵，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敌军夺占我前进阵地后，即向新墙河防线主阵地展开全面攻击，并集中优势兵力、火炮，在飞机掩护下，重点指向新墙河附近河段强攻。我正面守军五十二军张耀明部，虽曾进行了比较有力的阻击，但只打了一天。二十二日上午，在敌强大攻势下，新墙、箴口河段被突破强渡成功。五十二军及从第二线调来增援尚未使用的三十七军六十师，即纷纷后撤并连续渡过汨罗江向长沙方面

转进。右翼守军杨森的二十军，在敌进攻中，仅略事抵抗便退避右侧山地，旋向平江山区撤退。至此，敌即完全占领了新墙河第一道河防阵地。

第二阶段，日军在突破新墙河防线的同时即派出约一个旅团的精锐部队，沿黄沙街并分兵乘橡皮汽艇由洞庭湖水路向我第二道防线西翼要点营田突袭，经过与守军九十五师一个营的激烈战斗，于二十三日拂晓攻占营田。其主力亦迅速南进逼近汨罗江河防主阵地。

自新墙河第一道河防阵地失陷后，由于守军关麟徵、杨森两集团军分向长沙、平江方向后撤，原任战区总预备队的第七十军，二十一日奉命接替三十七军担负汨罗江河防守任务。该军即令所属第十九师为左地区队，一〇七师为右地区队，进行防守，准备迎击。从二十三日敌军发起进攻至二十五日撤离汨罗江河防阵地，全军坚持了三个昼夜，所属两个师，在防守、反攻、阻击中，各打了几次相当激烈的战斗。

第三阶段，敌于二十六日全部占据汨罗江防线后，九战区所有主力部队，有的退避翼侧平、浏，有的后撤株、醴以至衡山，战区长官部早已撤到衡阳二塘，薛岳设前进指挥所于株亭，连省政府亦远迁耒阳，仅留第四军守卫长沙城，该军主力置于河西岳麓山，只派一个师在浏阳河与近郊设防守卫，从汨罗江至长沙之间，几乎成了一片真空地带。因此，当敌军分两路于二十八日进抵长沙县属之上杉市与路口畚时，沿途未遇任何抵抗，敌亦未再向前逼进。

敌军在达成战略上和抢夺粮食的目的后，三十日自动仍分两股循来路撤回新墙河北岸原占据点。据说薛岳在株亭初得敌退情报，尚不相信，等到侦察确实下令反攻追击时，而所部主力，均

已后撤远离长沙。虽严令昼夜兼程追赶，但追击的先头部队，尾随敌后至少也相隔一日的行程，始终未能与敌主力接触作战，只是远远地轰鸣枪炮“礼送”，一路跟着返回新墙河原设阵地，照常防守，从而结束了这场时近半月的会战。

三、国民党第七十军参战纪实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向我湘北进犯，国民党第七十军奉命作为战区总预备队，集结于平江涪口地区待命，军长李觉立即转令所属各部，从原驻地浏阳普迹和长沙东乡一带以急行军驰赴指定地点。由于当时战况的急剧变化，部队在行进途中，又奉命改为接替三十七军陈沛部守备的汨罗江河防任务。于是按照新命令根据防区远近与部队到达的实际情况，大致作了如下部署：

1. 以到达较早的第十九师为左地区队，防守归义以西，汨罗至营田一线。

2. 以稍后赶来的一〇七师为右地区队，防守东起新市街西含归义之线，左衔本军第十九师。

3. 军部率直属队随十九师行动，尔后位于汨罗西南××地。
(余略)

二十三日零时开始，全军承担了保卫汨罗江第二道河防的重任。十九、一〇七两个师经历的战斗是：

(一)第十九师的战斗经过(以罗文浪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

①、驰赴集结地，接受新任务。

九月二十日，我十九师正在长沙东乡春华山一带整训，突奉军部紧急命令，限两日内赶到平江涪口附近集结待命，二十二日

全师到达指定地区，入夜汨水下游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说明前线战况紧急。晚十二时，军部命令本师为汨罗江河防左地区守备队，指示迅速西开以一部支援营田方面九十五师的战斗。师决定按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顺序，星夜赶赴指定地区。我统率的第三营，作为先头团的前卫，任务较重。沿途经大娘桥、小娘桥、三姐桥等地，于二十三日拂晓行抵白水车站。该处距火线尚有数十华里，已是一片混乱，乡公所无人负责。几经周折，始请得向导两人继续前进。当天上午到达余家冲附近，团部及二、三两营因行军疲劳于午餐后先后抵达。接着本团奉令接替九十五师东塘冲东西之线防务，团命我营先接替第一线阵地，尔后再行调整。我即命所属各连疏散向东塘以南山地集结，然后亲去东塘小高地九十五师师部，了解情况，商谈接防事宜。

②、东塘冲争夺战

当天下午二时许，我在东塘冲左侧一座掩体内，见到三十七军九十五师师长罗奇，他介绍敌我情况时说：“日军是二十二日以橡皮艇载兵由洞庭湖向营田进攻的，艇上炮火及飞机配合轰击，阵地野战工事大部被毁，守军伤亡甚大，营长阵亡，营田于今晨陷落敌手。我师第一线守军已撤至营田以南，东塘冲以北一线，设防阻敌前进，另派补充团占领东塘冲一带高地作为第二线阵地，这个团是刚征来的新兵，无战斗力，只能担任警戒。适接关总司令电话指示，东塘冲二线防务，即交你部接替。”他除在军用地图上指明位置外，还要作战参谋到掩体外遥指起迄地区。我略询当面敌军作战特点及友军情况后，即回部和副营长带号目和传令兵先去阵地察看，当我等行至东塘山后一田垅时，敌机数架低飞侦察扫射，只好伏在田垅下暂时掩蔽。十几分钟后，突闻东塘高地枪声骤起，敌机低空盘旋投弹扫射，九十五师补充团守兵纷

纷后撤，判断敌已突破东塘冲阵地。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我即派传令兵回营速带部队前来支援，同时叫号目吹第三营跑步前进号令。各连在十分钟内即跑步赶到，当与副营长督率所部，分两路向进占东塘高地之敌反攻。敌军约一个中队正尾随溃兵追击，企图突入纵深，不防我营突然集中反击，一时攻势顿挫，被迫撤至山北一村庄内据屋顽抗。这时九十五师补充团全部溃退到高地以南，原阵地空无一兵一卒，无防可接，我便布置八、九两连守备阵地，第七连为预备队，设防固守。部署完毕，天已黄昏，随将战斗经过如实向团部报告，

黄昏以后，我们五十五团接替了九十五师全部防务，该师则由阵地翼侧撤到后方整补。团的兵力部署是：仍以占领东塘高地东西之线的我营为左翼，以第二营在右占领余家冲口，以第一营为预备队，准备迎击敌之夜袭与拂晓进攻。我巡视阵地一周后，因连日行军、作战奔跑深感疲倦，晚九时许即入睡，约一小时左右即为枪声惊醒，出门时，营指挥所与预备队住房，已遭到东塘高地机枪扫射，弹雨纷飞，又听不到看不见守军的还击，判断阵地已被突破，我和副营长率营预备队驰援，进到半山腰，碰见八连中尉排长荣某随同溃兵后撤。始悉敌军乘夜暗偷袭八连连部，连长易醉桃中弹阵亡，肉搏战被敌军刺死士兵十余名，高地陷于敌手。团长得悉东塘失陷，感到责任重大，亲率第一营赶来，拟使用反攻以恢复阵地。同时师长唐伯寅来电话严责，限令拂晓前恢复阵地，否则军法从事。当时我考虑敌占高地后并未继进，估计兵力不多，所以拒绝使用团预备队，亲率七连四个班向东塘高地突击，这时东塘高地以南山腹，有我八连上士班长谭天荣收集了被冲散的守兵二十余名，潜伏以待援军。当看到营长亲自带队突击，谭首先率兵冲上山头投掷了数十颗手榴弹，我突击队亦乘

势冲锋猛扑，一举将敌驱逐至北麓山下原村庄据守，拂晓前阵地完全恢复。阵地上敌遗尸两具，枪枝证件均无，不能确知其部队番号。

东塘冲，这个在军用地图上也只有一个小点的弹丸之地，其地形位置却是非常重要的。它既为我军守备的要点，也是敌军前进必攻的主要通道。因此，在一昼夜之间，敌我反复争夺，阵地两易其手，双方伤亡均甚重大，战斗激烈程度可以概见。最可笑的是，我营恢复东塘阵地后，团部转报师部，不知为何传到长沙城，报社竟发出“十九师一举收复营田”的号外捷讯。由此也可见国民党军方惯于谎报战绩与报纸的捕风捉影，讹传事实。

③、汨罗江左地区防守战

我十九师接受军部新部署，但任汨罗江河防左地区守备任务后，在支援九十五师作战的同时，按照战场实况，对本师兵力作了如下配备，即：命已经与敌接触作战之五十五团为左翼，占领东塘冲、余家冲之线；以五十六团为右翼，占领归义以西至汨罗及以西之线，右衔一〇七师，左接五十五团；两个团作为第一线守备部队。以五十七团为预备队，随师指挥所位于牌楼铺附近。

二十四日上午八时，第十九师当面之敌，开始全面进攻，飞机投弹扫射，炮火猛烈轰击，步兵在机、炮掩护下，向左翼五十五团第二营集中突击。该营防守的余家冲之线，前后地形开阔，无险可凭，临时构筑的工事，多被摧毁，守兵伤亡累累。激战至正午，阵地被敌中央突破，二营六连一部分退入我营阵地，但敌军并不向两翼席卷，竟循突破口楔入纵深，插到团直属部队与团预备队之间，将其分割，团长率直属部队靠拢我营，无线电台与第一营退向师部。敌军随即以密集部队尾追退兵，向牌楼铺师部所在地突进，当与本团第一营及师属工兵营、特务连展开激战。

由于师指挥所并未构筑工事，遭敌突袭，呈现动摇，师长立命由五十七团调来一个营向敌军侧击，始将其凶锋暂时刹住。在敌攻入五十五团阵地的同时，师右翼五十六团亦为敌军突破，双方进入混战状态。

二十五日零时，第七十军奉战区命令向株洲转进，军即转令所属两个师，迅速摆脱敌人随军后撤。当时第十九师因与五十五团团部和第三营以及五十六团，均失去联系，乃一面派员分赴两团传达命令，师率直属部队、五十七团及五十五团一部分，随军部撤至株洲。第五十六团接到师部命令后，支持到二十五日黄昏后，始经白水、汨罗、麻林桥等地退抵株洲归建。至此，只有五十五团团部及我的第三营，因未接到撤退命令不敢擅离，仍在原阵地防守待命。

敌军在突破余家冲防线后，继续深入推进，二十四日下午及二十五日上午，与我师属部队激烈混战，我们东塘阵地因偏居左翼，反而显得平静，但已形成孤立。当晚我建议团长放弃现阵地向右靠拢友军，八时许率领阵地所有部队，沿余家冲方向搜索前进，遥闻远处有断续枪声，乃疾行约二十华里，至一村庄，发现空坪有大洋马及輜重车，显为敌军占据。当即向之袭击，敌军猝不及防，仓皇奔窜，邻村敌军，向我猛烈还击，一时信号弹、曳光弹划破天空，因系深夜，敌我均不了解情况，只是互射未敢迫近。战斗约一小时，未见右翼动静，估计友军已撤，即令各连迅速甩脱敌人，于拂晓前集结所部返回东塘阵地，在当地隐蔽潜伏滞留了整个白天。入夜黄聚杰团长找我共商对策。经过反复研究分析，我们一致断定，我军已经全部后撤，敌军约一个师团，完全占领了汨罗江河防并继续推进，我们这支陷在敌后孤立的小部队，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当即决定乘夜突围，在军用地图上选定沿湘

鄂铁路西侧的岳长古大道南撤，找了两个向导带路，沿途避开正面，寻找空隙，严密戒备，搜索前进，终于在二十七日拂晓前，经敌从中突出重围。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株洲以南归还师的建制，旋奉令就地构筑工事。

（二）一〇七师的几次战斗（以邹继衍的亲身经历为主）

①日军强攻，归义陷落

我一〇七师，九月二十日奉军部急令开赴平江浯口地区待命，即从浏阳普迹、张家店一带出发，途经永安、金井等地于二十三日正午赶到指定地点。旋遵照军部新的部署，命令三一九、三二〇两个团，担任汨罗江河防右地区第一线守备主力，第三二一团为预备队，师指挥所位于新市、归义后约十华里的董家墩。我们三一九团，经过三天急行军喘息未定，便匆忙进入新市、归义之间的沿河阵地。这时，防守新墙河前线的关麟徵、杨森两集团军主力部队，纷纷从汨罗江上游和我团正面抢渡，分向平江、长沙后撤，敌亦尾追迫近我河防，当饬一线守军加强戒备，准备迎战。当晚十二时，忽接师长宋英仲电话命令：“1、敌在突破新墙河防线的同时，另派一支精锐部队，分乘橡皮汽艇由洞庭湖向营田突袭，已于今晨攻占营田，原任守备的九十五师与接防的十九师，正在组织反攻混战，情况不明。2、本师三二〇团防守的左翼河段，亦于本日下午六时，被敌强攻突破，归义陷落，该团后撤。3、着三一九团立即撤出现阵地，转进至归义后侧××附近接受新任务。”我团遵令收拢部队，连夜撤到指定地点，天明时，奉命拨第二营作为师的预备队，主力由团长周崑源率领进占归义东南端外围高地，担任掩护本师三二一团反攻归义，我团于上午十时进到归义东南端高地，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完成了掩护反攻的准备工作。本师在这一昼夜的河防战中，除左翼三二〇团奋起迎击强攻之

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遭受了相当的伤亡外，我三一九团未曾与敌接触作战。

②反攻归义，受挫后撤

归义位于汨罗江南岸中段，扼粤汉铁路与长岳古大道要冲，为敌我必争的一个战略点。这个要点是本师三二〇团负责防守的，当其初陷敌手时，如果全线能够稳住阵脚，由我们及时举行反攻夺回它，这是非常合理也是完全正确的。无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整个战局，已呈混乱，河防守军，大都撤出，使汨罗江成了一条到处可渡的真空防线。在这种大势已去的状况下，孤立地去进行一两处局部反攻，徒耗兵力，难于奏功，即使勉强收复也无法确保不再陷敌手。

担任反攻主力的是三二一团(团长李标)。反攻战斗是二十四日下午一时打响的，攻击一开始，就投入了两个营的兵力，把队伍摆成几路，大叫大喊地向归义市一窝蜂式的猛扑冲锋。由于敌设防未固及兵力不大，所以最初的一举冲击，尚能迫敌后撤，夺取了一些外围警戒阵地。但这些侵略军，毕竟训练有素，加以武器装备好，一当转入纵深街市巷战，便组成严密火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优势，从而使攻势完全受到顿挫。此后，三二一团虽使用预备队发动了几次突击，无如未能指向重点，缺乏组织配合，不仅战斗毫无进展，而且伤亡累累。我们在后面高地目睹这种硬拼的打法，认为要吃大亏，曾两次派员去请李标来我团共商对策，而他只派团附邓某前来，要求我团派一个营归他们指挥作战。我们因只奉有以火力支援的掩护任务，就以派部队要有师部命令为词拒绝。李标在前攻已无效，后退怕受惩的困境中，据说曾拔出身佩手枪打穿自己的左腿，声称负伤了退出火线，接着全团部队也跟着一齐垮下来。幸好敌未派队出击，在我团的火力掩护下，

该团撤离阵地，才未遭受更大损失。

③沙塘基后卫阻击战

三二一团反攻归义受挫撤出后，已近黄昏，我团仍在原掩护阵地据守候命行止。七时许，师部派员送来军部紧急命令，周团长拆阅后，脸现惊慌之状，他把命令交我。我看到是军长李觉的直接手令，主要内容是：“1、本军奉战区命令，决定于二十五日零时起，全部从现阵地撤退，续向株洲、醴陵转进。2、着一〇七师三一九团为全军后卫团，当前应严密监视正面一线日军，掩护全军安全后撤；二十五日拂晓后开始由现地南撤，并应节节阻击来追之敌，到二十五日下午六时解除后卫任务，尔后迅速摆脱敌人转进至醴北关王庙一带归建。（余略）”我看完手令后说，我们作为后卫团，要与敌保持接触达一昼夜之久，任务无疑是艰巨的。不过根据以往经验，日军夜间一般不出动作战，所以今夜掩护军的安全撤退尚有把握，估计明日整天，可能会有一场血战，必须认真考虑对付。周团长完全同意我的看法，随即摆出军用地图，对当面敌情和我处位置以及尔后撤退路线、经过仔细观察与反复研究，我们一致认为，离归义以南四十余华里的沙塘基（湘阴县属）在一马平川的广阔田垌里，突然隆起一片陡峭的丘陵，紧靠后面白鹤洞大山可作依托。如果部队能尽快撤到此地，纵令敌军追来，足可和它周旋不致受困，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阻击地带。按照以上的判断和看法，当即决定采取并执行如下处置：1、入夜以后，只派一个连留置现阵地山垭口，严密监视敌军动态，团率其余部队撤至后面约五华里的村庄休息并与师部保持联系。待军、师主力撤后两小时，再将全部转移到归义以南十五华里的武昌庙，等拂晓再撤。这样，既始终与敌保持接触，执行了监视敌人掩护全军安全的任务，又使部队逐步靠近沙塘基，便于尔后行动

和战斗。2、立即在电话中报请师部并得到准许，将本团原拨为师预备队的第二营归还建制，连夜从师所在地先开沙塘基占领阵地，接应团的主力南撤。

二十五日零时，全军主力开始后撤。凌晨二时，我们撤回监视部队，将全部带到武昌庙，做好准备工作已近拂晓，当即区分所部按次速向沙塘基转进，指示各营、连如遇空袭，即以班、排为单位分散，一面防空，一面利用山坡、田坎跃进，不得迟滞行动。果然，部队行出武昌庙不到十华里，敌机十余架便沿我退路低飞侦察、接着投弹和扫射，好在各部遵团指示疏散行进、未遭重大损失，只伤亡兵伕三人，炸掉了部份炊具行李，全部于十时三十分陆续抵达沙塘基。我第二营早在该处占领阵地并构筑了简易工事，我们对该营张福群营长指出，敌军可能在十二点左右追抵此间，如来进犯，即沉着应战坚决阻击，要支持到黄昏以后听命撤退，必要时团将及时派队增援。旋将所有部队安置于靠山麓一带村庄，令速造饭饱餐，准备迎战。

下午零时三十分，我们正进午餐，忽闻前方枪声大作，紧跟着二营传令兵跑来报告，敌先头部队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我军正在阻击。周团长和我立即登上屋后高地用望远镜观察，看到进犯之敌约为一个大队，还有步、炮兵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估计为一个联队的兵力），十几分钟后就把骡马上驮载的小钢炮卸下发射，炮弹纷向阵地及纵深落下。此后，寇军不断向我二营右翼增加迂回侧攻，敌机也飞临上空助战。针对敌方攻势，即命第三营增援右翼顶住抗击，同时指挥荫蔽配置在后面山谷内的团属迫击炮连和预备队的四挺重机枪，集中对敌小钢炮阵地进行压制射击，以强大火力支援第一线。鏖战至下午五点多钟，由于我军占据绝对有利地势，所以尽管在敌陆空联合、步炮协同的一再强攻下，阵

地始终屹立未动。又由于我们的重武器配置、掩蔽良好，发挥了火力优势，给予敌军以重创。我们亲眼看到，被毙伤的寇军兵员，不断从火线抬下用驮马和车辆源源后运。但是，我军阵地系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在敌机、大炮猛烈轰击下，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四连中尉排长李云、八连少尉排长何振山中弹牺牲，全团被炸伤亡官兵将近百人，还被炸毁重机枪一挺。这时，天近黄昏，为了及时甩脱敌人，即令第一连连长周青云率领全连轻装，向敌来路后侧进行逆袭，同时命前线各部派出小部队配合反攻突击。敌因地势不利，后路空虚，便纷纷向武昌庙方向山地撤退。趁此时机，即令第一营占领阵后大山垭口，掩护二、三两营依次脱离战场，攀上大山进入白鹤洞。当晚十一时许，全团到达白鹤洞腹地，派出各连指导员和司务长，找当地老乡各购买生红茹一两百斤，分给官兵充饥，并请了两名向导，连夜带部队翻越四十多华里的山路，于二十六日黎明前下山抵达湘阴、长沙交界的铜盆庙。在当地只碰到友军七十七师柳际明部的少数警戒部队，据称师主力尚在离此二十余里的地方待命。我们将敌情转告后，便昼夜兼程南撤，沿途再未看到任何设防部队。二十七日午七时，全团到达醴北油铺子一带归还师的建制。二十八日晚，获知日军迫近长沙外围，我师亦奉命转进至醴陵渌江南岸西山一带，选择新阵地赶筑工事。十月三日，忽又奉令停构工事，移驻醴陵东郊五里牌一带休整。十月五日，师部转发上级通知，宣称庆祝“湘北大捷”，从而结束会战。

四、所谓“湘北大捷”

关于抗日战争中第一次长沙会战，我们在上面记叙的亲历见闻，当然有所局限，很不全面，但也勾画出了一个大致的战况轮

廓。从所记叙的实例中，谁都可以看出，整个会战，是一次受挫失利，打得极不象样的战役。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不能随意粉饰和改变的。

但是，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当局在官方文件和报刊上，竟把这次会战大肆宣扬为“湘北大捷”，煞有介事地召开祝捷庆功大会，颁授勋奖。吹嘘在会战过程中，如何指挥部队坚强迎击，展开血战；如何运用“天炉战术”，诱敌深入，在福临铺地区，一举歼敌万余人等等，真是渲染得天花乱坠，喧嚣一时。仅此尚嫌不足，还编成一出“新战长沙”戏剧，交各剧团一再公演，广为传播，大造舆论。他们所宣扬的“湘北大捷”，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他们所吹嘘的赫赫战绩，到底依据何来？我们作为当年的亲身参与者，有纠正历史事实的责任。

我们认为，在整个会战过程中的防御阶段，应该一分为二。有些地段和要点的守军，确实守得顽强，打了硬仗，如新墙河北岸草鞋岭前进阵地五十二军一个营，坚守血战三昼夜，营田守军九十五师一个营的奋起迎战；第十九师五十五团与敌争夺东塘冲反复拼杀；一〇七师三一九团在沙塘基的阻击激战等战斗。都给了敌军以重大的打击，也迟滞了敌军的进军速度，取得了一定战果，这是应予肯定的。这些地段的广大官兵，保卫国土、流血牺牲的爱国精神，更应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从全局看，新墙河、汨罗江两道筑有坚固工事的河防阵地，部署着十万防守大军，不仅未能执行有效阻击，给予敌军以重创，相反的仅仅相持一个星期，即放弃两道河防，一退数百里。只突出个别部队的英勇奋战，掩盖全军的逃战退缩，这已经是掩耳盗铃、极不光采的事实。而把局部的某些战果，竟渲染为全面战绩甚至美化为“湘北大捷”的组成部分，则完全成为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恶行了。

是不是有福临铺设伏歼敌万余这个战役呢？据我们所见所知，这简直是一个毫无根据、随意编制出来的虚幻故事。第一、从敌我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看，要想歼敌万余，没有五、六倍以上战斗力强的精锐部队，是绝对做不到的。而自汨罗江防线突破后，我军所有主力，均向侧、后远撤，长沙以北百余华里地带，已无我军一兵一卒，试问这个仗是用什么军队打的？这一铁的事实，是任何花言巧语也不能自圆其说的。第二、敌军进抵上杉市、路口畚后，未再向前推进，随后又是主动撤回原侵略据点的，等到我军得到确报下令反攻追击时，敌军已远走了。双方主力根本没有接触，又怎能凭空创造出一个歼敌万人的奇迹呢？第三、会战结束后，罗文浪因胞兄在江西阵亡、曾请假回原籍长沙福临铺探望。据亲友相告，由湘北正面和长平公路前进之日军，止于上杉市与路口畚，再未前进，停留两三天后，即各从来路撤走，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走得快，追击时来得迟，长沙东乡一带根本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事实证明，宣扬“湘北大捷”主要内容的歼敌万余的战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骗局。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记第七十四军参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

罗文浪

一九四一年春，江西上高会战后，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分驻上高、分宜、新喻地区补充整训，受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指挥，作为战区总预备队。九月上旬，湘北日军开始蠢动，于十二日进占岳阳以东、通城以西、临湘以南之大云山，十七日向新墙河我第四军守军进攻，十八日突破新墙河向守备汨罗江之我三十七军、九十九军全面发起攻击。这时，赣西北方面前线平静，九战区长官部乃决心使用驻江西之七十四军于长沙战场。于十八日电令该军作出发准备。七十四军因久驻赣西，远调湖南作战，运输补给均感困难，延至二十一日先头部队才开始行动。以驻上高之五十七师先行，驻分宜之五十八师及军直属部队次之，驻新喻之五十一师随军部行进。全军取道湘赣边境之慈溪、文家市向浏阳前进。由于时间紧迫，不能不白昼行军。加之民伕挑运行李辎重，目标更加显露。在出发一日之后，敌机频繁侦察，全军的行进方向已完全暴露。军作战参谋对部队经过地形未作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没有防空措施，因此在二十四、二十五日，五十七师、五十八师及军部通过浏阳城西蕉溪岭隘路时，受到敌机轮番轰炸扫射，在一条上下十五里两面是石山的羊肠小道上，麇集的部队伤亡重大，未曾参战，就被敌机将指挥系统打乱，挫伤士气，给以后的战斗带来不利。

二十五日深夜，军部奉长官部命令要旨：（一）、敌神田师团、青田师团已陷瓮江，向金井、高桥进逼，已令二十六军肖之楚部向金井、团山之线迎击，掩护你军之到达。（二）、你军应连夜赶到春华山、永安市、黄花市地区，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作为长沙外围阵地，协同七十九军夏楚中部固守长沙城区。军部奉到上令时，距防区不过一日行程，距金井、高桥之敌，亦不过百余华里，迫近战场，随时有遭遇的可能。但是，却麻痹大意，既未与前线友军直接联络，也不自派搜索部队。当时敌我态势是敌军主力由北向南，我军由东向西，右侧背完全暴露在敌攻击目标之下，按战术原则应派出侧卫部队以掩护主力之安全行进。军部由于相信长官部命令，恃有二十六军的掩护，又想早日赶到指定地区，争取时间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就未作其他战斗部署。只是令五十七师派先遣团轻装急进，先占领春华山以掩护主力占领阵地。不料二十六军并未执行长官部命令在团山、高桥一线阻击敌军，而是消极避战，将主力转入大山中，仅以少数部队佯攻敌人，以致敌军毫不受阻，长驱直入。适二十六日正午，五十七师刘安泰团赶到春华山时，即与敌先头部队遭遇，在春华山镇上展开白刃战，反复争夺。终因敌后续部队增加，春华山以北高地，均为敌军占领，先遣团掩护任务不能达成，被迫向南溃退。与此同时，敌主力由永安市向前进中的五十八师突然袭击。该师在蕉溪岭被轰炸扫射，官兵伤亡颇多，加之数百里行军疲劳，受到敌军由侧背突击，被切成数段，各级指挥官均失去掌握。混战不到几小时，即全师崩溃。王耀武当时亦穷于应变，只是令五十一师迅速占领阵地阻止敌人前进，并收容五十八师的溃兵，令五十七师于石塘铺一带阻击南犯敌军。混战至黄昏以后，五十一师师长李天霞不遵守军部命令，擅自将部队向东龟缩，阵地形成一大空隙。

五十七师正面又被敌突破，军直属部队在黄花市受到攻击。敌军在连续取胜之下，竟一反夜间不深入的常规战法，大部队向黄花市夜袭，将我军直属部队打乱。王耀武率卫士排仓皇逃跑，卫士排长为敌俘虏，被敌用军刀劈死，王耀武只差数步，因天黑才侥幸逃脱。五十八师和军直属部队官兵盲目溃逃，大部向普迹附近逃脱，一部分被敌军屠杀。这样一个兵员、武器装备颇齐、战斗力较强的攻击军，仅仅战斗一天，即全军战败，深为可惜。

九月二十七日，由金井南犯之敌，在与我七十四军结束战斗后，一部协同由福临铺南犯敌军进攻长沙，一部由梨梨附近渡过浏阳河，向株洲进犯。当晚长沙陷落，株洲亦于次日沦于敌手。敌军抢粮和击破国民党军队的整训目的已达到，于十月一日开始北撤。虽然湘北地区留有几万国民党部队，但均各保实力，只是俟敌军过尽，随之跟进，“收复”防地。到十月十二日完全恢复开战前状态。所谓“湘北二次大捷”，至此即告结束。

七十四军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后，大部靠近五十一师，在长、浏边境集结。唯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在全师遭敌侧击崩溃后，并不设法收容部队。竟只身带卫士由株洲以南乘火车回祁阳老家探亲，在车上适与九战区某高参相遇，向薛岳报告。十月中旬，蒋介石亲到南岳召开师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检讨作战经过。薛岳以廖龄奇临阵脱逃罪向蒋呈报。蒋介石在会议期间批准将廖龄奇枪毙。

七十四军在参加二次长沙会战后，即在江西宜春集结，整顿旬日，奉命开赴广西柳州以南之百朋、凤凰、来宾铁路沿线补充整训。各部损失以五十八师为最，每连不足百人，由贵州拨补部分新兵，稍加训练。到十二月底，又奉令开长沙参加会战，因各部队均驻铁路沿线，动员较易。于一九四二年元旦登车北行。一月

四日晨到达湘桂铁路湖南起点衡南的霞流市附近。正准备徒步行军，接到长官部电话：犯长沙之敌已败退，七十四军即在衡山附近集结待命。不久，传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空前胜利“捷报”和第十军坚守长沙战功卓著的嘉奖令。王耀武为学习友军守城经验和全面了解第三次会战致胜原因，乃抽调军、师参谋人员及特种兵部队长、歩兵团副团长等约三十人，由副参谋长孟广珍为首，组成参谋旅行团，报经长官部批准后，赴长沙市及以北作战地参谋旅行训练。我当时任五十八师作战科长，以演习第三师参谋长身份参加旅行，于一月下旬到达长沙。长官部对七十四军参谋旅行团颇为重视，先由参谋处长赵子立报告会战经过及第十军固守长沙街市取得胜利的经验。后又派副官处梁处长代表薛岳于易宏发西餐厅宴请全体成员。

我们在长沙市视察既设阵地时，有第十军官长陪同介绍当时战况。会战结束不久，各处工事被敌炮火破坏痕迹，仍未完全修复。湘雅医院墙壁上弹痕累累。据介绍，日军占据湘雅坚固房屋，曾以之作前进据点，数次向市区突击，均被我军击退。我们看到邻近北街的守军工事，除街中心十字路口筑成坚固机枪掩体，以交通壕向房屋联络外，其余均系利用房屋在墙脚开射孔，内挖掩体以被覆。既能对空掩蔽，且房屋为炮火击中倒塌后，反而增加掩体厚度。这种方法，是我军在台儿庄会战后总结的经验。此次第十军运用，又一次取得成功。二次会战时，七十九军仓促由澧县调来，在部署上跨越湘江，战况紧急就渡河避战。这次第十军三个师都在湘江东岸，重点在城北、城东，城南守军不多。当时日军迫近城郊，先由东部插入，北门守军后路切断，形成孤军作战，只能死守待援。我们看了城北、城东南各处防区，听到战况介绍，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虽然第十军介绍有些地方夸大，但从弹痕及

工事毁坏判断，该军的防御战斗是比较艰巨的，尽了最大努力。

在长沙近郊视察两天后，我们一行循长岳古驿道，经水渡河、安沙、青山铺、赛头市上影珠山，然后到福临铺看所谓“倭寇万人塚。”沿途已看不到大战痕迹，只是上影珠山顶老庙时，见到古白果树上有枪弹痕，老庙石壁上也有敌机枪所击弹痕多处，证实这里曾发生过战斗。询之向导及当地老百姓，说日军进攻时在沿路稻田中曾修了简易公路，碰到河流则抢劫老百姓桌椅板凳门窗等填塞，让坦克和汽车行驶。但由长沙撤退时，多数不是走大路，而是十几个人一队，一人持地图对照方位，向北撤退。在退到福临铺时，影珠山上原有二十军杨汉域部两个师，他们在山上向大路射击。日军就派出一支部队由影珠山南麓向山上进攻，很快就冲到离山顶老庙白果树处不到半里，杨部就向后撤退。后日军自动停止攻击，才勉强守住了山头。但再不敢向撤退的日军大部队射击了。还有福临铺东面的左公岭也有国民党军向日军夹击，日军也派出一支部队向左公岭攻击，国民党军被打死近百人，日军虽有伤亡，但还是占领了左公岭。一直到日本军大部队退完，影珠山上和左公岭的敌军，才随后撤退了。根据当时老百姓目击情况，所谓杨森堵击兵团的“大捷”，以及福临铺的“倭寇万人塚”，不过是两处堵击军与敌军侧卫部队的小战斗而已。

在影珠山视察后，我就便策马回清太桥老家一行。在家中所得情况，与沿途老百姓所谈大致相同，都说日军这次撤退，较一、二次更为快速，密集部队日夜不停地奔驰，拿着地图和指北针，逢山过山，遇水涉水，很少有单独离队的。敌军撤退快速，沿途丢弃病伤骡马甚多，装备弹药也有遗弃。骡马大多为老百姓拾得宰吃了。清太桥附近间有敌军遗弃的死尸，草草掩埋，后为居民挖出，剥去呢服皮鞋，暴尸露骨，为野狗乌鸦啄食。这些现象，是

前两次会战所未有过的。

参谋旅行约一星期，回部总结，认为长沙第三次会战，战果虽不若长官部的吹嘘，什么固守长沙歼敌数千，福临铺阻击杀敌万余，勒铭纪功，建造虚无的“倭寇万人塚。”但从守长沙的第十军官兵固守阵地，使敌不能占据长沙，敌军北撤时，担任侧击阻击的各部队，也不像二次会战的完全避战溃逃，多能适当抗击，因之敌军撤退迅速，沿途老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较上两次会战为轻。这点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承认。

一九八三年六月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回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

陈应庄

一九四五年春，国民党新六军由昆明调防芷江，我任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于三月底由重庆到达驻地。当时在芷江驻扎的，还有美军后勤司令部补给站。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几日，传来受降的具体办法。盟军方面，由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受降；盟军各战区，由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中国战区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受降，并确定芷江为接洽受降地点。新六军将最先空运南京担任警备。

八月十八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军参谋长冷欣、少将军参谋长蔡文治、少将处长钮先铭等先行到达芷江，作受降准备。二十日，何应钦率领高级幕僚由重庆飞抵芷江，设立陆军总部前进指挥部，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接洽日军投降事宜。当时随何应钦来芷江的还有国民党行政院所派顾问团和陆军总部参议刁作谦、龚德柏、顾毓琇、邵毓麟以及中外记者十余人。

何应钦到达芷江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卢汉、汤恩伯、王耀武、张发奎、廖耀湘以及湖南省主席吴奇伟等举行军事会议。事后获悉：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何应钦报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经过；接着宣布成立芷江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处理收复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项。具体有以下几点：

(1) 准备接待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2) 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3) 在日军未正式举行投降签字前；成立南京前进指挥所；(4) 在日军未正式签字投降前，迅速空运部队接管日军占领区，防止共军占据，并严令各战区日军在我接管部队未到达前，负责坚守其控制区，不让共军侵占；(5) 二十一日举行接洽投降仪式，派肖毅肃参谋长主持，陈应庄挂少校领章负责接待^①。为什么要我挂少校领章呢？因为冈村宁次派来的代表今井武夫系少将副参谋长，我当时也是少将，不便以同等级别接待投降代表，只好暂时屈居少校。

二十一日上午，陆军总部各处主管人员全部由昆明飞抵芷江。随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也亲到芷江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洽投降事宜。今井武夫是遵照蒋介石八月十八日致冈村宁次的电令前来接洽的。原电略称：

希遵照下列事项：(1) 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员(内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机场地形之飞行员一员)于八月二十一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迳飞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五千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上午十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早晨二时)，届时在六千英尺上空，当有盟军战斗机三架迎接之。……(2) 日机标志在机翼上下各须带光芒之日本国旗并于两翼末端各系一条四公尺长的红色布条，以资识别。(3) 盟军战斗机，将护送该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之第一架为盟机，第二架为日机，第三架、第四架为盟

^① 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载，另外一位接待人员陈昭凯是中国陆军总部的上校参谋。(271页)

机。(4) 今井副参谋长，须携带驻中国、台湾及缅甸以北，安南地区内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

八月二十一日早晨，碧空万里，秋高气爽。中国国旗遍挂芷江城，迎风飘扬，全城人民喜气洋洋。九时正，我空军混合大队野马式战斗机三架，朝常德飞行，至十时一刻在五千英尺高空发现绿色双引擎九五式日军运输机一架，从常德西南飞来。我机即分前后引导向芷江前进，于十一时到达芷江机场上空。另有我方战斗机六架盘旋空中警戒。我引导机一架首先着陆，日机旋即着陆，最后我护送机两架着陆。十一时二十分，日机绕机场滑行一周停在指定地点。此时机场上掌声雷动，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日军投降代表的神情。几十名中外新闻记者，纷纷把镜头对准日机和投降代表。日机两翼的太阳旗和两翼末端系有的红色布条，均被美国军官夺去撕成若干段，作为战胜日军的纪念品，日机着陆后，由中美宪兵严密监护。我作为接待人员，命令打开机门，让宪兵登机，嘱咐日军投降人员坐着不动，接受宪兵仔细检查，并没收所有武器及违禁品。宪兵报告检查完毕，我命令日军投降代表下机排队站着，由宪兵检查全身。检查完毕，即命令今井武夫及随员分乘两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驶向招待所。这所房子在芷江城东北，空军总站合作社的后面，是一所日本式的木板平房，有宿膳屋各一栋。吉普车到达后，我引导今井及随员进客厅休息。接着，要今井介绍他的随员。他便一一向我介绍：桥岛义雄大佐^① 参谋，前川冈雄中佐^② 参谋，木村辰男中佐^③ 译员，松原喜八少佐，久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作桥岛芳雄中佐(258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作前川国雄少佐(258页)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作特派，无军衔(411页)

保善助上士，小八重正航空员及中川正治雇员。加上他自己共八人，超过蒋介石所规定人数三人。介绍后，我问今井：“你认识我吗？”“七·七”事变前，我在北平新闻界工作，他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陆军助理武官，会过几次面。这时，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记不起了。”我把军帽脱下说：“你试回忆一下我们在北平的谈话。”他双目凝视我，说：“你为什么作了军人呢？”我半开玩笑地答道：“你们日本上自天皇，下至女中（女仆），全国动员侵略中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该从军抵抗你们的侵略吗？”他忙说：“是的，是的。”我又问：“我和你在北平的谈话，今天是否应验了呢？”他简单地答道：“命运，这是命运。日本再复兴要三十年。”我继续问道：“你们的法西斯侵略伙伴墨索里尼早已完蛋，最凶恶的希特勒纳粹德国也无条件投降，你们为什么还顽强地不肯放下武器投降呢？”他颇有感慨地谈了一些原因。谈话至此，便一道入席就餐。

陆军总部规定我对今井等人负完全保护责任，无论何人要会晤今井等人，必须通过我得到陆总的批准，今井等人的出入，也必须事先得到我的许可。

当天下午三时四十分，由我带领今井和他的参谋桥岛义雄、前川冈雄，译员木村辰男等四人往陆军前方司令部晋见肖毅肃参谋长，接洽投降事宜。接见地点就在司令部客厅。客厅布置简洁庄严，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遗像和国民党旗帜，还缀有中、苏、美、英四国国徽及巨形V字。参加会谈的有副参谋长冷欣，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及有关军事官员，新闻记者近百人。今井及其随员以谨慎而恭敬的态度，向肖参谋长敬礼。肖面对投降代表宣称：“我是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来接见贵官。接着，介

绍陪同接见的冷欣、柏德诺。旋令今井说明身份并提出身份证明。今井答道：“本人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在介绍了随员后，今井又说：“本人是派来晋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全权代表的，在停战协定签定前与贵部取得了联络，故没带其他证明，只有受任命令状。”肖说：“这也可以，请交出来。”今井起立亲自将任命状捧呈肖毅肃。肖又问：“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八月十八日六时致冈村宁次的复电，要贵官随带驻中国、台湾及越南和北缅十六度以上地区所有日本陆海空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表册，是否已带来？”今井答道：“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的日军，台湾、越南、北缅的日军不属他的指挥范围，故对此不了解。”今井说完，令桥岛参谋呈交驻华兵力配备图。肖也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交给今井，并令其签具收据，负责转致冈村宁次。这份备忘录，对于接受日本投降的我方军事长官的受降地区，作了具体规定。

今井接受备忘录后，要求对内容有所说明。肖答应另行派人解释，并告诉对方：“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将先在南京设置前进指挥所，派冷欣中将任主任，以便让日军投降事项顺利进行。所有前进指挥人员（附空军机场设立人员）将与贵官同飞南京。请贵官转告冈村宁次大将妥为保护，并切实招待。”肖接着说：“何应钦上将决定不待日本签定投降书，在最短期内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北平各地，以便迅速处理日军投降事宜。”今井一一答应，并出具收据，签名盖章。这时，中外新闻记者争相拍摄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

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我引导今井武夫乘坐插着小白旗的吉普车去晋见何应钦。陪同接见的有肖毅肃、冷欣、蔡文治、钮先

铭、柏德诺和中美记者。今井脱帽行至何应钦前，默然肃立，鞠躬敬礼。何问今井：“前日下午三时肖参谋长面交的第一号备忘录，贵官了解吗？”今井答非所问：“收到了。”何又问：“后来我派员又送来三件备忘录^①，收到了吗？”今井又答：“收到了。”接着，何郑重地告诉今井：“我已决定贵官仍乘原机飞返南京，希转告冈村宁次大将，对我前后交与的备忘录，务必切实照办。”今井说：“一定转达。关于备忘录的内容，敝总司令部一俟奉到东京大本营命令，即可决定。”何说：“本总司令已决定于本月二十六日以后，三十日以前，开始空运部队至南京。望贵官转告冈村大将，作好一切准备。”今井说：“是的，知道了。”最后，何应钦宣称：“今天谈话到此为止。贵官现在可以准备出发了。”今井鞠躬告退。至此，日本代表来芷江接洽投降任务，已初步完成。

今井武夫一行，于是日下午三时左右由芷江飞返南京。我用吉普车把他们送往机场。

一九六三年四月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为五件。(266页)

芷江受降侧记*

严怪愚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八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八月十五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哄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八月二十日，我奉报社派遣，就便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芷江的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四架，何应钦、肖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员及新闻记者五十余人同时赶到。二十日晚上，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字（Victory）。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四方面军与新

*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由南京飞抵芷江，商洽投降事宜。中国方面一般称为“芷江受降”。事实上，日本侵略军正式投降仪式是九月九日在南京举行的。本文仍称“芷江受降”。

六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干，他们已忙碌了三日夜，才布置好这一宏伟的场面。会场原为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乃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四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四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大钟一口，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在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所乘飞机未到以前，记者们特驱车到为日方准备的招待所参观。该所位于空军总站合作社之后，有小马路可达，为一灰色平房，食宿房屋各一栋。宿处系门形平房，共六间，每室备有未加油漆的木椅、木桌、木床各一张，红色门帘、被单皆系新置。进食处在其左右，且有休息室，朴素而整洁，连日方投降专使人员都觉得中国方面宽大优遇。

参观后，数千人伫立在机场等候日机到来，谁知到了正午十二时，还不见踪影。当时，机场广播台广播：日机已飞越常德，接着又说已过辰谿。但十二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日机中途迷失方向，错认洪江作芷江，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

在机场上，我碰着冯英子。当时湖南新闻界就只《中国晨报》有我们和沅陵《力报》黎浩三人参加。英子是报社特派来的。他告诉我，报社曾发行“号外”，全体人员渡过沅水到辰谿市区散发，市民们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从外地流亡来的人，看了“号外”，彼此握手，拥抱，跳跃，含着眼泪，互询何日买舟东归。

十二时十一分，日机飞临芷江上空；二十分，驶向指定地点

着陆。飞机两翼下面各缀有日本国旗一面，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的红色布条。二十五分，在严密保护下启开机门。陆军总部派陈少校（实际上是新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陈应庄少将）接待。今井武夫在机舱口立正，问陈少校是否可以下机？陈答称：“现在可以下机了！”今井着军装，佩军刀，首先下机，面有戚色，缄默无语。陈少校检查前来联系人员的名单，宪兵草草检查行李后，十二时三十分，陈少校即引导今井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吉普二辆入城。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横目挺胸，手握军刀，情绪颇为紧张。

日本投降专使住的招待所距机场约两公里，周围设有数层宪兵岗哨严加戒备（据说足足用了一营的兵力），不让老百姓接近，也不许新闻记者进入采访。

二十一日下午三时二十分，陈应庄等两位少校引今井及其随员分乘吉普开赴会场。会场正中桌旁坐着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其他翻译人员都立在王武左右）。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及文职人员顾毓琇、刁作谦、刘英士、龚德柏等亦都列席。中美新闻记者数十人，从走廊一直挤到会场外面。

会谈从下午四时一直谈到五时半，所有发言均译成中、英、日三国语言，其实，这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实质性的问题，肖毅肃宣布将在今井逗留的三天之内随时解决。

肖毅肃以何应钦的备忘录一份交与今井，要今井转致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关于日军投降及我方军事长官受降地点曾作详细规定，似乎把受降接收分成十几处，但中间没有一处有共产党军事

人员，也没有划给共产党军队一个接收地区，仿佛共产党根本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应当由国民党独吞似的。这种情况，连美国记者也觉得奇怪。

肖毅肃在递交备忘录时，特别强调要日军保管各地武器及财产，说不得交与没有接收权限的任何军队及团体，否则惟日军是问。日译员木村没有将这一段话详细译成日语，中国译员即提出抗议，木村只好重译一次。今井答复：“日军的精锐武器都在满洲国，在中国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武器都是陈旧的了！”这是挑拨，但也有几分真实。他接着又说：“中国军队想接收我们的武器及物资的很多，我们很难对付。”肖说：“那些都是些土匪或地方杂牌部队，一点也不能交给他们，如他们强行接收，日军可采取适当防卫手段！”又说：“在冈村将军完成投降手续以前，中国方面决定派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冷中将一行计划与贵方代表一同前往。何总司令决定在最短期间空运部队到南京、上海和北平去。为此，美国空军地勤部队将首先进驻。希望冈村将军配合我方，作好准备。”今井说：“本文件中有显然难以执行之处，希望在此陈述意见。”肖答：“有困难，留待以后再进行联系。”会谈即告结束。

在会谈中，冷欣时而站立，时而屈膝而坐，身体晃动不已，人又瘦小，简直有一点象一只猴子。新闻记者们都认为他有失国格。

芷江电信局任务繁重，新闻电报一时发不出去。我与英子商量，让他留在芷江，我于当日黄昏搭第四方面军吉普车回辰谿报社，将一切情况写成通讯发表。二十二日晨，再乘便车到芷江。

二十三日下午近三时左右，何应钦接见今井武夫，对他们“不辞辛苦远道来芷江，表示慰问。”并说中国决定八月二十六日

至三十日空运一部分部队至南京，希望日军加以协助。然后，今井等全体人员一起赴机场，下午四时飞回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先遣人员陈昭凯少校和空军地区司令孙桐岗上校及译员一名同行。

当天晚上，何应钦就在空军驻地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庆祝“胜利”，除了已经赶回自己的司令部部署部队调遣的几位高级将领之外，其他的人，包括新闻记者都参加了。何应钦捧着酒杯，到处找人交谈，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高兴过。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何应钦反问：“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记者再问：“日本投降以后，我们的政府对共产党如何处置呢？”何应钦说：“只要他们不捣乱，服从指挥，政府中可以给他一个位置的。……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不知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汽车西瓜，半车梨子，和一些高级糖果，我一边听他们谈话，一边饱吃了一顿西瓜、梨子。

一九八三年五月

参与程潜起义活动补述

程星龄

一九七九年纪念湖南和平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应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撰写《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一文（刊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当时主观上是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写的，现在看来，有两个主要问题并没有说清楚，需要加以补述。

（一）湖南起义并非城下之盟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对湖南起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湖南起义不是城下之盟。我认为有几点可以说明：

第一，一九四五年秋，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期间，曾去看望程潜，叙谈了很长时间。程潜敦促毛主席尽快离开重庆。当谈到国民党政府将来会要实行普选时，毛主席提示程潜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他说，搞成了，可以相机搞和谈，如果搞不成，就争取回湖南（意在搞局部和谈）。后来毛主席七十寿辰时，程潜平日喜欢作五古，很少写过律诗，这次却苦心锤炼了七律十二首祝寿，其中有“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之句，可能就是指的这回事。（见郭翼青《程潜起义的点滴回忆》）

第二，一九四八年夏，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当时李明灏（程

任北伐军第六军军长时，李是该军十七师师长）来汉口会晤，直率告以蒙周恩来的关怀，决计投奔解放区，准备先去香港接洽进入解放区的路线。程潜极表赞成，嘱咐他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代为致敬。李明灏到达石家庄后，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如实地汇报了程潜的情况和他向往革命的心情。（见李明灏《奉命去长沙促成程潜起义》）

第三、程潜回到湖南后，最初在各界欢迎会上讲话时，竟抛开邓介松事先拟好的讲稿，大骂共产党，并发誓一定要反共到底。这种反常现象，使倾向起义的肖作霖感到很恼火。他对程潜说：“您今天的话说得太露骨了，影响很不好。”程回答说：“你要知道，南京也正在听我讲话。”说明程是言不由衷，并非出尔反尔，而是故作姿态，意在蒙蔽蒋介石之流。（见肖作霖《湖南起义亲历记》）

第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程潜对我明确表示决心起义，并确定委托我全权代表他与地下党联系。一九四九年初，湖南地下党负责人周里到我的住所来看我。周对程潜愿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表示欢迎，指出要有实际行动表现，如不攻击革命游击武装，不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等等。我将地下党的要求转告程潜，他满口答应。其时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尚未结束，蒋介石的精锐主力还未丧失。二月四日，程潜单独接见长沙《中央日报》记者时表示：“对于整个大局，或和或战，我一唯人民的意见是从。”三、四月间，程潜按照地下党的意见，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备忘录，表明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投向人民。四月间，李达教授秘密赴北平，程潜赠送旅费五百元，并委托他代向毛主席汇报投向中共的决心。李达于五月十八日在香山向毛主席汇报了湖南的情况，毛主席很高兴。四、五月间，余志宏作为地下党的代表，曾与程潜两次秘密见面，都是由我陪同往见的。其时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不久，武汉刚刚解放。待到七月下旬，平江、浏阳、岳阳、临澧等县相继解放，湖南的和平起义，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阶段。在这以前，通过一个设在长沙乡间的秘密电台，程潜与党中央、毛主席有了直接联系。这些事实说明：程潜晚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就下了决心，并非一朝一夕。当然，更应该看到，湖南的和平解放，完全是湖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成就，程潜只不过是群众里面的一个代表而已。

（二）李默庵因备受委屈而离开湖南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掌握军权的李默庵曾表示倾向起义，但顾虑很大，终于在长沙解放前夕，借故逃往香港去了。”现在从当时全面的情形加以回忆和分析，李默庵的离长赴港，并不是由于顾虑很大，更不应该说成是“逃”。他是在备受委屈的情况下离长赴港的。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利用程潜与新桂系的宿嫌（一九二八年五月程潜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时，曾被李宗仁扣押于武汉），任命程为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主席，来钳制新桂系。同时，蒋对程也不放心，遂选派以李默庵为首的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随程回湘，掌握军权，即以李默庵为长沙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可以说，从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四九年初陈明仁回湖以前这段时间，李默庵是唯一掌握湖南军权的人，深得程潜的信任。

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退隐奉化，对湘事已是鞭长莫及，无力过问了。当时，可以阻碍和破坏湖南起义的已不是蒋介石，而是盘踞武汉的白崇禧。如何对付白崇禧，成为策划湖南起义的主要课题。湖南的兵力单薄，敌不过新桂系；要武力解决桂军，不仅力所不逮，并且会把长沙搞烂。因此，设计把陈明仁调回长沙，

让陈伪装坚决反共，与白崇禧步调一致，博得信任，借以欺骗和蒙蔽白崇禧，从而避免新桂系破坏湖南起义甚至危及程潜的人身安全（详见我所写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由于在湖南起义的酝酿阶段，李默庵已经亮了相，他是赞同起义的，旗帜鲜明，很显然，不可能再扮演陈明仁这样的脚色。加之设计调陈回湘一事是非常机密的，除程潜本人而外，了解内情的只有地下党的负责人周里同志以及余志宏同志，还有不能不参与这一机密的马子谷、唐星（他是唯一周旋于程、白之间的人）和我。此外，再没有人知道内幕真相了。当时考虑到：决不能让李默庵知道，因为他与刘嘉树、杨继荣等关系密切，这些人是坚决反共的。万一泄露出去，就会全盘失败，甚至祸生不测。

关于陈明仁伪装坚决反共，用以蒙蔽白崇禧的决策，是在长沙与刘斐商定，经过程潜同意，由刘赴武汉与陈明仁密谈并征得其完全赞同后，再向白崇禧建议的。陈明仁率部回湘后，为了伪装坚决反共，伪装与白崇禧采取一致行动，就必然要伪装得很跋扈，不仅把程潜丢在一边，对我更不在话下（为了必不可少的互通情报，就由李君九、温汰沫代表他，由我代表程潜暗中联系）。特别是对李默庵，不仅疏远，而且显得在彼此背道而驰的情况下，气焰嚣张，每每使李难堪。同时，程潜对李的态度也显得冷漠，不象先年秋天初回湘时那样推心置腹了。几乎没有什么机密事让仍是绥署副主任的李默庵与闻。他正是在如此左右为难、受尽委屈的处境下离开长沙前往香港的。一九七九年冬我到北京时，李俊龙曾对我谈及，白崇禧逃到台湾后，对别人说过，“我在湖南彼陈明仁和唐星两个人出卖了”。

李默庵备受委屈，离开湖南，并未违背初衷。他到香港后，不仅坚决拒绝了顾祝同、袁守谦等邀他前往台湾，拒绝了留港的

革命年代

少数国民党将领邀他参加组织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并且与留在香港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黄绍竑、刘建绪等数十人联名通电主和，使新迁广州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把所有列名通电主和的人予以通缉。李默庵后来由港赴美，仍然心向祖国，在当地中文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赞誉祖国的文章。不久前，他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侯镜如等在华盛顿发表宣言，呼吁军校同学发扬黄埔精神，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

一九八一年秋，李默庵和夫人应邀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从北京到达武汉市参观。恰好我也参加湖南的一个出省的参观团到了武昌。我和李久别重逢，畅倾积愆。他感慨系之，谈到三十二年前湖南起义前夕离长赴港的情景，说陈明仁从武汉调到长沙后，一反多年友好态度，遇事独断专行，盛气凌人，实在使人难以容忍。当时考虑，如与计较，诚恐生出无谓的是非与纠纷，使程潜处境尴尬，甚或贻误大局。经过反复思考，为了息事宁人，顾全大局，不如一走了之，遂决计离长赴港。李默庵谈话时心情平静，我认为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事实说明：李默庵确是在备受委屈的情况下出走香港的，并无别的什么顾虑。三十多年来，他从长沙去香港，从香港去美国，羁旅海外，眷怀大陆，为促进祖国统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直到现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正确的，始终如一的。记得解放后不久，程潜有一次和我谈到湖南起义问题涉及李默庵时，曾带着内疚的心情说：“默庵没有负我，是我负了默庵。”程潜此论公允，适获我心。武昌叙旧时，曾以之转告，他表示远走香港前未与程深谈，是自己的错误，为此感到愧疚。

总之，李默庵热忱爱国，当年在长沙中途离去，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事上之遭人嫉忌，免使程潜烦虑，甚至贻误大局，绝非政

治认识动摇。我在《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一文中所谓“顾虑很大”，“逃”往香港，纯是臆测，毫无确据，甚以为歉。故补述如上，以资订正。

一九八四年四月八日



接管湘潭

杨第甫

(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我随王首道同志进关。同行的还有李锐、袁福清等同志。中央决定，黄克诚同志任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同志任第一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和高文华同志任副书记。我们即日离开沈阳，第二天晚上到天津。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的主任，所以我们先到天津集合。金明、高文华同志已在天津了。黄克诚同志这时正住医院，加上天津的工作一时离不开，就商定由首道同志带队入湘。

我们到达中原局所在地开封后，才知道有五个区党委准备进入湖南。这五个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是武光、乔晓光、刘慎之、王任重、李楚黎。当时的中原局是邓子恢同志负责，林彪也到了那里。在开封召开进入湖南的五个区党委及所属地委负责人会议，除王任重那个区党委外，原来四个区党委的同志都参加了。由林彪宣布中央的决定。撤销区党委，成立湖南省委，王任重那个区党委留湖北，李楚黎那个区党委去广西，以留下的三个区党委为主组成湖南省委。武光那个区党委人数最多，划分为长沙地委（后改为湘潭地委）、长沙市委和衡阳地委（辖衡阳市），长沙地委书记武光，长沙市委书记曹瑛，衡阳地委书记傅生霖，这个区党委

的副书记周小舟调到省委当宣传部长。乔晓光那个区党委划分为常德、益阳两个地委，乔晓光任常德地委书记，周惠任益阳地委书记；这个区党委的组织部长郭森调省委当组织部副部长。刘慎之那个区党委划分为零陵地委和郴州地委，刘慎之任零陵地委书记，郴州地委书记是随三五九旅南征时留下来的刘亚球，副书记是随金明南下的周志余；这个区党委的行署主任张孟旭调省政府当秘书长。金明同志带来的两百多山东干部到邵阳地区，夏如爱任地委书记。这时，省委除了黄、王、金、高四位书记外，省委委员还有秘书长刘型，长沙市委书记曹瑛，长沙地委书记武光，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零陵地委书记刘慎之，宣传部长周小舟，财经委员会主任宋乃德。进入湖南时，高文华兼组织部长，随后由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里任组织部长、省委委员。当时省委没有办公厅，只设秘书处。在开封成立的临时秘书处（包括省委、军管会、省人民政府），处长是我。我推荐唐亚子为秘书处副处长。

五月十七日，武汉解放，白崇禧窜到长沙。人民解放军稍事休整后又挥戈南下，追歼残敌，直逼湖南。省委从三个地委抽调了四、五十人打前站，由我负责。

我们抵达武汉时，才解放不久，军管会设在德明饭店，主任是谭政，陶铸是副主任，钱瑛是华中局组织部副部长。我们找到德明饭店，钱瑛见到我就说：“小杨，你们来了，正要找你们。”我把情况简略地向她作了汇报，她要我先去找陶铸。找到陶铸，他把我们安排在扬子江饭店住。于是我们就分头在武汉找住房，安排去湖南的四、五千人的住宿。过了十多天，首道同志带着省委到了武汉，休整后，乔晓光他们走沙市过江进入湖南常德。武光他们分两路，一路是长沙地委机关和岳阳、临湘、湘阴等几个县委，坐轮船到岳阳，开始时把地委机关设在岳阳。另一路，湘潭

市委、湘潭县委、长沙县委、平江县委、浏阳县委、醴陵县委，还有长沙市委也一道先坐火车到邻近通城的一个小站，下车后，步行到通城，再由通城步行到平江。在武汉时，华中局向省委提出，湘潭县是毛主席故乡，一百多万人的大县，要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并点名要我去。当时，湘潭县委的班子已经配好了，县委书记刘旭，县长姓魏，组织部长毛华初，宣传部长谢黎，公安局长徐多礼。经省委研究，把老魏调到邵阳当专员，把我插到湘潭县当县长兼县委副书记。我调湘潭县后，省委调益阳地委副书记杨新一任秘书长。因此离开武汉时，我就和湘潭县委一起行动。到平江后，金明同志要听准备接管湘潭的汇报，湘潭县委的情况是我汇报的，市委由刘祥庆汇报。金明、曹琰听了汇报后，提议撤销湘潭市委，与湘潭县委合并，因为湘潭本来就没有市的建制，由市委、县委两单位去接管，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于是，就向省委发了一个电报请示，第二天省委回了电，同意合并，撤销湘潭市委。我们在接管湘潭县以前，就先把市委合并到县委。我们在平江实行湘潭县市合并后，队伍开到了春华山。省委通知我们，不要进入长沙市，可直接走株洲去接管湘潭，并拨给我们一个连，当时部队驻在永安市。我们走到黄花市住下来，黄昏时，我和刘旭等人坐车去永安市，与那个连取得联系后，就往回走。一路上久别家乡的我沉醉在月明风清，稻香扑鼻的境界中。车到离黄花市二十几里的地方，忽然前面机关枪朝着我们的车子开火，我以自己是湖南人，熟悉情况，就坐在前面，结果一枪打在我坐的汽油桶上，好在油桶没装满油，只把油桶打穿了，没有起火爆炸，但打碎的油桶片却把我的头和腿击伤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大家赶紧下车，伏在稻田里。这时听到对方喊“缴枪”的是吉林口音，我马上想到可能是与解放军发生了误会，就

向他们喊话联系，他们停止打枪，走了拢来，我拿出四野的护照（当时入湘的部队是四野的），一看护照上有血，才发现自己受伤了。一经询问，果然是自己的部队，确实是误会了。

我们在黄花市停了一天，第三天到了株洲，第一个以党员身份来与我们见面的是廖新雨同志。

（二）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黄昏时，我们进入株洲。

株洲当时还只是一个六、七千人的集镇，属湘潭县，是乡公所所在地，也是粤汉、湘赣铁路的交叉点。镇子不大，地当要冲，附近有淦江铁路桥，有田心车辆厂等。因此省委要我们先进入株洲，做好大军南下衡阳时的后方准备工作，并由长沙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袁福清（后任省交通厅厅长）接管工厂和株洲车站。八月四日下午一时左右，廖新雨来找我，自我介绍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带来了田心车辆厂的资料。我要他找湘潭地下党负责同志来和我们共商接管问题，他接受这个任务后急急忙忙走了。

廖新雨是湘潭人。一九四八年冬，他结识了进步人士叶镜吾（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其堂弟叶炳吾（解放后任株洲工商联主任，现为株洲市政协委员），湘潭县城市工委决定派他来株洲，利用叶氏兄弟的关系，以小学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做好迎解准备。

廖新雨去湘潭后，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陈明仁部一个团，不愿随陈起义，拖枪向衡阳逃跑，扬言要进攻株洲。当时袁福清代表军管会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只有一个连担负着保护百多干部的任务，敌人是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力量悬殊太大，不能打，只能撤离株洲，以避其锋。当时我因事

迟到，等我到时，撤离的意见占了上风。袁福清已要大家整理行装。我走进门就大声喊：“走不得！”我说，大家都是北方来的，南腔北调，人地生疏，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很难得到帮助。如果我们一撤，人心涣散，敌人一个冲击，就会把我们冲垮。我们有一个连的兵力做好防御的准备，还有百多名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敌人如来袭击，我们坚守待援，只要枪一打响，附近的解放军就会来支援我们。何况敌人不知我们虚实，他是漏网之鱼，我是得胜之师，不是我们怕他，而是他怕我们。只要我们沉着应战，敌人可能不敢惹我们而绕道过去。部队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同意这个分析，认为还是不走为好。结果决定不走。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觉，严阵以待。那支逃窜的国民党部队，由于不明虚实，绕过株洲，悄悄地溜过去了。如果我们撤离株洲，这个镇就会被匪军乘虚而入，抢劫一空；如果我们迟一天到株洲，这个镇也可能遭到逃匪的蹂躏。通过这个事件，我深深地体会到，省委要我们先接管株洲是完全正确的。

八月六日，廖新雨同湘潭县城市工委书记张犀文从湘潭来株洲，向我们汇报了湘潭县工委和城市工委迎解准备工作情况。我们听了汇报，认为应尽快去接管湘潭，但要先请示省委。于是，就派县委委员、县公安局长徐多礼和张犀文去长沙，向省委汇报请示。

我们在株洲一面进行组建株洲区的工作，一面把县市合并后的干部进行重新安排，原市委书记刘祥庆回地委另行安排；原市委组织部部长马壮坤任湘潭城关区区委书记，参加县委；其他干部统一安排到湘潭县各部门工作。县委还作出决定：各区都要有一名地下党的同志担任区委副书记或区长副区长。湘潭县被接管后，杨凯（地下城市工委组织委员）任城关区副区长，李如春任

易俗河区区长，欧阳耀荣任石潭区副区长。我们还把株洲乡扩大，划为湘潭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是刘成志，区长是胡维新，李夫和廖新雨为副区长。第一区人民政府设在原乡公所里面，并接收了十三条旧枪和几张桌椅板凳。保甲长都暂时不动，利用他们筹粮支前。

省委听了徐多礼和张犀文的汇报后，来电话通知我们去湘潭。我要廖新雨到车站找车。车站给我们调了一个车头、两个车皮专程送我们去湘潭。同我们一道到株洲的解放军连队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我们。火车到湘潭已是夜间了。我们从板塘铺坐划子过湘江，护送的部队在河岸上架起机关枪、迫击炮掩护。船到中流，我用手划着河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故乡啊，故乡！我离别你十年了。十年前被通缉出走，十年后捧檄归来。如今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即将实现，怎不教人欢欣鼓舞呢！我情不自禁地掬了一口清凉的河水润喉，叩舷而歌，吟成一首《清平乐》：“我因肠热，踏遍关山月。心逐江涛天地阔，点点乡情泯灭。凭栏满目凄凉，涛声如诉衷肠。笑向迎来父老，河山正换新妆。”

(三)

湘潭是和平解放的。但不是因为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而跟着和平解放的，这里面湘潭的地下党作了许多工作。当时驻湘潭的部队，是陈明仁的两个师，一个师扎在湘潭街上，一个师扎在易俗河附近。一九四九年五月，程潜派马良骥任湘潭县长。七月二十一日，程潜到邵阳后没几天，白崇禧就指派少将高参吴声儒（湘潭人）带一个营武装包围县政府，抢了马良骥的县政府大印而当了县长。从此，新桂系势力控制了湘潭县的政权，妄图作

垂死挣扎。国民党县党部分为党、团两派，他们不是程潜、陈明仁的人，彼此勾心斗角，都没有跟着程、陈弃暗投明的打算，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湘潭市的地下党组织原来叫总支。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时，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湘潭县工委设立了城市工委。当时省工委认为，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依靠南下大军的力量完全可以解放湖南。因此，湖南的工作重点不在武装斗争，主要是作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争取尽量减少破坏。湘潭县城市工委成立后，主要也是作这方面的工作。一面开展社会调查，对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组织和人员进行尽可能的全面调查；一面抓紧进行统战策反工作，稳定国民党军队、警察和党政机关的人员，尽量争取他们向人民靠拢，不准他们捣乱破坏。

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湘潭先后成立了几个地下的民主党派组织。湘潭县工委及城市工委注意团结民主党派一道工作，为湘潭的和平解放作了重要贡献。当时，摆在地下党面前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贮存在几个仓库里的几万担盐。那时食盐是一种很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物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掌握了盐，可以安定人心和稳定市场。他们对这一大批食盐的保护和处理，首先是搞调查，摸清情况。城市工委直接配合地下民革和民盟组织展开了调查工作。吴声镛企图削价抛售食盐，参加了民革组织的县政府主任秘书龚业光和湘潭盐务处长黄勉夫向我们提供了这个情报，我们就发动群众及时制止了。当时情况很紧张，解放军还没有进城，省工委通知他们组织群众进行保护。他们接到指示后，就发动工人组织纠察队，注意防范，加强治安，

并制造社会舆论，反对削价卖盐，结果绝大部分存盐被保存下来了。（有一个盐库被偷运走七八十包盐，工人纠察队很快地把它截了回来）这就是统战工作的成绩。

由于地下党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为南下大军和平解放湘潭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湘潭的解放和接管工作不可能这样顺利进行，肯定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

八月十天左右省委电告我们去接管湘潭时，没有告诉我们湘潭有无解放军。我们一接到省委通知说可以去，就出发了。十一日晚，我们由株洲抵达湘潭，到板塘铺一过河，我们即派王者兴到湘潭县政府去联络，才知道陈明仁所属二三二师全部扎在新群学校。而解放军一三八师只有一个连扎在湘潭师范学校内。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湘潭的。一进湘潭，有两件事马上要办，一件是与地下党的同志汇合；一件是立即着手接管。到湘潭的第三天晚上，吴声镐在大坪里召开了有两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解放军进城。因为是晚上开会，同志们都不愿意去，也不让我去，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到有群众的地方去宣传党的政策，为什么不去呢？”结果，我带着警卫员去了。地下党的同志也去了不少。当时，会场上没有扩音器，我就放开嗓子喊，全场鸦雀无声，都在认真地听。这次讲话对稳定当时的人心，推动接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准备接管县政府时，吴声镐不想交印。因为当时毛主席有电报挽留陈明仁当湖南省主席，他也不想继续当县长。于是县委就召开会议讨论。原地下县、市工委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县委委员中只有少数负责同志坚决主张接管，而反对马上接管的同志较

多。其理由是：第一，毛主席还挽留陈明仁当省主席，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吴声镐这个县长挤走呢？第二，筹粮支前的任务重大，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力量（县委带来的干部总共只有百多人），能完成任务吗？不如把这个担子压在他们身上，我们去发动群众筹粮支前，能完成任务就好，完不成任务，责任在吴声镐。不同意上述意见的同志认为，毛主席挽留陈明仁，有个全国影响的问题，吴声镐不能与陈明仁相比，他对白崇禧有幻想，脚踏两只船，不是真正起义人士。只有把县政权夺过来，才能保证各级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才是真正解放了。如果我们去发动群众，帮助吴声镐筹粮支前，岂不是为国民党县长涂脂抹粉吗？其实不接管县政权，群众实际上也发动不起来，支前这么重的任务，完不成，责任归他是一回事，影响部队的给养怎么办？接管了政权，我们就可凭借政权的力量发号施令，指派保、甲长为我们筹粮支前，保证部队的给养。两种意见争论得比较激烈，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当时我正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是躺在椅子上发的言，发言时可能是面红耳赤了。第二天一清早，刘旭对我说：“老杨，我昨晚未睡好觉，想了一晚，觉得还是你们的意见对，我赞成马上接管县政府。只是你发言的神气，有点咄咄逼人，这不好。”他这种谦虚精神和善意的批评，使我至今难忘。

县委决定接管湘潭县政府了，但吴声镐不想交权。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与进步势力向他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人去做吴的工作，说：“如果你不把县政权交出来，能保证完成筹粮支前的任务吗？贻误军机，是要军法从事的。”吴说要请示省政府。我们又利用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矛盾，由二三二师师长康朴两次电告陈明仁，要求我们尽快接管，以安定人心，解决军需，结果陈明仁电令吴声镐，要他“办理移交”。接管仪式是八月二十二日

在县政府礼堂进行的，县直属单位的人都来了，还有一些绅商各界的头面人物，约三百余人。由吴声镐的主任秘书龚业光代表他以新旧移交形式来打移交，龚把旧政府的大印用红布包起来，在主席台上交给我，我一手把印推开，郑重宣布：“这不是新旧县长打移交，这是人民推翻了旧政权，成立了湘潭县人民政府！”借此机会，我再一次宣传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法令政策。

我们正式接管湘潭县时，敌我阵线还很分明。从柃木桥、中路铺以北是解放军，茶恩寺以南是白崇禧的部队。其间还有一个游杂武装活动的地段。当时，白崇禧在衡阳扬言八月十五到长沙过中秋，省委要我们准备打游击，所以刚刚接管，我就把文件、大印交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原县工委书记李克孝，要她保管起来，准备撤退。

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筹粮支前，当时湘潭县要供应四十六军、四十九军，还有二野的先遣部队和四野的后勤部以及县级党政军机关的给养。由于任务大，时间紧，我们首先采取向余粮户借粮，所借之粮抵征公粮数；再就是利用保、甲长筹粮支前，给他们规定三条：①按期完成任务；②一定要按照联合布告所指示的办法借粮；③各保甲长要将所借粮户的粮草出榜公布。并责令他们戴罪立功，违者调县受训。为了防止他们营私舞弊，除发动群众检举监督评议外，还规定凡征集到的粮草，只要他们负责入库，出仓由政府负责。规定公布后，我们就全力投入了筹粮支前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当秋收快要结束时，我们召开秋征工作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借粮进入正式征收公粮，并提出开好三个会：分三片召开农民代表会，召开保民大会和与地下党的会师大会。三个会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深浅不一，与地下党员的会师会要

谈得深一些。三个会的主要内容是：①农民代表会不产生任何机构，只研究征粮问题；②宣传政策，告诉农民，我们是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哪些事今天应该做，哪些事今天不能做；还要宣传合理负担的政策；③向农民解释利用保甲长的问题。在地下党会师会上还谈了选农民代表的条件：一是要实际参加劳动的；二是要熟悉地方情况的；三是要做事公正，为人正派的。在我们尚无基层组织的时候，强调了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同时又有地下党的同志、训练班的同志提供的情况，当选的代表，基本群众还是占多数的。地下党会师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中心工作的会师，要共同认识征粮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征粮的顺利进行；一个是统一认识的会师，要共同认识掌握政策就是站稳立场。总之，要求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员不仅要做到在工作上会师，而且要做到在思想上会师，大家在党的方针政策的原则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为搞好湘潭县的工作共同努力。由于认真开好了这三个会，做好了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团结工作，同时宣传了党的政策，发动了群众，因此，各项工作还是做得有成绩的。从八月二十三日正式接管县政府起，到十一月二十日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止，我们共供应部队四百七十二万斤粮，五百八十万斤柴，动员了民工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一名支前，组织了长途运输船三百零七条担任运输，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因当时保甲长舞弊，用大秤收谷入仓，一九五〇年四月清仓时，发现还多余五百多万斤谷。

第二件事就是剿匪安民，收编游杂。当时湘潭还是前线，易俗河、晓忠区以南各种杂色部队及土匪武装约有二十五股，共六、七千人枪。他们派粮索款，敲诈勒索，弄得人心不宁，秩序混乱。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沟通城乡来往，我们将收编游杂、剿匪安民

作为另一项主要工作来抓。由于大军南下，声威所至，匪特丧胆，我们一方面以县长的名义写信给各游杂武装，要他们不再派捐索款，粮草由县政府供给，并勒令土匪将捉去的人质退回，同时要地主尽快交出应征的公粮。另一方面，着手收编武装，清剿土匪，十月以前，共收编五大股，计三千一百五十人枪，剿灭四股，约一千人枪，缴械归农的九股，约二千人枪。收编游杂武装时，主力部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只要我们通知他们，他们就派部队配合行动。

第三件事是接管工作。这是变反动的统治机构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第一步。在人民政府统一安排下，划分军政组、文教组和财经组，由南下干部、地下党员和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同志混合编组，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进行接管。

军政接管工作：我们接管县政府后，吴声镐准备携眷逃跑，张尚舆告诉了我们，只是由于公安部门的一时疏忽，让他跑掉了。警察局长、田粮处长、法院院长在接管前也都畏罪潜逃了。旧职员也有一小部分作鸟兽散，留下待接管的共二百九十七名，除留用一百二十二名外，受训遣散的有一百七十五名。公安方面先接管旧警察及自卫总队人员武装。警察中队也有准备逃跑的。肖家实从张尚舆那里得到消息，马上告诉我们。我们与一三八师商量，第二天清早由部队出面，命令所有警察徒手集合，听我们训话。就这样被我们措手不及地缴了好几百条枪。这就是统战工作的作用。否则，让这几百人拖枪跑了，该会留下多大祸根呀！接管以后，我们建立人民公安部队，登记国民党特务分子，并开展收缴私枪的工作。

财粮接管工作：盐务处、银行、税务局、邮电交通部门和慈善机关，均先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按入城八条规定，所有财产物

资一概不准动。当时食盐最为民生所需，被国民党人员从盐库偷运走的七、八十包盐已被追回。我们考虑到军需政务，在在需款，因此决定，追回之盐是接管外的，暂不入库。这时我四十九军一个师在追击白崇禧部时，于湘乡、邵阳间遭伏击，伤亡甚重。当伤兵运到湘潭时，拒用人民币之风席卷全城。我们一方面召集各界人士公开说明战斗伤亡原因，另一方面将追截回来的那几十包盐抛入市场，只收人民币，银元、金子都不收。这样一来，很快就稳定了市场和民心，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售盐所得之款，大部分作了安置伤员的费用。还在城里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这就解决了县级机关的日用开支。以后加上清仓清出来的五百万斤谷，使湘潭县的机关财经成为全省最富有的县份之一。当时，从姜畲、七里铺到韶山没有公路，省交通厅也没有资金修路。我们就用这笔钱修了这条公路。同时，我们还用这笔钱架通了各个区乡之间的电话线。

接管学校：我们首先接管城区三个中学，即省立女子师范、简易师范和湘潭中学。然后接管小学，计中心国民学校35个，保国民小学705个。女子职业学校7个。接管方针是，废除反动的训育制度，取消国民党党义和军训课程，其余暂维原状，然后逐渐改造。

在接管初期，我邀请了一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如曾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的刘揆一（因患肺结核限于行动，派其长子刘安鼎作代表）、原国民党财政部国税署长李悦、长沙《大公报》创办人张平子、湖南明德中学校长胡迈、曾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的马文义等先生进行座谈，他们知无不言，反映了不少情况，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对接管湘潭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事隔三十多年了，我对这些老先生们关心桑梓建设的爱国热情，记忆犹

新。

湘潭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召开，我在会上作了县人民政府三个月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汇报了有关接管工作、剿匪安民收编游杂武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情况，希望大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湘潭。大会向毛主席发出了致敬电：“湘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今天热烈而又成功地闭幕了。从前国民党反动派，把人民当作他们的奴隶，现在人民从历史上第一次抬起头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人民大翻身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结果。今天湘潭县各界人民代表，向您谨致诚恳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我们出生在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故乡，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光荣。我们学习您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思想，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共同作出了三个决议：（1）突击送粮和恢复与发展生产；（2）清匪反霸和建设人民武装；（3）组织农民协会。我们一定号召全县人民，坚决执行这些决议，为建设新湘潭而努力。”

大会还向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在解放后三个月，湘潭县各界代表会议胜利召开了。这一历史上未曾前见的盛大民主集会之所以能够召开，完全是由于您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的结果。我们向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高度的感谢和敬意。我们坚信，不要多久，一定可以完全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我们代表湘潭全县人民保证，一定做好支援前线，优待军属的工作，为最后完成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而献出我们最大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回忆湖南起义时的秘密电台

郑挹梅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和平解放。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全国政协和湖南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已有多篇资料作了较全面的反映。但有关黄雍由上海回湘工作和秘密电台的情况，却很简略。我作为当年亲身参加这一事件的人，在拜读了这些文章后，不免引起许多回忆。在整个湖南和平解放运动中，我们的贡献虽很微薄，但它显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远见，以及对湖南和平起义的重视。黄雍回湖南工作前后情况，我略有所知。秘密电台的设置，是由我具体负责掩护的，所以了解颇详。现将这段历史事实叙述于后，作为湖南和平解放运动史的一点补充材料。

一九四六年初，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批请求退役的高级将领名单。其中也有黄雍的名字。那时，黄雍仅四十七岁。我问他为什么要退役？他说：“无官一身轻，抗日战争结束了，不退役难道打内战？”此时，我一个人先去上海，听说黄雍要在南京办学校，又与肖作霖一起筹办《大道报》。不久，他也来到上海，打算在上海筹办中正学校。

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是黄雍的黄埔一期同学宣铁吾，宣在上海接收了大批敌伪财产，校舍和用具都很容易解决。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便开了学。

此时，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日趋高

涨，上海中正学校虽然是在教育局立案的私立学校，但是其后台及校方主持人、教务委员都是黄埔系军人，在社会上一些人看来，这所学校必然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然而，实际情况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在黄雍主持学校工作的两年中，竟不准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校内建立或发展组织，教务处由他自己控制，容纳了一些进步教师。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上海发生工人、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时，训育处严禁外出参加，但是部分学生仍然冲了出去参加游行，并得到黄雍的支持。

黄雍的这些做法，遭到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非议和忌恨，尤其是学生参加游行一事，有人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给黄雍来了一封信，要他亲自将学校里四名有共产党嫌疑的教师押送南京，为此他还从南京专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黄雍，说：“吴国桢市长和宣司令来南京时，曾与总统谈到此事，我以朋友的身份劝告你按信中所述执行。”黄雍没有按他们的意图做。他送了一笔路费给教务主任肖克勤（共产党员），请他离校暂避；复旦大学在此兼课的陈遼教授（进步人士）和另外两位进步教师，均留校照常领薪，只在教课方面做了调整。黄雍这样处理，当然不会使国民党当局满意。但他个人在黄埔同学中颇有名望。各方面的关系又较好，大家碍于情面，也就不去追究了。这时，韩城及闵佛九两位挂名的校务委员早已垂涎学校的领导权，趁机挑动部分教师和职业学生闹起学潮，搞了一个“驱黄运动”，迫使黄雍于一九四八年暑期辞去上海中正学校校长职务。

黄雍在南京、上海一带为了办学受到一部分反动的黄埔学生的排挤，心中非常苦闷。就在他感到愤懑，对茫茫前途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手。

一九四八年八、九月，中共中央派吴克坚到华东地区工作。

他先在南京找到了活动于京沪一带的地下工作者戴宗义，叫戴找黄雍。戴随即前往上海，到中正学校宿舍，在黄雍秘书吴少岳家见到了黄雍，商订黄雍与吴克坚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吴克坚、戴宗义、吴少岳、黄雍均为湖南平江人）。

这年初秋的一天，在上海林森中路（现名淮海中路）与迪化中路（现名乌鲁木齐路）交界的小公园里。黄雍与吴克坚会了面。那天，吴克坚先到约会地点，戴宗义陪黄雍到路口，以甩帽子为信号，表示没有情况，可以会面。黄雍自与吴克坚见面后，精神振奋，他谈到与吴见面的情况时说：“吴克坚问我在当前的形势下可能做些什么？我表示我是湖南人，愿回家乡为解放事业做些工作。吴说具体任务他要请示，叫我安心等候命令。”黄雍这时较清闲，决定先回湖南去看看情况。我问他：“任务下来怎么联系？”他说：“吴少岳会打电报给我。”

吴克坚这个名字对我并不陌生。一九四二年在重庆时，黄雍从军政部调军事委员会任中将高级参谋兼管总务处的工作。有一天，他告诉我，在路上遇到他少年时候的朋友吴克坚了（吴是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据说那时负责新华日报的工作）。我问他：“你们谈了些什么？”黄雍说：“现在地位不同了，能谈什么，只打了个招呼，不过没有关系，有吴少岳哩，吴少岳托我办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他当时说这些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回想起来，那时吴少岳在黄雍与吴克坚之间就起了一些桥梁作用。

吴少岳这个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能书善画，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和黄雍在一起，抗战期间，黄在重庆城里的住处，也就是他负责的几个部队的联合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是为李默庵、王劲修、杜聿明几个人办事的。办事处的楼上黄雍自己住，并用来招待客人。楼下住着两个职员，一个是吴少岳，任办事处的秘书兼

黄的私人秘书。另一位是周茂僧，负责日常事务和对外联络。抗战胜利后，吴少岳回到上海中正学校，周茂僧回长沙去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程潜回湖南任长沙绥靖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那时，在湖南的黄埔学生很多，湖南的黄埔学生对桂系是排斥的，对程潜相当的敬重。陈明仁、黄雍在未进黄埔军校之前。就在程潜举办的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受过训，与程潜有师生之谊。湖南的这种条件对黄雍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一九四八年秋，黄雍回到长沙，为了便于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活动，需要有一个据点。他过去是南京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的负责人之一。调查处这个机构的前身就是黄埔同学会，从来不受任何人的钳制，能够自由活动。他决定搞调查处的湖南分处。他这个想法稍有表示，就得到黄埔同学们的赞同。黄埔一期的蒋伏生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他立即叫那时任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的蒋肇周把这个职位让给了黄雍。黄接过湖南分处后，在上学宫街十号租了几间楼房，作为办公地点。除原有的一名工作人员周荣外，又把周茂僧也安置在调查处作他的助手。

这年十一月底，黄雍将我和孩子也接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潘家坪十一号，地点较为偏僻，很少有客人往来。

一九四九年初，也就是春节的前三天，在潘家坪家中收到了吴少岳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黄雍速去上海。第二天，黄雍就动身去上海了。大约两周后，黄雍返回长沙，他告诉我，这次到上海是同吴克坚、何以端两人见面的，交给他的任务是了解湖南军政界的动态，稳定程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学生随程潜和平起义，吴克坚还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两项：一是请党中央派人到长沙具体领导工作；二是请拨给通讯工具（电台）和配备工作人员。吴、何同意了他的要求。此后，为了便于工作，

黄雍就搬到调查处去住，他天天忙于与长沙市各界人士来往，很少回潘家坪家里来。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黄雍的黄埔一期同学黄杰（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驻衡阳第四编练司令部司令）来到长沙，与黄雍见面。黄杰与黄雍私交很深。据黄雍说，他这次是从溪口来的，带着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勉励陈和在湖南的黄埔学生，要他们效忠党国，打一次硬仗。

这年三、四月间，黄雍、姚渐逵等在上学宫街十号组织了全省在乡军官会（湖南省在乡军官约千余人，并有不少武器）。后来，改成全省在乡军官自救会，陈明仁任主任委员，黄雍任副主任委员。这个组织曾为迎接湖南和平解放作过工作。

当湖南和平自救运动日益高涨时，蒋介石对程潜施加压力，要他离开长沙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白崇禧从武汉来到长沙，把程潜的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和党军政联合办公室主任肖作霖逼离长沙。并把所有不符合桂系的人陆续撤换。程潜的处境相当困难，心情十分苦闷。国防部次长刘咏尧与杨良（黄埔一期学生）也来长沙活动。刘劝黄雍让杨良和苏文钦（黄埔一期学生）帮助他搞湖南的调查处，被黄雍婉言拒绝。此后，国防部就不再给湖南调查处拨经费了。听说调查处的开支后来是由程潜拨给的。

四月间，我因患病，住进长沙湘雅医院。有一天，黄雍来医院告诉我：“黄杰又来长沙了，明天要来看你，必须敷衍他一下，免得生疑。”第二天，黄杰果然来了，他一再劝我早些离开长沙，去广州或香港都可以。我点头答应，并告诉他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姓薛的朋友，已经为我在香港找好了住房。

约在四月底或五月初的一天黄昏，周茂僧来医院找我，说有一件事非我出院去办不可。他说：“党派来了三个人。领导人和译

电台住的地方有了，只有发报员和电台的安置地点未能解决。电台与上级联系是有一定期限的，如不能按期与上级联系上，就要失去作用。经他们考虑，决定要你出来负责掩护电台。今天我特地来同你商量，明天上午我来接你。”听了周茂僧突如其来谈话，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掩护电台不但责任重大而且风险很大。我对这种工作毫无经验。当晚，思前想后，不能入睡。我知道同志们不是一开始就要我出来掩护电台，而是在安置电台发生了困难，时间又很紧迫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我义不容辞地要出来挑起这副担子。第二天早饭后，我找到李心天和胡信德两位大夫，说明我有紧急事情需要办理，不能不停止治疗，立即出院。李心天大夫有些理解我的情况，没有多费口舌，他们就同意签字，让我去办出院手续。李心天是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之子。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李达接到毛主席邀请信去北京了。

我离开医院，随周茂僧乘一辆吉普车来到一个小巷口停下。走进小院里面，房子都是木板隔的，推开房门见到一个小伙子，大约二十多岁。周茂僧对他介绍说：“这是黄太太，以后你要和他在一起工作，你们以姐弟相称。”周茂僧又要我给他起个名字。我就给他起名叫郑明。也许是因为周茂僧过于紧张的缘故，他改变了一贯对我说话客客气气的态度，见我和郑明两人相对发愣，默默不语的场面，他就命令似地说：“这样可不行，你们以后姐弟之间要亲热些。”又对我说：“他年轻，环境又不熟悉，你要负一切责任。”说完就叫我们随他去。他边走边对郑明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电台联系上，下午把电台给你们送去。”我们上了吉普车，周茂僧走到司机面前，对他说：“到潘家坪去，你要在那里住几天，黄太太要用车，等他不用时，你再开回来。”说完后，他迳自走了。

我家住的是一座二层楼房，院子有高大的围墙。我们住在楼

上，楼下有两家邻居，对邻居是说北方战局紧张，弟弟到南方来上学。孩子们也亲热地叫舅舅，并在保长那里给郑明报了户口，保长也来我家看了一下。当天下午，周茂僧把电台送来了，夜里一点多钟，我和郑明在室内架起天线，楼下的两个邻居，一个姓高的，不知是那家的副官；一个是警备司令部的熊科长，他们睡得都很晚，半夜里还进进出出，这使我们心里很不安宁，不敢开窗把天线伸到外面去。约定呼叫的时间是深夜两点钟，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有叫通，我们非常着急。次日，我约郑明出外查看环境和地形，走到北门外文昌阁附近，见不远处空中有个天线网，郑明说是侦察台，他告诉我侦察台可以带在身上随电波找到发报人，并说我们的住处离这儿太近了，实在不安全，必须另找地方。我立即去找周茂僧，对他说明上述情况。但是，他说带来的经费几乎都用完了，转移地方有困难。我说：“你只管去找地方好了，费用由我和剑秋（黄雍的别号）想办法，我还有首饰可以变卖。”第二天下午，周茂僧来找我，决定电台转移到离此地六、七十里以外的桥头驿车站附近，隐蔽在周启铎家。这个人是周茂僧的本家，曾任国民党五十三师中将师长。他的家地处山区，比较偏僻，是个比较安全的处所。那里没有电，我们改用于电池。但是自从白崇禧的部队退到湖南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属于军用的物资，全部被控制起来，哪里也买不到电池。后来，我想到吉普车上的电瓶，就叫司机取下电瓶让郑明试试，果然能用。我便叫周茂僧设法找三个汽车上的电瓶，一个带走使用，一个留在城里充电，另一个往返运输，做为备用。三个电瓶轮流循环，电台的电源就不至中断。

在向乡下转移电台的前一天晚上，黄雍特地回潘家坪一趟，送来一百块银元，作为下乡人员的伙食费用。黄雍说这笔钱是从

李维城那里拿来的。李维城是湖南银行界有名望的人物，程潜此次回湖南主政，特地邀请他出任湖南省银行行长。李维城不仅在黄雍各次活动中给予支持，在秘密电台的顺利开展工作上也出了不少力。

我离开潘家坪下乡去的时候，周启铎家来了一位余副官带路。我乘一副两人抬的滑竿，厨师挑筐，筐里放着电台和锅碗等炊事用具，郑明持伞步行相随。那时，沿路都是大兵，抬滑竿的老乡碰上队伍来时，怕被军队抓伏，抬到半途放下滑竿躲了起来。我们一行四人只好在一个农家的茅舍中暂时停歇。白天走不了，只好晚上再走。余副官叫我们在农家等候。直到深夜十二点，他才带来两个轿夫和一个带路人。为了躲避过路的兵，我们一行冒着小雨摸黑专走山周小路。天快亮时来到一个山窝的院子里。这就是周启铎的家了。院子共有两进，里院有北屋三间，一明两暗。我住一间，郑明住在和我相通的套间屋里。

半夜，我和郑明把天线架在后面天井的一棵大树上。按照约定的时间与上级电台接通了，我们非常高兴。此后，每天晚上都按时联系一次。

余副官负责送电报，郑明收到的电报由他送到城里交给周茂僧，再转交译电员。城里也专门派了一个可靠的人，送来译成密码的电报交郑明发出。一个星期左右总会有一次电报往来。

由于那时过往的军队很多，为了防止突然闯到院内搜查，我觉得还是把人和电台分开来比较安全。这样，即或有人来搜查，只见人，查不到物证，也无所畏惧。我和周启铎商量，他说在后山窝里，他还有一间小屋，是专放木柴杂物之类的东西，那个地方不会引人注意，建议电台搬到那里，每晚由他家的老长工王师傅陪同郑明翻山去收发电报。

在与郑明相处的日子里，知道他是贫农出身，很小就参了军，这次到长沙是从大连取道香港辗转而来。电台则是那位领导同志化装为国民党上校军官乘飞机带来的，译电员是上海来的。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准备撤退到衡阳，长沙秩序很乱。这时，电台的电用完了，未见送来新电瓶。郑明非常着急，我决定亲自进城去看看情况。我装成重病号半卧在滑竿上，沿着铁路线走，恰巧遇到周茂僧。他身穿蓝布长衫，匆匆而来，很紧张地说：“城里到处抓人，你千万别去，快回去吧！”我说电台没电，非得进城去想办法不可。我当时对周茂僧偏偏在这个时候下乡，很不理解。

我回到潘家坪家里，发现住着两位客人。一位中年人，笑着对我说：“黄太太，你还认识我吗？”我定睛一看，他是周竹安。七、八年前，抗战时在重庆，他常来黄雍住的楼下周茂僧处，他是周的客人，我们见过面。黄雍那时还对我说过，他还想给周竹安搞个什么名义。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更想不到他会是党这次派来湖南的负责同志。另一位青年是译电员，我只记得他姓李，原来是住在李维城家里的，因为城里检查得太厉害，才搬到我这里来住。

为了安全，大家都分散居住，周茂僧是我们中间的联络人，有关电台方面的各种事情都是找他接头的，他现在回避下乡去了，电瓶的事只好等黄雍回来再办。

黄雍回家来时，我叫他赶快去搞电瓶，并要他下乡去看看，好让大家安心。电瓶搞到后，交人由水路乘小木船运走，正巧又碰上检查人员，电瓶放在船上，人不敢上船，只好让小船开走，电瓶又丢失了。再次搞到电瓶后，就改变方法，雇人背送下乡，黄雍也跟着到乡下去了。

湖南的和平解放运动，经各方面人士的努力和半年多时间的酝酿，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因为程潜当时孤守省府，承受广州方面的压力和白崇禧的威胁，大家担心他顶不住，可能离湘去港（他的家眷已于五月间送往香港）。黄雍和周竹安商定，要李维城向程潜说明我们的工作关系，使他和党中央直接对话，这就会更加坚定他起义的信念。黄雍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李维城，请他见机行事。

七月上旬的一天，程潜在省府大宴宾客，好像是要离开湖南，但又没有公开表示出来。饭后，李维城尾随程潜进入他的室内。李问：“你是否要走？”程潜回答说：“广州一再督促，白崇禧又咄咄逼人，实在难搞。”李说：“你要走，是不是先和黄雍见一面，听听他的意见。”程潜说：“黄雍是我的学生，平时和我见面谈话不多。”李随后透露黄雍与中共的关系，程即叫李维城约黄雍在当晚十时由省府后门来见他。当晚十时，黄雍冒雨应约前往省府大院。黄雍进屋后，见程潜在室内徘徊，忧心忡忡，焦虑不安。程潜叫黄雍坐定，良久不语。他走到窗前望着阴沉沉的雨天，叹息说：“真是亡国之天。”他又来回在室内踱着说：“我这样苦，毛润之又何尝知道。”黄雍趁机说：“颂公一举一动毛主席都知道。”程又说：“来接头的很多，真伪难辨。”黄说：“颂公有什么意思我可以代为转达毛主席。”程潜怔了一下，自己坐下后叫黄雍坐到他跟前来，说：“你有通讯工具吗？”黄说：“我没有，乡下有人有。”程潜很高兴，又问：“你见到陈明仁了吗？”黄答：“我们经常见面。”程随即起身给陈明仁打电话，听程说：“我已经和黄雍见了面，不走了。”接着程拟了一份电报交给黄雍。程潜送黄雍出门时，回头张望，低声说：“四面都是奸细，你要特别小心。”过了两三天，乡下余副官送来了回电。我那时虽然住在潘家坪，但党中央与程潜往来电报均由译电

员直接交给周竹安。我并不知道内容，只有最后一次中央来电，恰好我在周竹安房中谈话，译电员送来电报，周竹安顺便给我看了一下，记得内容是要程、陈将部队集中湘潭、邵阳一带待命，并说已分电四野，命程潜就近与四野联系。

在白崇禧未离开长沙的前一段时间里，长沙的空气特别阴沉，蒋介石从各方面施加压力，企图阻挠湖南和平解放。特务活动也非常嚣张。程潜被逼得曾想一走了之。唐生智退居故乡东安。素以胆大自称的唐生明，都不敢住在家里。李维城也搬了家。黄雍白天有时回潘家坪与周竹安碰碰头，晚上也不再住在上学宫街十号，不知他在什么地方过夜。周茂僧是躲到乡下去了。在上学宫街十号的调查处里只留下周荣看家。有一天晚上去了一辆小汽车，说是找黄雍，没有找到，就把周荣架走了。先是利诱，后又施刑，关押了三天三夜，弄得他昏迷不醒，又送回上学宫街。住了好几天医院，才恢复过来。

七月二十一日，程潜将省政府主席职务交给陈明仁后，就去邵阳了，白崇禧也于当天离开了长沙去衡阳。二十九日，李明灏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来到长沙和陈明仁、程潜（刚由邵阳秘密返长）见了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雍才回上学宫街十号来住。

八月一日，黄杰和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来到长沙，据说又带来了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还运来了一些枪枝弹药及银元。黄杰这次到长沙，虽然来去匆匆，但还是找到黄雍。黄杰气恼地责备黄雍，说他在长沙是胡闹，要他登报声明脱离调查处，赶快离开长沙。黄雍答应一定登报声明，并说三天后请他见报。

三天后，即八月四日，程潜和陈明仁领衔发出了起义的通电。

湖南和平解放后，我们这个秘密电台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郑明从乡下回到城里，等候命令返回原单位。这时我才知道

他的真实姓名。临分别时，他送我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照片至今保存。每当见到它时，就使我回想起那共同战斗的岁月。

此后，陈明仁知道黄雍在这一过程消耗很多，生活并不富裕，送了几百元给我们做为家用。程潜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黄雍在湖南和平解放中的贡献，并要黄雍去北平直接见周总理。但是黄雍考虑到自己不是当时湖南省府的在职人员，未去北平。后来，他按组织安排前往上海，旋又去香港执行任务。周竹安去北平，向吴克坚汇报了在长沙的这段工作。吴克坚给黄雍来了信。信中写道：“上海一别，瞬逾半年。昨晤竹安兄，盛称吾兄几月以来，奔走和平，甚具劳绩；贤夫人城乡照顾，力疾从公，钦佩莫名。颂公来平，已得晤面，并亦谈及吾兄。此次湖南解放，颂公固早有动机，但稳定其意志，促成其实现，我处在湘工作同人，实各费心力。读吾兄报告，得知其详，此间亦为嘉许。”这封信至今仍珍藏我处。黄雍于一九五四年冬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我们家庭团聚后，他告诉我，在开会期间，周总理特地找到他说：“黄雍，你头发都白了。你这次在湖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嘛！”黄雍在黄埔军校与周总理分别二十多年了，总理对他的工作给以赞许，使他深受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周竹安在外交部工作，曾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李维城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职；吴少岳应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罗合如（平江人，共产党员）之邀，来到北京工作；周茂楷任湖南省政府参事；黄雍任全国政协委员。现在这几位同志都已去世了，谨以这篇回忆录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北京

国民党三一四师积极准备起义 及被击溃的真相

祝 凯

（一）、三一四师的由来

国民党三一四师，师长是陈达，我与刘隽（共产党员）分任副师长，刘国龙任参谋长。迫于形势，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决定在湖南宁乡起义，不幸被白崇禧阴谋击溃了。当时国民党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它对瓦解蒋邦长江以南的军心上气，迎接渡江南下的大军，促使大西南国民党部队起义，有一定影响。可是当时社会上对于事件的真相，是欠了解的。

为了弄清事件的真相，首先谈谈这个师的由来。三一四师是一九四八年程潜回湘主政时成立的。当时程潜感到回湘主政，只有一些保安团队，没有一支基本部队，实力不大。适蒋介石以华北、东北、山东等地区的失败，主力迭遭摧毁，计划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组部队，程潜即以长沙绥靖公署名义向国民党国防部签请成立两军四师。即十四军、一〇二军两个军，辖陈达的三一四师，汤季楠的六十三师，康朴的二三二师，夏日长的六十二师。有的是原有部队拨编的，有的是杂牌部队凑成的，三一四师批准配发关械装备，隶一〇二军成刚部（成刚在湖南和平解放时叛逃）。

陈达过去在国防部第四厅任过处长，主管全国部队的补给业

务；后调第三厅任处长，主管过反共内战的作战业务。他凭着这些关系，设法弄到三一四师全部美械装备。陈达与李默庵关系好，李任湖南常德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为着抓枪杆子，也乐于维护陈达。程潜以这个师作为他的基本部队，任唐典（军校毕业，宁乡人）为九四〇团团团长，陈又平（陆大毕业，李默庵旧部）为九四一团团长，程杰（程潜的侄孙）为九四二团团团长；装备良好，人员不缺。白崇禧由武汉向湖南撤退前，就将我们这一师调到岳阳、临湘、湘阴地区，担负把守湘北大门的重任。一九四九年四月，白崇禧魔掌伸向长沙前，又将三一四师调到长沙与宁乡之间，作为近卫部队。在当时经费极困难的情况下，程潜一次就批发银元两万元作特别周转费（每团发给三千元，师及直属队发一千元，共发出一万元；所余一万元，陈达与我商量，拟一概购买黄金，以后需款，可随时变卖）。在装备上，程潜指令兵站分监刘柔远尽量优先补给。这些事实，说明程潜期望我们这一师作为他反蒋抗白的基本部队是殷切的。也就成为后来被白崇禧阴谋击溃的根源。

（二）、湖南整编和平解放运动中，我们的作法

陈达走马上任，就从整编师部的领导核心着手，设法调走副师长曹舜生，调走参谋长张明凯，以老友刘隽任副师长，以旧友刘国龙任参谋长。并由长沙绥靖公署军官队调来孙培桢、邓竹书、杨业钜、黄翔云等分任参谋、副官、军需、译电室主任，以随陈达在国防部三厅任秘书的贾忠勇任师部秘书。我于一九四八年年底在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取道武汉回长沙，承程潜委为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点验组长、三一四师副师长。我与陈达是拜把兄弟，在南京同住在游府新村，交往甚密；与刘隽在南京也频频来往。我们三人凑在一块，能推心置腹，同心同德。在刘

隼的影响下，我师决心起义，走向革命的目标是明确的。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分途负责活动。陈达集中精力，上下通气，并与从事和平运动的人士取联系，对师属团、营、连经常督训。经刘隼与解放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联系，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三一三〇第七总部齐一夫领导下，派罗觉元为军事组长，熊维汉为政治组长，驻我师领导起义（熊维汉化名程明，委为师部秘书），授我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第十二师番号，由刘隼联系，从事秘密活动。我到岳阳点验，刘隼同我说：“我们这个师来之不易，要爱护这个部队，决不能盲目投入战场，作无谓的牺牲。”在长沙出发点验时，程潜在省政府接见我说：“湖南元气大伤，再也不能打仗了。我在军政界几十年，这次一定要为湖南人民做点好事。你年富力强，任你为三一四师副师长，目下又要交给你点验部队的责任。你到岳阳等地点验部队，一定要把我的主张传达下去。”我到岳阳、湘阴、临湘点验本师各团时，向师内官兵反复强调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跟着程颂公走向和平。

（三）、陈明仁回湘，集结长沙应变

一九四九年三月，陈明仁在程潜的请求及白崇禧的授意下，回到了长沙。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下，长沙成为长江以南军事、政治角逐的中心。李默庵是长沙绥靖公署实际负军事责任的副主任，他表示跟程潜走，并保荐彭杰如任湖南全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他也不想搞一个兵团司令，与陈明仁有过争吵。黄杰也是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是蒋介石的忠实奴才，与在湘的李树森、蒋伏生、成刚这一伙是主战到底的。陈明仁回湘后，程潜采取了避免柱系锋芒，集结可靠基本部队的措施，以资应变。他于四月间将三一四师调到长沙，亲临校阅。陈达迫于事机，要我结束长沙绥署兼

职，回师部共同掌握部队。我回到师部后，由陈达开车，经常同他跑李默庵、陈明仁、刘嘉树、李昊、谢慕韩、彭杰如等处探听情况，也在他家收听新华社的广播。陈达对我说：“陈明仁要把长沙作战场，我们决不搭这个成。我们跟程颂公走，也要设法自救，也要设法与地下党挂钩”。

我师经程潜校阅后，以一小部分兵力留置长沙市区，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主力渡过湘江，分置于长沙河西及宁乡间。我们判断：白崇禧在长沙，我师主力驻在宁乡与长沙河西间，万一程潜遭到白崇禧的威逼，我师即可尽到维护程潜安全，渡过湘江，脱离长沙的责任。基于这种企图，我们放弃单独起义，拖上雪峰山的打算，下了不离开长沙的决心。程潜为使局外人识破我们的企图，对外以姜亚勋在宁乡倡乱为词，委陈达为长沙、湘潭、益阳、湘乡、宁乡五县的剿匪联防指挥，在岳麓山设指挥部。实际上，指挥部的办公设备等都是将长沙绥署的东西搬来布置的，以备程潜、唐生智、李觉等在白崇禧威逼时，自溁湾市渡江，临时驻节指挥之用。我们将罗觉元、熊维汉等迁到这一指挥部附近的一座煤洞里，密设电台，潜伏活动。陈达与刘隽等，都在这里与他们研究情况，策划尔后的军事行动。

陈达带我到陈明仁家，陈正在打麻将，幽闲自在。我们兴辞出门。陈达边走边说：“陈明仁的兵团司令部，也驻在望城坡附近，与我师相距不远。陈明仁只有匹夫之勇，是白崇禧扶植的，但他是程颂公的学生，醴陵小同乡，说跟程颂公走，靠不靠得住，是难断难言的。我们与他无隶属关系，同他往来，只是照例礼节，并不介意。如他倒在桂系怀里，不跟程颂公走的话，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由此可见，陈达眼睛向上，目中无人，是鄙视陈明仁的。陈达与成刚水火不容。成刚利用黄杰的编练司令职权，

撤销了三一四师番号，兵站断绝了对三一四师的补给。事为陈达所闻，为明究竟，乃派师部译电主任黄翔云设法打入绥署译电科，搞到国防部撤销三一四师番号的密电。黄翔云立即密电陈达、刘国龙。我们感到这个美械师要东调西调，将要土崩瓦解。果然，六月六日，陈明仁到师内训话，他说：“三一四师是程颂公成立的，颂公爱护这个部队，现拨归本兵团指挥。大家不要因为改编不安心，我以人格担保，不会调动你们的干部；在补给方面，一视同仁，望努力整训。”陈达听了，冷冰冰地送他走，内心对陈明仁是仇恨的。

（四）、被迫积极准备起义

一九四九年五月，白崇禧窜到了长沙，成为湖南的太上皇。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遭到打击，迫使唐生智、邓介松、肖作霖等纷纷逃避，长沙成为桂系的天下。此时，兼任长沙绥署副主任的唐星，极其活跃。兼任长沙警备司令的陈明仁，宛如白崇禧的闯将，也比较神气了，他凭白崇禧的关系与程潜的信赖，压倒了原来当权的李默庵。白崇禧到长沙后，大有压倒程潜之气势。陈明仁表面上唯白崇禧之命是从。这样一来，动摇了我师后台支柱。有一天，陈达对我说：“局势严重，我曾数度向程颂公建议，以我三一四师为基干，设法逮捕白崇禧，除此祸首，早日解放湖南。程颂公未下这个决心。”白崇禧知道我师是程潜的基本部队，要对程进行威逼，除调桂系部队入湖南，并对陈明仁加以控制外，就得从消灭三一四师下手。

六月八日，陈达急由长沙回到宁乡师部，对我说：“白崇禧、陈明仁、黄杰、成刚互相勾结，硬要消灭我师，由陈明仁出面，在长沙开军事会议，阴谋编散我师。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我出席

会议，不同意改编，就有被扣押勒令改编的危险。如果同意改编，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这个师，就瓦解了。”他接着说：“据密报，宋希濂的第二军陈克非部，已拨归陈明仁指挥，正取道常、澧经益阳向长沙开拔。其先头部队第九师已逼近宁乡，似为执行白崇禧包围我师的阴谋，应急谋对策。”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觉得事已至此，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因此陈达对我说：“请你效法深入虎穴的作法，到长沙开会，以明究竟，借以拖延时间，掩护我师兵力集结。”我于当晚专车赶到长沙织机巷，一进场，就见到很多军、师长都到会了。陈明仁说明开会的目的，大意是：根据白长官指示，整编部队，各军师都要充实人员装备，加强战斗力，以便与共军作战……。他当场宣布原辖的二十九军、七十一军、一百军等部一部分人事调动后，随即宣布撤销三一四师番号，各团编入其他各师。陈达调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参谋长刘国龙调任八十八师副师长，我与刘隽调另外的师任副师长，程杰调一九七师任副师长兼团长。所遗长沙、宁乡防务，交一九七师曾京接替。三一四师进据长沙河西岳麓地区集结改编。会后又单独找我说了这一情况，并问陈达为何未来？我以准备好了的谎言应付说：“宁乡姜亚勋匪部猖狂，防务吃紧，需要他亲自在师内主持。”陈明仁嘱我明早赶回宁乡师部，要陈达来长沙面谈。深夜散会后我想到要把改编我师的消息火速通知陈达，可是电话又不通，急得我通宵未眠。第二天拂晓，我不顾疲劳，就乘车向宁乡出发，看到一九七师曾京部曾祥斌团，正自长沙向宁乡开拔，似有与第二军陈克非部第九师向宁乡，从东西两方夹击我师之势。车行经白若铺不远的地方，遇到我师一些队伍，在一村舍内见到了陈达。我将昨晚在长沙参加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已接到了陈明仁的电话，他提到我师要改编的话。话未说完，我就挂了筒。我们辛

辛辛苦苦搞成的一个美械师，东调一团，西调一团，搞得乱七八糟。经过研究，为了部队的安全，我师应配合解放军进军，与长沙和平解放同时行动，不应提早行动，陷于孤立。但为当前情况所迫，避免部队被消灭，乃率师直属部队及唐典团冲出重围，会合白若铺程杰团第三营，以战备的姿态，脱离了宁乡以东以西向我师的包围，安全到达现地。”听到陈达这番话，我又惊又喜。情况恶化到这个地步，觉得我师是配合解放军行动的时候了。当与罗觉元、熊维汉商定，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十二师番号，陈达为师长，刘隽任副师长兼政治委员，罗觉元、陈朋分任政治委员。并向师内官兵提出“打倒白崇禧，保卫程主任”的口号。这时，我们焦急的是兵力分散，师部及直属部队，唐典团驻在宁乡，程杰团有两营驻长沙西岸望城坡，其第三营驻白若铺，陈又平团有两营驻岳麓山，另一营驻长沙市区任警戒，被湘江险阻，全师纵长相距达一百二十里。这种状态，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对于作战是不利的。只要兵力集结了，单是陈明仁在长沙的部队，是不足畏惧的。如果采取与陈明仁会谈的方式，以争取时间，掩护兵力集结的措施实现，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当时讨论了两种会谈的方式，一是由陈达选率精壮部队，挺进岳麓山，约陈明仁过江面谈，晓以大义。如果他硬要执行白崇禧消灭我师的阴谋，岳麓山是我师的防区，陈达即可就近指挥所部，占领岳麓山阵地，凭险固守，使脱离宁乡到白若铺的唐典团急向岳麓山增援。二是由陈达率领部队，我再往长沙向陈明仁复命，佯称我师正遵命开赴长沙集结改编。大家研究结果，认为第一个办法，可能发生破裂，得不到兵力集结的时间，就没有尔后行动的自由了。当时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并具体部署：

一、陈达负责掌握部队，清除师内不可靠的分子，监视与处

理一批与陈明仁有过关系的干部，严加戒备。

二、我到长沙向陈明仁报告，部队正向长沙开拔，希望派二十九军参谋长刘云楷（陈达陆大同期同学）与陈达见面。

三、我向李默庵报告我们的决心与行动。

四、我到长沙找谢慕韩转报程潜，我师绝对服从他的命令，保卫他的安全。

五、由我负责处理岳麓山指挥部所存一万元银元，命军需装入子弹箱，并将库存枪械弹药及被服装具，车运宁乡白若铺师部。仓存军粮，命军需发给市内家属。所余库存无法车运的枪械、弹药、装具，一概发给所联系编组的突击大队。

六、请刘隽在我到长沙会谈的掩护下，趁机密往长沙，指挥陈又平团，及分散在市内担任警戒的一个营，向陈靠拢，并向长沙中共地下组织接头。

我们根据以上部署，分途执行任务，我赶到长沙。当时湘江洪水暴涨，大西门沿河一带，已被洪水淹没，沿河地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刘隽乘我与陈明仁会谈的机会，指挥陈又平团在市内担任警戒的一个营，很快自灵官渡、猴子石间，冒雨脱离监视，抢渡湘江。我按照陈达的嘱咐首先到二十九军军部会见了陈明仁，向他报告，我师是遵令自宁乡向长沙开拔的，请派刘云楷与陈达见面。其次我到谢慕韩家，请他将我师向长沙开拔的情况转报程潜放心。随后又到织机巷李默庵家，在客厅内等候了片刻，李出来接见我。我说：“默公，我是从宁乡师部来的，我师快行动了……。”李说：“陈达、刘隽好吗？要陈达小心一点，不要轻举妄动。倘发生意外，向岳麓山靠有危险时，索性全师向湘西转移……。”得到李默庵的指示，我正当回师部复命时，陈明仁得到了我师从市区撤走部队的消息，就找到我，质问从市区撤走部队渡

过湘江的情况。我在陈的威吓下，只得诿称我师渡过湘江的部队，是遵照他的命令，集结全师，正向长沙岳麓山开拔的行动。陈明仁听到后，要我陪同兵团参谋长渡江到现场察看。正午，我到省政府谒见程潜，向他报告：“我师正遵命自宁乡向长沙开拔，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是绝对拥护颂公的。请颂公在危急时立即到我们部队去。”程潜听了频频点头微笑，要我转告陈达：“要小心谨慎。考虑要周详，不要过早地举起起义的旗号，只要提出湖南人团结起来，反对白崇禧就行了。”我向程潜辞别，急回师部报告此行全部情况。

（五）、被白崇禧的阴谋击溃了

陈达要约会二十九军参谋长刘云楷与他见面，原想借此拖延时间，并请刘转达陈明仁不要编散我师的要求。我陪同刘云楷坐吉普车到白若铺约会地点，两次都未会到陈达。第一次是我只身深夜翻山越岭，到河西与宁乡交界的龙洞，在师部会到陈达，他说：“这次偏劳你了，”我说：“你要约见参谋长刘云楷，他已与我同车到了白若铺，等你会谈。”陈达说：“你在完成任务的时刻，掩护全师的集结。我忙于在此间搞作战的准备，刘参谋长我不能如约会他。”并邀我走出师部大门，指点着四周巍峨的大山说：“你看这一地区，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距长沙市区只有一日行程。我这几天率部爬遍了这里的一些大山，搞战斗演习，地形都熟悉了。为严加戒备，部队都驻在山上。险要的地方都筑起了工事，随时可以进入阵地。榴重炮弹也趁夜很快都运到龙洞了。我决心不走了，任何部队来攻，都是不怕的。解放军快来了，白崇禧的部队，后有追兵，是不敢在长沙停留的；宁乡方面的姜亚勋部，已取得联系。”我听了，内心是喜悦的。我留师部共同行动。不久陈达又嘱

我第二次到长沙约刘云楷到白若铺见面。我到长沙二十九军军部约了刘云楷到白若铺后，又未见陈达如约前来。我与刘云楷返回长沙，几个无线电台几天都未与我师取得联系，陈达又未派人与我接头，心情至为焦急。我凭着人地很熟的优越条件，总是东逃西躲，昼伏夜出。长沙绥署高级参谋李昊，是李默庵的堂叔，也是陈达陆大的同学，与我也有友谊。李与程潜陈明仁是可以公开碰头的。陈达要我与他联系，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些情况。过了两天，我到李昊家，李急忙对我说：“陈司令表示，你们这一个师不改编了，不过番号既经明令撤销，由颂公委以湖南保安师的名义，师内组织人事不变，可即日开到岳麓山驻防。”我与李昊、刘云楷、绥署政工处长谢一中，带着程潜的命令及程潜、陈明仁、李默庵三人致陈达的亲笔信往宁乡。陈达在龙洞师部接见我们，说：“你们来得及时，辛苦你们了。陈明仁的部队不来打，只有不编散我师，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只要陈明仁不来打，我不行动；被迫行动，我决不单独打出起义旗号，只提出‘反对桂系，打倒白崇禧’的口号，总不使程颂公、陈明仁处境困难。我这一晌忙于视察阵地，跑遍了这里的大小山头，部队靠山头集结，布置各部坚守险要的地点。”我们都听得入了神。李昊提醒他说：“你不要大意了。如果发生问题，可向长沙岳麓山靠。”说实在的，我刚到山区，看到山头遍布部队，沿途都有盘查，严阵以待的备战姿态，至以为喜。但改为湖南保安师的名称，我们都是不愿意的。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对各省的保安团队，向来是瞧不起的。中共驻师部领导起义的同志讲：“解放大军分东西两路向湖南进军，沿粤汉铁路进军的先头部队，也进入岳州地境；我师已有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十二师番号，借用保安师名义，只是权宜一时。”我们觉得程潜决心接受中共领导，搞湖南和平解放，我师遵照程潜的命令，

就可以随同程潜起义；程潜危急时，也可以直接指挥使用。只要占领岳麓山要隘，又有湘江一水之隔，是有险可凭的。不管陈明仁听不听程潜的话，单凭他这么一点兵力，是不怕的。

第二天，陈达又嘱我与李昊、刘云楷、谢一中回长沙复命。并嘱我在岳麓山选择险要，布置阵地。出师部大门临别时，我对陈达说：“要告诫所有部队，在阵地上加强警戒，注意侦察敌情。”陈达说：“老兄，辛苦你了。我在这里会注意这一点的，你用不着担心。我们生死与共，万一发生不幸，你在长沙不走，我会派员到长沙找你回师部，共同大干的。”他要我只管长沙方面的事，不要担心。我与李昊、谢一中、刘云楷就离开龙洞师部回长沙，渡过洪水猛涨的湘江，相约第二天同到一兵团部向陈明仁复命。不期途中就听到飞机轰炸声，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与我师前途命运相关的大祸来了，内心不安，就去见陈明仁。陈明仁没有等我们开口，就大发脾气，说：“陈达抗命，要他开回岳麓山，他硬是不听。现在白长官派兵打他了……”我说：“陈达遵照程颂公与司令官命令，开回岳麓山，我是来复命的……。”陈说：“现在迟了，你们全师都拖累了我。我与程颂公都很生气……。”我暗想，所谓不改编，原来是一个大阴谋。早知如此挨打，全师拖上雪峰山就好了。李默庵向我指示过，如果情况危急，可向湘西转移。现在打起来了。陈达会想到照办的。想到这里，我就到省政府谒见程潜，报告我师向岳麓山开拔的情况。程潜说：“你来向我报告这一情况，很好！陈达个性倔强，只知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现在白崇禧派兵打他了，可恨！可恨！使他受一点教训也好。”我认为有必要向有关人员说清楚，就到李默庵家，李与夫人顾秀灵正在清点到香港去的行装，陈明仁也坐在他家送行。我把情况向他说了。李未作具体指示，只是深感惋惜。陈明仁说：“祝副师长，白长官是不容

陈达抗命的。现在事已至此，我爱莫能助，是无法挽救的了……。”说毕，他与李默庵同乘汽车走了。在这紧急时刻，我脱离了部队，失去了联系，主观认为陈达、刘隽、刘国龙、唐典、陈又平他们对龙洞附近的山地是熟悉的，且早有作战准备，总会带着一部分军队，在山区继续作战的。我冒险到山区去，在火线上，找不到部队，是危险的。我躲在长沙，昼伏夜出，不敢公开露面，内心苦闷焦急，只好向逃回的官兵了解情况，并派人到龙洞一带去了解。获悉十八日师部令各团派前站人员到岳麓山设营；十九日九四一团向营附送行李、眷属等，先到学士桥、莲花桥至岳麓山之间。延到第三天，我师从龙洞地区阵地撤收部队，分两纵队向岳麓山前进。白崇禧调转向衡阳方面开拔的桂系军队，出其不意，绕道湘潭方面向我师的翼侧，乘分两纵队行军之际，集中十三个团，一个炮兵团，用五倍以上的兵力向我包围突击；同时用飞机散发传单，悬赏五万元缉拿陈达。我师首尾应战之际，有线电通讯撤收了，无线电也不能收发报了，外面编组及联系的部队无法应援，迫使我师在四面包围之中仓促应战，展开部队登山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击溃桂系军两个团，死伤八百余人。终以敌兵力悬殊，乃各自突围，除一部分牺牲于阵地外，唐典团突围的部队就加入了姜亚勋部，继续为解放事业奋斗。

（六）、尾 声

三一四师决定起义经过，陈达及当时的参与者都有报告，当时解放湖南的当权者也向上级写了报告，有案可查。解放后，党落实起义政策，师长陈达、政治委员罗觉元，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副师长刘隽，由肖劲光司令员调到北京海军司令部工作。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师级高参（一九五

三年转业到武汉市，现任武汉市参事室参事)。参谋长刘国龙派往武汉钢铁公司供销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大家都能为革命而努力。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武汉市参事室

附：刘隽同志来信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各位同志：

六月二十三日信及附祝凯同志文稿，八月二十三日始由海政转来；你室第一次寄复兴门村一五六号是会城门村之误，所以曾被退回，七月二十二日再寄海司，才得转到。

关于三一四师起义问题，事过三十五年，已成历史陈迹。过去由于对湖南和平起义影响关系，这一关系全师万余指战员的光荣牺牲业迹，从未向外作过报道；有之，也只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湖南《国民日报》记载的几天对三一四师在长沙河西所谓“叛变”的报道。真实的史实一直是有记录的，那就是八月湖南解放后，湖南军区、十二兵团通令驻湘全军包括起义部队对湖南和平解放与三一四师起义问题进行过一星期的讨论，并有记录。陈达和我们几个当事人，个人向党交待历史的档案中也都有自己的回忆录。现在这篇祝凯同志的文稿，正是一篇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基本上符合事实（就祝当时在长沙担任的任务而言）。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发生的那些人和事，虽然我不在场，后来证实确有其事。我无可非议。

承问我解放后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起义后，我参加十二兵团工作，后随肖劲光司令员调北京海军司令部，任海军研究委员会

委员。现为海军离休干部。住北京复兴门外会城门村一五六号。

专复。顺致

敬礼！

刘 隽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日于北京



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

沈 醉

一九四九年初，我在上海。有天与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一起吃饭时，他告诉我，接到军统湖南站站长夏松的报告，说唐生明在长沙搞局部和平的活动。他有点不大相信，问我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没有。因为他知道我和唐的关系很深，过去一直有联系。我当时回答说：“这不大可能。唐生明这种公子哥儿出身的人，一向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怎么会跟共产党去工作？同时，我从许多湖南同乡口中，也没有听说过他在长沙搞什么反蒋活动。”毛人凤听了便没有再作声，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从他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

不久，军统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的局长周伟龙，突然被毛人凤下令在上海逮捕了。我便去上海蒲石路毛人凤家中打听。周伟龙和我是十多年的老同事，抗战开始时，他任军统上海特区区长，我任特区的组长；后来他在重庆任别动军司令，我任军统局总务处长，更是经常往来。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被捕的。

那天毛人凤家中客人很多，我不便当着客人面问周伟龙的事，想晚上再去。他老婆向影心看到我准备走，便把我邀到他们打牌的一间小会客室，要我在那里等，吃了午饭再走，她说这些客人不会在她家吃午饭的。我便坐在那里看画报。一会儿，客人果然都

走了，毛人凤走了进来。他急着要我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特等一同商量，如何把留在上海不肯去台湾和国外的资本家存的黄金、美钞等弄清楚，必要时来一次大抢劫的问题。并告，他已约好黄加特来他家吃饭。话还没说完，黄加特便来了。向影心邀我们进餐厅，要我们边吃边谈。我趁没有进餐厅前问了毛人凤一句：“听说周道三（周伟龙的别号）被捕了，出了什么事？”他一听就很生气地说：“真没有想到，他会背叛我们！”我一看他那不高兴的样子，便不愿再问下去，他也没有继续说，我们都默默地走向餐厅。在快要进去时，他停住了，要我和黄加特先进去，他一会就来，估计他可能是去洗手间，因他和客人谈了不少时间未起过身。我和黄加特的交情更深，趁此机会问起周被捕的事。他告诉我：周的野心很大，把他统率的交通警察总队调了好几个去湖南，最近又准备把派驻在浙江奉化附近保护蒋介石的三个总队也抽调去湖南，被蒋发觉，命令毛人凤查究。所以，毛将周扣押起来，从周处抄出不少信件，涉及了许多人。证实周确有反叛企图……。我们刚谈到这里，毛人凤进来了，他要我们边吃饭边谈如何作好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一次大抢劫的调查、准备工作。我便没有再问周伟龙的事。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毛人凤到昆明，住在我家一个多月。当时除了每天研究如何镇压云南人民的民主运动和怎样保住云南作为国民党在大陆的重要反共基地外，闲时便检查过去许多阴谋未能得逞的原因。有天他笑我曾说过唐生明这种人不会跟共产党走，看问题太简单。他说周伟龙把交警部队不断地调往湖南，准备投共，抄出的信件中，居然也有唐生明亲笔写给他的信，劝他要识时务。不过毛人凤自己也承认，当初的确没有想到唐生明，所以也没有注意他（湖南和平解放时，唐生明是参加和平谈判的湖

南代表之一)。

不久，毛人凤把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许多特务派到昆明，要我安排他们的工作。有天，一个主管人事的科长问我，有几个曾在长沙暗杀了湖南和平解放后的省会警察局长刘人爵的行动人员，要不要接见他们一下？我答应见见他们。记得其中有焦玉印、孙坤等四、五人。他们向我报告，毛人凤派他们去长沙，是准备暗杀程潜和随程起义的张严佛、程星龄、唐生明、刘人爵、刘人奎等人；不能全部暗杀掉，至少得杀掉一、两个。他们原来认为杀唐生明比较容易，曾守候在衣铺街唐的住所处附近。有天在唐出门时，慌慌忙忙向唐打了一枪，因太慌张，没有打中，唐跑回去了。

焦玉印因与刘人爵认识，便和孙坤一道去浏正街二十二号刘的家中，假称没有工作，请刘把他们安置到警察局去。刘接见他们时，焦玉印趁刘不注意，拔枪向刘射击。开枪后也不知道打在什么地方，他们便匆匆逃出长沙，到重庆军统办事处报到。后来查明，刘人爵被他们打死了，毛人凤即令重庆办事处发给他们一笔奖金，并派去云南工作。我见过他们后，又给他们每人提升一级。不久，云南和平解放，这几个凶手都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记益阳“双十惨案”

蔡杞材

一九四七年益阳“双十惨案”，是我亲历其境，一手处理的。由于风潮平息较快，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近来看了中共益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的《党史选编》第三期张合盛同志所写《解放前夕益阳的学生运动》一文，方知这次事件，是当时革命斗争重要的一环，是革命青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我作为瓦解这一运动的要角，促使我重视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

当一九四七年国民党统治处于四面楚歌，土崩瓦解的前夕，益阳国民党当局为粉饰太平，掩盖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临危局面，于国庆节（十月十日）举行全市运动会。在运动会的一场球赛中，益阳团管区司令部的球队与商业职业学校球队比赛篮球（或足球），团管区球队打输了。不意团管区的老粗们大发输火，与商职学生冲突起来，竟至动武殴打学生，从而激起在场各校学生和观众的义愤，给予这些蛮不讲理的老粗们有力的还击。团管区司令部官兵恼羞成怒，竟调动大批武装士兵，赶到运动场，见学生就打。学生赤手空拳，敌不过武装士兵，纷纷四散逃跑。团管区官兵不但适可而止，反而到处追赶学生，鸣枪示威，不分青红皂白，在街上只要看到学生模样的人就打，弄得居民闭户，店铺关门，谣言四起，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怒。由于学生被追挨打到处

躲藏，吓得不敢回家，于是有人谣传说，有许多学生被团管区武装官兵打死，尸体丢到河里去了。这样一来，大街小巷议论纷纷，父母寻找子女者有之，祖父母寻找孙儿女者有之，喊儿叫孙，哭声骂声，到处皆是。市民为了支援学生，声称要罢市；学生为了支援同学，声称要罢课。消息传开，有的学校酝酿罢课游行示威，全城气氛相当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那天，我乘休假的机会，由长沙回到益阳，下乡省视年过古稀的老父，就便部署一下竞选国大代表的事宜。当晚九时左右，我由县政府出来，路经西门正街时，只见人声鼎沸，人群拥挤。有的大声咒骂，有的摩拳擦掌，有的喊“冲到团管区去！”（团管区司令部驻东门正街）；有的说“现在堡上（指头堡、二堡一带）团管区官兵还在到处打学生、抓学生”，并异口同声地说：“刚才我们亲眼看到有许多学生，被团管区押解到司令部去了……，我们大家同到团管区去要人。”我是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听到团管区闹出乱子，不能不过问，乃走近群众对大家说：“我是蔡杞材，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我一定负责处理。我是益阳人，决不丢益阳人的脸，一定要对得起益阳的父老。大家现在不要冲进团管区去，我马上处理这件事。被捕的学生，保证立即放出来；失踪的学生一定寻找下落；打人凶手一定从严从重惩办。如果大家认为我处理不当，或讲话不算数，再冲进团管区还不迟。”我当天抵达益阳后，知道团管区司令胡继瑗随常益师管区司令王声溢到湘乡为宋希濂的父亲（或母亲）祝寿去了（胡、王都是宋希濂旧部），不知团管区由谁负责，乃到专员公署向团管区打电话，问有谁在家负责。团管区副司令×××（茶陵人）接电话，我问他：“你们是不是抓了学生关押在团管区司令部门？”他说：“是的。”我问：“抓了多少？”他答：“有七、八个学生押在这里，请示参座怎么办？”我

生气地训斥他：“你们胡闹！你们乱打乱抓学生，不要脑袋吗！赶快把关押的学生送到专员公署来交给我，现在街上老百姓群情激愤，大家要冲进团管区问你们要人。群众还没有完全散，你赶快亲自把学生从后门带出来，经后街由专署后门送到我这里来，我在专署等你。”团管区副司令立即亲自把关押的学生送到专署来了，他战战兢兢立正向我认错，请示如何是好。我痛骂了他一顿，命他把学生带给我亲自点验，看是否有受重伤的。我逐个问了学生的身体情况，并好言安慰了他们。唯恐学生有的被打伤，我命副司令立即亲自将所带来的学生一律送到县医院检验医治，并责令非完全治好不许出院。同时问明，团管区带队参加运动会和球赛的是少校副官汪某（四川人），指挥官兵与学生打架的也是汪某。我唯恐汪某畏罪潜逃，当即以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王东原的名义，下一手令交专员李支和团管区副司令立即扣押。本来，参谋长只能依法对兼司令代拆代行，而不能以参谋长的名义对外行文或发号施令。我的上述作法，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正值蒋政权风雨飘摇之际，采取这种紧急措施，我想王东原一定会谅解的。唯恐官官相护，把汪副官放走，我当面警告团管区副司令：“对汪副官要严加看管，如果他逃走了，当心你的脑袋！”

当时正值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学生到处游行示威，我感到益阳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与李支商量，请专署出面约集全县党、团、政、教育、警察以及公法团体等负责人开会，一方面认真调查学生有无死亡和重伤情况，另方面商讨如何平息谣言，安抚被捕、受伤学生及其家属，做到安定人心，以免事态扩大，影响政局。李支随即以专员兼保安区司令名义张贴安民告示，说什么

“……军管区司令部蔡参谋长现已回县，本案应听候蔡参谋长依法解决”。我把善后事宜交给李支会同团管区司令妥为处理，李支却把球踢过来，公开贴出布告说由我“依法解决”。我认为兹事体大，连回家看望老父亲的计划也打消了，乃于十一日赶回长沙，直奔麻园岭王东原公馆，汇报益阳事态发生情况，以及我在益阳权宜处理经过，请他即打电话给李支，要他切实负起责任，把善后工作做好。王东原听了我的汇报后深表满意，硬要留我用了中餐才走。我感到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后不会再有我的事了。在王东原家午餐和谈话，听完他与李支通过电话以后，已经是下午两点钟左右，我回到家里就上床休息，连晚饭也没吃。当晚九时左右，王东原来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他说：“刚才李支来电话，说益阳情况很严重，学生鼓噪得很厉害。今天有的学校未上课，要罢课闹事，李支说非请你回益阳去不可，否则不能解决问题，希望你明天一早就去。”我说：“打人凶手已经关押，被捕学生已经开释，大的问题，我在益阳已经处理好了，何必要我再去呢？团管区昨天已去了急电到湘乡，胡继瑗今天一定可以赶回益阳。有了李支和胡司令在益阳会商应付，我相信事情是不会扩大的。”王说：“还是再辛苦你一趟吧……。”我推脱不掉，只好答应明天早起就去益阳。十二日，我抵达益阳时，擅离职守的胡继瑗已于前一天由湘乡回到了益阳。他见了我摆着一幅装死面孔，当面请求给予应得处分。李支是文人，胆小怕事，见了我如释重负，说：“参座来了，什么都好办了。一切请参座作主……。”我把省立五师校长杨朴庵、商职校长王希烈、龙师校长胡文(?)，信义中学校校长陈开源、县立一中校长谭得雄(?)、豫章中学校校长李维新等请到专署来，和专员、团管区正副司令一道开会。会上，除慰问要求各校长负责维持各校的日常教学，并不让学生外出，以免发

生游行示威等风潮外，同时商讨如何安定人心，做好对学生的安慰工作，等等。并决定：①由我代表省政府主席兼军管区司令，会同李专员和胡司令一同到医院慰问住院的被捕学生，每人分送慰问品，并由胡司令向学生公开道歉；②由我代表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到每一个中学讲一次话，对学生表示慰问，并负责严惩打人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③给团管区正副司令以应得的处分；④由团管区派专人照料住院学生的饮食起居，并从优供应其伙食；⑤宴请一次新闻界，以缓和舆论；⑥所需医药等一切费用，概由军管区司令部和团管区司令部负责，不用地方一分钱；⑦打人凶手由军管区司令部派军法官来益阳，公开组织军法会审，从严判处。

十二日下午，我和李支及胡继瑗同到医院看望了住院学生，分送了慰问品，并由胡继瑗公开向住院学生陪礼道歉。我也讲了一些安慰学生的话，希望他们安心养伤，任何要求和意见，可以随时向我当面或用书面提出，该办的我一定照办。”十月十三日，我在杨朴庵的陪同下，驱车到了县城附近资江南北两岸所有的中等学校，拜望了各校的负责人和一些知名老师，代表王东原对全体师生表示慰问和勉励，结果总算平安度过，没有继续发生罢课和骚动等事故，内心颇感宽慰。

益阳“双十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长沙各大中学校，旅省益阳学生曾发出声援益阳同学的呼声，并倡议组织“益阳旅省学生后援会”，以支持在惨案中被打的同学。我在益阳逗留两三天后回到长沙，即对报界发表话谈，说益阳的双十惨案已经省当局妥善处理，所有学校都在照常上课。学生被殴受伤之说，不如外界所传之甚。打人凶手已被扣押法办，等等。随后，我又以益阳旅省同乡会理事长名义，设宴招待在长沙各大中学校读书的益阳学

生代表。席间，向大家说明益阳“双十惨案”的实际情况和我处理此案的经过，希望同学们不要轻信谣言。学生代表们没有表示异议。在省益阳学生也没采取什么行动了。

学生罢课风潮暂时平定之后，我再次去见王东原，将第二次去益阳以及回到长沙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与当前省、县学生的情绪等作了汇报，并提出省军管区司令部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他一一答应照办。当即决定：①益阳团管区司令胡继瑗擅离职守，着记大过一次，并报请国防部另调职务；副司令谭××管教无方，着记大过一次，另候任用。②派军法主任徐宗陵、军法官沈亚钦率领书记官等前往益阳就地审判打人凶手。徐等去益阳审讯结果：判处汪××有期徒刑××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年。轰动一时的益阳“双十惨案”，从此告一段落。

如上所述，我在处理益阳“双十惨案”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表面上看，是站在益阳人民一边，为桑梓尽了应尽的责任，对益阳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但今天反省起来，由于我的出谋划策与所作所为，实质上起了瓦解益阳学生运动的严重后果。

一九八四年元月

(湖南省参事室供稿)

林修梅生平事迹

阮观荣 凌晋良 黎兴中

林修梅，字浴凡，号祖堃。一八八〇年三月一日（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一）生于湖南安福县西乡乐二里容止区凉水井（今临澧县修梅公社高桥大队）。他的曾祖父林长槐、祖父林子绶，均任过知县。父亲林承祚，不乐功名，教学乡里。林修梅从小爱劳动，喜读书，好打抱不平。由于受进步思想影响，他对封建专制、封建迷信深感不满，曾同堂弟林伯渠带领一群青少年捣毁县城城隍庙和水府庙里的神像，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欺压人民。一九〇一年二十一岁时，他参加州试，“中第一人，补博士弟子员”^①（即第一名文秀才）。但他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毅然放弃科考，选择了练武救国之路。

一九〇三年春，林修梅考入湖南武备学堂，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在学堂的两年期间，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坚持不懈。一九〇五年夏毕业后，先后在湖南新军炮兵营、湖南陆军速成学堂供职。

一九〇六年，林修梅以公费生的资格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尤其是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人，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就在这一年，他加入同盟会，

① 见临澧《林公修梅先生行状》。

积极投身反清救国的斗争。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林修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随即回国，被派往四川新军供职。这时，西藏问题逐渐严重，英国侵略者多方笼络达赖喇嘛十三世，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当局与清政府的关系。清廷鉴于西藏地当要冲，英俄环伺，乃派汉员训练藏兵，令四川新军入藏分驻要塞，巩固国防。

一九〇九年三月间，川督赵尔巽根据清廷旨意，派钟颖为协统，率四川陆军两千余人，组成一混成协进藏。林修梅被编入陈庆标，任第三营管带。陈渠珍任该营的督队官。当年八月六日由成都拔队西进，经四川雅州、泸定桥，九月二十二日由打箭炉出关，再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冈拖，一路跋山越岭，历尽艰辛，行军五十多天抵达昌都。

达赖喇嘛十三世，在英帝国主义的离间唆使下，竟派藏兵争夺西康等地。在离昌都不远的恩达，驻有近万名藏兵，阻止川军入藏。边务大臣赵尔丰（赵尔巽之弟）即命川军暂时集中昌都。陈渠珍携带通事张应明轻装去恩达方向侦察，在纳贡塘（腊左）为藏兵所俘。不久虽被释归，但赵尔丰借此大发脾气，以“贪功冒险，损威辱师”之罪，手谕撤销林修梅的管带职务，让陈渠珍取代^①，达到其排斥异己，安插亲信的目的。林以大局为重，仍尽力边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深感“劳师糜饷，不是根本办法，乃著《西藏游记》及《治藏策》，上书当道，”又被所拒，遂辞队经印度、缅甸、南海而归。

一九一一年九月，林修梅奉调参预保定秋操。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他随从党人焦达峰返湘起义，在都督府参谋部任事。政府

^① 陈渠珍：《芜野尘梦》，重庆人民出版社1983年重版。

初创，当时的军事计划及军制，多出其手^①。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一九一三年夏，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发动了反袁的“二次革命”。湖南于七月宣布反袁独立，林修梅任湖南守备队第三区第六营营长，先驻岳州，后移临湘，“身当前敌”^②。八月，反复摇摆的谭延闿取消独立。十月初，袁世凯任命汤芑铭为湖南查办使，林修梅受到点名通缉，两次悬赏缉拿，被迫逃避大庸、慈利及湖北鹤峰一带，不久逃往日本东京，入政法学校学习。他寄宿郊外，生活极为艰难，常以红薯充饥，自炊年余，从不叫苦。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成立中华革命党，林修梅和湘西同乡会的会友集体加入，并成立湘支部，覃振为支部长，林为湘支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林留日期间，译有《欧洲财政经济》等书。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伪造民意，准备称帝。同年十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十二月，唐继尧、蔡锷等宣布反袁独立，并出兵四川、贵州，护国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三日，林修梅随同程潜等十二人由日本回国，经香港、海防、开远，于二十七日抵达昆明。为了配合四川的正面进攻，唐继尧派程潜为湖南招抚使，拨给卫队一营，回湖南召集旧部，组织护国军，从侧翼牵制敌人。程潜请委派陈惟诚为副使，林修梅为参谋长。二月一日晚，唐继尧在五华山都督府为程潜、林修梅等饯行。二月三日，林修梅随同程潜等离开昆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贵阳，与贵州都督刘显世共商招抚计划。二月二十七日离开贵阳，三月十一

① 程潜：《林公修梅先生行状》。

② 《汤芑铭三次电请通缉各犯罪状报告书》。

日由镇远起行，数日后到达晃县，同护国军东路司令王文华会见。四月五日一举攻克靖县。

这时，护国运动在三湘四水兴起，驱逐汤芑铭的斗争正在酝酿。林修梅协助程潜迅速扩大队伍，训练军旅，不到两月，收编湘西新旧部队三个旅。四月二十六日，在靖县召开有四十八县代表参加的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任参谋长。林修梅在组建这支部队中发挥了他的军事才干。

一九一六年六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护国反袁的怒潮中疾愤而死，湖南各界民众驱逐汤芑铭的斗争达到高潮。七月一日，程潜、林修梅率一个旅的兵力由宁乡进逼长沙，与汤芑铭派来阻击的两营部队战于道林，大获全胜。汤军两营倒戈，归顺护国军。七月四日，汤芑铭仓皇逃遁，大局初定。八月四日，段祺瑞任命八面玲珑的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以图缓和矛盾。谭延闿缩编湘军，林修梅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袁世凯帝制覆灭后，段祺瑞夺取了北京政权，继承袁的衣钵，解散国会，废弃《约法》。为了反对段的军阀专制统治，重建民国，孙中山率领驻沪海军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护法。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段祺瑞为了控制湖南，派其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想以武力夺取湖南，为“兵下两广，饮马珠江”打开通道。孙中山委派程潜等国民党骨干到湖南活动，推动护法斗争，为北伐开辟道路。谭延闿在下台之前，曾在署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付傅良佐督湘问题。会上，陈复初首先表示迎傅，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独林修梅义正词严，挺身反对。并在当日退驻衡阳，控制南北交通，扼守战略要地。

九月九日，傅良佐抵达长沙，十三日就发表命令，撤销林修

梅旅长职务，派邹序彬接替；调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回长沙，另委陈璈章接替。同时，暗嘱驻守岳阳的北洋军两个师准备南下长沙。

在这南北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扼守衡阳的林修梅当机立断，与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密谋起义。九月十八日，刘、林毅然宣布独立，通电全国，严正表明起义宗旨：“誓不肯附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①、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

衡、永独立，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起义军控制了湖南二十四县境，声势浩大，震动全国。孙中山于当天发来电报，深表支持。云南、四川、广东、贵州等省相继响应。段祺瑞坐卧不宁，一面派兵“剿抚”，一面褫夺林、刘两人的官职，予以通缉。傅良佐在长沙戒严，通电声讨林、刘，指使一些湘军首领“劝导”林、刘取消独立。但是林修梅、刘建藩毫不动摇，坚守衡阳，严阵以待。

傅良佐派去接替林修梅旅长职务的邹序彬带着参谋、卫兵到达衡山附近，参谋乘船到樟木市，见兵荒马乱，知道林修梅已树一帜独立，并悬赏五千元缉拿邹序彬。邹吓得逃回长沙。^②九月十九日，傅又派第一师代理师长（师长赵恒惕称病）李佑文带兵开赴衡、永，相机“剿抚”；第二师开赴湘乡、宝庆，作为后援。李命第一团团长梅卓敏打前锋。部队于九月二十一日出发，二十六日下午抵达距衡山二十里之石桥铺。此时，林修梅已驻军县城北十里之板桥铺，注意作湘军的工作，提出“湘军不打湘军”的口号，感召了前来“剿抚”的一团三营营长张振武及其所属官兵。二十

① 随孙中山起义的海军。

② 1917年9月28日长沙《大公报》，《邹旅长往返衡阳记》。

七日午后作战时，三营官兵在衡山石湾哗变起义，同炮连、机枪连一起，把从湘江运来攻打衡阳的枪炮、弹药从船上卸下来，投奔林修梅的部队。林修梅、李仲麟于九月二十八日乘势进据衡山。

傅良佐见出师不利，九月二十八日急令北军南下衡阳，任命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共计三万多兵力，压向湘南。林、刘仅有五千之众，而且装备较差，靠将士的义勇和人民的支持，抗拒强敌。十月六日，林修梅在衡山北面的西倪铺（湘潭县属）迎战八师十五旅王汝勤部。起义将士因寡不敌众，十一日退守贺家山一带。贺家山是衡阳的屏障。十五日，北军以猛烈炮火轰击，轮番冲锋。林修梅带领三个营由洪罗庙向北军四旅周诗部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连克护湘关（湘潭与衡山交界处）、白果（衡山县属）、南冲铺（湘潭县属）。十六日，战况激烈，扼守贺家山的零陵镇署参谋长兼江道区司令黄岱阵亡，衡阳陷落。二十日，宝庆失守，整个起义军处于不利状态。为了扭转战局，林修梅率领部队从左翼袭敌之后，在衡山县高眉山歼灭北军八师十五旅王汝勤所部千余名。二十四日，在贺家山击败王军。北军退守永丰。时中路南军与北军相持萱洲河，弹尽兵疲，几不能支，赖左翼大捷，反败为胜。敌怕截断归路，乃退。南军乘胜追击，北军仓卒应战，商震部也参与阻击。林修梅亲自督阵，左股受伤，仍坚持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南军官兵无不以一当十，采用麻雀战术，忽聚忽散，时东时西，变化莫测，使敌方捉摸不定，疲于应付。十月三十日，收复宝庆。接着挥师北进，收复衡阳。王汝贤、范国璋在护法军的追击下，于十一月十四日通电请求停战议和。傅良佐见大势已去，当晚从长沙偷偷溜走。护法军乘胜追击，直下湘潭、株洲，十一月十九日攻占长沙。二十一日，程潜、刘建藩、林修梅等进入长沙，受

到各界人士欢迎。

北军溃退到岳阳一带以后，赵恒惕由右翼略通城，林修梅率队从正面逼岳阳。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开始，林修梅率兵猛攻，破西塘、箴口等处。湘桂联军并力前进，北军三个师见南军锐不可挡，于一月二十六日火烧岳阳，弃城逃窜。二十七日，林修梅等进占岳阳。不数日，北军悉败退鄂境，湘境全由南军控制。

湘桂军占领岳阳后，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与程潜权利之争愈趋激烈，竟以总司令名义严禁联军入鄂。北洋政府趁此机会，集中优势兵力，于三月十日分两路进攻湖南。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有曹锟的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肖耀南三个旅、张敬尧的第七师，还有海军五艘兵舰助战，由湖北南下，正面攻岳阳；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由江西进攻湘东。曹锟手下的吴佩孚率兵向岳阳逼近的时候，谭浩明釜底抽薪，把桂军撤回广西。湘军士气受到影响，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林修梅、刘建藩等率湘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七日被迫撤离岳阳和平江。三月二十六日又撤出长沙，退守衡阳、宝庆和攸县、茶陵一带。北京政府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四月，北军分三路进逼南军，永丰、衡山、宝庆、攸县等地先后失守。

四月初，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在衡山举行军事会议。商定由程潜、林修梅居中路，正面牵制北军主力吴佩孚的三个师，让赵恒惕、刘建藩率湘军主力向东，抗击张怀芝部队，攻打薄弱环节。四月下旬，程潜、林修梅率部逼守耒阳、郴州一带。刘建藩在攸县附近发起进攻，勇克攸县、醴陵、株洲。前锋逼近长沙，张敬尧十分惊慌，派第七师和奉军一部阻击。刘

建藩中先鋒營迎戰，雨夜搶渡白石港，不幸落水陣亡。湘軍頓失大將，趙恒惕畏縮不前，戰局突變。湘軍轉勝為敗，退守茶陵。北軍在株洲、醴陵一帶大肆劫掠燒殺，所到之處，一片焦土，滿目瘡痍，淒慘之狀，目不忍睹。

五月十五日，林修梅率部退出祁陽，轉戰湘南，駐軍酃縣，南軍與北軍相持在耒陽、永興間。北軍損失也很大，內部派系傾軋，軍無斗志。吳佩孚只得與湘軍劃界停戰。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雙方代表在耒陽簽訂停戰協定。

林修梅在湘南酃縣一帶駐軍年餘，注重軍紀，不許士兵妄取民物。兵站弁某，詐取民財數千，林修梅發覺後，即予正法，威震全軍。針對舊軍隊被軍閥操縱的弊病，他著《精神講話》一書，強調軍人要有愛國觀念，不要為野心家利用。他還捐俸助立小學，興辦公益事業，地方安寧無事。一九一八年末，廣州軍政府鑒於林修梅勳勞卓著，特授他為陸軍中將。

一九二〇年春，林修梅因長久操勞，積勞成疾，感染肺炎，多日不愈，到廣州就醫。三個月後，病體康復，準備回到湘軍。譚延闓為了控制湖南，明里暗里排斥進步勢力，借林修梅治病為由，名為派林任駐廣州軍政府的湘軍代表，實際是削其兵權。

是年秋，原常澧鎮守使王正雅的儿子王育寅，因報殺父之仇，在慈利起兵反譚，派人赴孫中山處聯繫，並聲言有討桂軍除粵患之意。孫中山即派林修梅赴湘西王育寅處“察看助理”，“肩此重任”^①。林修梅回到湘西，聯合湘軍，訓練軍旅，積極開展援粵討桂的鬥爭，並同王育寅具體商訂了軍政計劃和行動綱領。王認為林修梅的政治、軍事才干高明，於十月初通電西南各省，推舉林

^① 《國父全書》第854頁。

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通电指出：“护法前途，险象环生。兹征得本军全体官兵同意，决定将本军改为靖国军，推林公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主持一切。林公为衡阳首义元勋，威望隆重，……”通电还公布王育寅为常澧靖国军司令兼代常澧镇守使，贺龙为靖国军第三团团长。

这时，桂系军阀破坏护法，攻打粤军，湘西靖国军在林修梅、王育寅的带领下，向湖南军事当局提出了假道援粤打桂军的要求。谭延闿怕得罪桂系军阀，一方面火速电请孙中山召回林修梅，一方面以赵恒惕的名义通电声讨王育寅^①。

孙中山为了支持林修梅，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给湘军总指挥及其所属旅、团营长发出通电，申述林修梅“就职^②以后，复有攻桂之通电。湘中民气，素有激昂慷慨之称。林君起义衡州，艰难百战，今矢勇于讨贼，登坛誓师，……望赞此义举，毋使林君为其难”。

为了打开援粤的通道，林修梅、王育寅在占据大庸、慈利后，由王育寅亲率部队两千、梭镖队五千进攻常德。当探知刘叙彝兵分两路防御，一在桃源一带，一在常、慈交界处的盘龙桥、热水坑一带时，林修梅根据刘兵分力弱，战线过长的弱点，率部队以全力向盘龙桥方向进攻，自十月十三日起，连战五日，占领石板滩、缸市（均常德县属）一带。十七日黎明，靖国军抵常德城下。王事先派人运动常德城内军警若干作为内应，因谋事欠密，水警署长等八人被刘叙彝部捕杀而失败。当日从水上奋勇攻城不克，十八日再猛攻一昼夜，又不克，十九日上午，敌援军至，靖国军遭

① 1920年10月20日长沙《大公报》，《赵师长等声讨王育寅电》。

② 指靖国军总司令。

到常德守军刘叙彝部和援军李蕴珩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向桃源、慈利方向撤退。

战争从十月中旬延续到十一月中旬，双方各有胜负。后来谭延闿又调旅长唐荣阳、宋鹤庚、常澧警备司令卿衡等部左右进逼，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王育寅在大庸失守后出走。林修梅率领一支部队继续在湘西活动，改称湘西讨桂军，自任总司令。不久，被调到广州军政府任职。

林修梅一生热爱祖国，勇于追求真理。在二十余年戎马生涯里，曾写过不少关于改造军队、改造中国社会的著作。特别是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开在国民党内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向往中国能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林修梅在一九〇九年进军西藏抵御外患期间，先后写过《西藏游记》、《治藏策》，阐述了治理西藏、防止外国侵略者染指我西南领土的主张。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五年流亡日本的艰难岁月里，仍然关心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写了《中国交通政策管见》一书，还译有《欧洲财政经济》等书数种。可惜这些著作及译著因经年战乱，都已失散。这对于全面研究林修梅的思想，无疑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护法”运动失败以后，林修梅总结历史经验，回顾自己追随孙中山等进行民主革命的历程：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反袁护国，国家政权仍然为北洋军阀掌握着；护法斗争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而且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林本人在首义衡阳以后，转战湖南，浴血奋战，仍然不能为孙中山打通北伐的道路，最后，不得不离开湖南。痛苦的经历，使他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救不了中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林修梅在“五四”运动前后，阅读

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阅读了马克思的一些原著，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这时，林伯渠在广州军政府任参议，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于一九二〇年底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情同手足的林氏兄弟，常在一起谈论国事，林伯渠的思想转变，对林修梅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一九一八年起，林修梅先后发表了《精神讲话》、《社会主义的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等讲演和著作，提出了《战时财政计划草案》、《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这些著作约计四万字，由林伯渠珍藏保留，并在林修梅病故后四十九天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日在广州编印成《林修梅遗著》一书，得以留传于世。

林修梅在一九二〇年前后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说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来改造中国军队和中国社会的观点及主张，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是极少见的。他还想“往游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参考。其希望理想实现的心事，至为挚诚而迫切。”^①后因病重，未能果行。曾与林修梅相识二十载，同患难亦十余年的程潜，对林修梅的评价是：“马克思学说乃为其思想之主干。其志愿在改造军队之精神，而后以之为改造国家社会之武器。申言之，即欲使中国军队与中国出现一种最新式最合理而为现世国家所尚未有之局面。”林伯渠在《林修梅遗著》的跋中写道：“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往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

在军阀混战，列强入侵，灾难深重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挫折的时期，林修梅的这些见解与主张，对启迪人们思考

① 林伯渠在《林修梅遗著》跋中语。

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对于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实施，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一九二〇年底，林修梅到达广州。次年二月十八日，被军政府聘为顾问、国民议会参议员。五月五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林修梅被委任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

林修梅在任代理参军长期间，正是思想激进，经验丰富的時候，他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军，运筹帷幄，共济时艰，正要把自己对军队、对社会改革的理想付诸实现之际，竟因牙病误于庸医，感染骨膜炎症，牵及全身，于十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在广州中法韬美医院逝世。时年仅四十二岁。

林修梅是位精明强干，不谋私利，忘我工作的人。他生活简朴，起居服御如寒素，治军十余年，未尝以家私田产为念，临终前，犹问孙总统出巡日期，谓：“孙公以六十之年，不惮跋涉，吾侪何可即安病少闲者？当兼程往。”那知一小时之后，竟与世长诀！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报道林修梅病逝之消息后，指出：“至于才能的高超，性情的淡泊，在近时军人中尤谓绝无仅有。……值新机正待发展之时，失掉了这样一位深有觉悟的有力人物，真堪为民国前途痛惜。”

对林修梅的逝世，孙中山异常痛惜。治丧讣告通电称：“林公从戎廿载，为国勤劳，辛亥、丙辰覆满讨袁，俱建奇勋。六年护法之役，首义衡阳，身经百战，尤著殊勋，尽瘁国家。一疾遽终，同深悼痛。”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孙中山大总统发布命令：追赠林修梅为陆军上将。国会非常会议还议决为林修梅举行国葬。十二月十八日，在广东省议会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大总统代表程潜，各部总、次长、国会议长、参谋长、市长及军政商学工农各界、国

会议员，在广州的国民党员陆续赴祭，到会者逾万人。程潜代表大总统孙中山宣读祭文。并向与会者每人分发《林修梅遗著》一册。追悼活动从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为止。

林修梅的棺槨从广州经上海运回长沙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举行回葬典礼，安葬于长沙岳麓山。石碑上刻有“林公浴凡之墓。”



记北伐军勇将龚宪

彭铭鼎

龚宪，别名龚昌。湖南长沙人。

我是在一九二六年秋认识龚宪的。当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副官长，我在师部当候差员。不久，他改任第三团团长。从此，我一直跟随他，历任连附、连长、营附等职。他任第四十军教导师师长时，我是师特务连连长，目睹他在北伐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在鱼台以身殉国的壮烈情景。现述其梗概如下：

首战告捷，勇克九江

一九二六年秋，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自湖南澧县出师北伐，过洞庭，渡湘江，经修水，协同友军在马回岭进攻南浔路上之敌孙传芳部，龚团为左翼迂回部队，在德安县的双山附近完成战斗准备，于十一月三日拂晓前出敌侧背，袭击敌人炮兵阵地，敌仓惶败北。是役缴敌枪支百余，迫击炮多门。马回岭首战告捷，龚在北伐中初露锋芒。

马回岭战斗结束后，独立第二师即沿南浔路追击残敌。龚团长首先召集各营营长布置任务，命令急行军，要求全团官兵发扬革命精神，敢于冲锋陷阵。说罢，命令部队火速出发。沿途有不少三五成群的溃兵。我团战士纷纷丢掉湘造枪，换上从溃兵手中缴获的北洋军枪枝。龚团长命宣传队叫敌溃兵转回马回岭，不得

混在我团队列里行进。

从马回岭到九江，路约百里，行至半途，将近午夜。有的营、连长要求宿营，次日天明再前进。龚团长令部队沿途驻足，就地取水，赶用晚餐。同时召集营、连干部讲话，勉以振奋精神，出奇制胜，一定要在拂晓前打进九江。他说：“这次行动可能有两种结果，如果我们能在拂晓前攻入九江，就可操必胜之权；倘若现在停下来休息，到明日再前进，则马回岭溃散之敌必将先我入城。这样九江之敌了解到我们是支小部队，即将主动迎击我军。敌众我寡，后方无援，我团就有覆灭之险。在此生死关头，望大家同舟共济。”团长言罢，大家一致奋起，向九江强行军。不到破晓，部队抵达距九江仅五华里的黄土岭敌军阵前。此地有敌军一个旅。这时，我独立第二师主力正与南浔路上敌人主力激战于沙河赛湖桥。九江为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部所在地，敌未料到我从庐山脚下的小道而来。龚团长趁敌不备，命先头部队立即投入战斗，以锥形阵式从敌之中央突入，逐渐扩大战果。仅几十分钟，敌即全线崩溃。龚团长率领尚未投入战斗的第一营直扑南浔车站、码头，并告二、三营迅速集合跟上第二营向市区扫荡；第三营保持机动，向湖口方向戒备。驻九江的孙传芳总部机关、部队已乱作一团；车站、码头一带散乱的敌军官，拖儿带女，争相逃命，丢下的行李、武器遍地都是。这时，车站西南几座坚固建筑物里的敌军还在据险顽抗。龚团长亲率第一营及第二营一部强攻，不克，再诱攻，也未奏效。孙传芳躲在九江军舰上企图挣扎，不断向岸上开炮；车站及城内残敌也不断反扑。龚团长一面令一、二营反击，一面令三营派一个排，将黄土岭敌军扔下的大炮拖到江边，向敌舰猛轰。同时，我团一营组成敢死队乘黑摸进敌据点猛掷手榴弹，终将负隅顽抗之敌击溃，城内其他残敌乘夜逃跑。在我炮火

轰击下，敌舰也顺江而溜。敌之心脏阵地一溃，全线立即土崩瓦解。拥有东南半壁的五省联军，从此分崩离析了，时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龚团继而扫荡九江租界，俘获所有躲在租界的敌军官兵，对外国人也曾一度监视。第二天下午，我后续部队、独立第二师第四团紧接茬也开进九江。这次战斗俘敌数千，敌人丢弃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堆积如山。战斗结束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九江车站单独接见龚团连附以上军官时，大加慰勉。并说：“龚团长堪称英勇善战、出奇制胜的楷模。”

攻克南京，俘敌万余

独立第二师攻克九江后，追敌至赣、苏交界处休整，扩编为三个旅。龚团仍为第二旅第三团，在浮梁县休整三个多月。这期间，龚团长时常出现在操场上，督促官兵勤操苦练。并常召集各级干部，就沙盘地图联系战例，讲授战术。他十分强调兵贵神速，势险节短，侧面一兵胜过正面百兵等用兵方法。至于正面进攻，他强调锥形战术，缩小断面单位。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诫官兵说：“光打败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击溃敌人后勇猛穷追，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龚团长初来贺师，官兵对他并不信赖。经过马回岭、九江两战，加上他平时的教导，大家都认为在他手下打仗，无坚不摧，无攻不克。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独立第二师自浮梁、彭泽、马当地区出发，沿祁门、芜湖顺江而下，于三月二十一日与褚玉璞部于当涂朱门镇遭遇，激战一昼夜，未决雌雄。担任主攻的谷正伦旅伤亡很大。贺耀组令原为预备队的龚团于二十二日拂晓投入战斗，从敌右侧插入敌后，同时主力从正面发动猛攻。龚团侧击敌之右翼，敌增援反扑，战斗至为激烈。该团二营营长

陈英阵亡。团长令三营插入敌援部队侧后，两面夹击。敌人全线崩溃，龚团长身先士卒，率部奋勇追击。敌人企图在距南京不远的牛首山占领阵地，继续顽抗。龚团乘敌立足未稳，猛打猛追，敌不支，再逃。龚团乘胜尾追，于当日暮逼近南京上新河，敌企图北渡未果。龚团长连夜展开全团，压敌于江边，最后全部缴械。该敌为山东第五师，有几个步兵团，另有骑兵、炮兵各一团，人枪万余，全部俘缴，仅敌师长漏网。这一胜利，使北洋军阀胆战心惊。张宗昌气急败坏，怒斩了毕庶澄。

鏖兵六合，力挫顽敌

自九江、南京两次大捷后，独立师声威显赫，扩编为第四十军。龚亮升为该军第二师副师长，仍兼第三团团长。

五月，四十军以上新河附近强渡，继续北伐。其主力沿津浦路北进，与张宗昌部队战于乌衣东西地区。龚团受命拒阻六合方向的孙传芳部，掩护本军主力右侧，任务至为艰巨。因孙传芳自江西失败后退到镇江、扬州一带，在长江南北休整。我军渡江讨张，孙必乘我半渡，给予侧击。果然，龚团自浦镇向六合方向前进，为求获得广阔地域，以利回旋，刚抵大厂以北、六合西南地区，即被孙传芳部两个师和一个旅兵力的包围，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龚团长见敌人来势凶猛，乃逐渐调整部署，以营为单位，依村落构成据点。全团阵式成为倒品字形，互为策应，不断对敌进行短促反击（旧军事术语，谓之递袭）。敌以雨点般的炮火轰击龚团，官兵伤亡甚大。龚团长沉着坚定，哪里告紧，即带警卫班到哪里顶住。并不断以小部队递袭牵制敌人，真是指挥若定。奋战至次日午后，援军赶到，合力击溃敌人，终于赢得了胜利。

龚团经六合苦战后，减员颇多，上级要求留在南京整补。龚团长坚决要求立刻补充，参加主力军继续追歼残敌。以后沿津浦路长征北上，曾一度到达山东峰县，所向无敌。终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四十军不久奉命回师江南。

血战鱼台，以身殉国

一九二七年冬，北伐军又曾一度扩编，龚升任第四十军教导师师长。该师辖第三、八、十一团。教导师的参谋长和参谋处长由从山东第五师俘虏的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充任，可见龚师长能任人唯贤。全师经过整顿，士气大振。

一九二八年春，四十军继续参加北伐，属第三军团战斗序列。在徐州稍事集结后，于四月七日开始向徐州西北、微山湖以西地带战略跃进。教导师以戒备行军状态，经敬安集、丰县向赵庄以北推进。左为四十军第三师，右为夏斗寅部，当面之敌为孙传芳残部主力，沿鱼台旧城基筑有工事。教导师的进攻部署是：第三团为进攻部队，第八团为师预备队，第十一团另有任务，未参加这次战斗。师的主攻重点是鱼台旧城基，于十五日拂晓发起猛攻。龚师长亲自督导第三团的第二、三营进行主攻。第二营集中兵力，似尖刀般地插入敌阵，进行割裂。营长周保生率部几次冲入敌阵，展开肉搏。因敌人阻击猛烈，官兵伤亡很大，周营长也阵亡了。敌一部跃阵而出，来势颇凶，龚师长急令肖团长指挥第一营第一部（即团预备队之一部）进行侧击。敌人在我强有力的交叉火力下，生还无几。随后，第三营的攻击亦复受阻。敌又从该营正面出击，肖团长及该营营长皆受伤。师长速令第二营营附指挥战斗，令师特务连转锋侧击第三营正面之敌。我对师长说：

“请师长使用第八团吧！”他严肃地说：“师预备队第八团，我要用

于追击，扩张战果，活捉孙传芳。你当连长的怕死，由我来亲自指挥好了。”说罢就走，我只得跟师长协同第三团预备队，即第一营之大部，在师长亲自指挥下向脱阵而出的敌人猛攻，反复冲杀，伤亡颇大。龚师长右臂中弹。在包扎伤口时，我劝他转移后方休息，他笑着说：“才为国家流这点血，就临阵退缩吗？”说完，他站起来就走。敌人在我猛烈攻击下，向原阵地龟缩。龚师长见战局扭转，出现突破良机，仍亲临第一线，督促特务连接近敌阵。用二十多挺轻机枪密集射击，掩护步兵前进。双方以自动火器、手榴弹相互轰击，硝烟弥漫，振耳欲聋。龚师长挺身高呼“向敌阵地突入……”，不幸他声犹未已，头部即中敌弹而倒地，血如泉涌，停止了呼吸。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北伐将军，壮烈地为国捐躯了。

龚师长遗体运回南京入殓，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根据其遗孀李春航女士的愿望，安葬在长沙岳麓山。

梁 煥 奎 事 略

梁漱溟

謹按：笔者我原名梁煥鼎，和梁公煥奎为同高祖的兄弟行。他的曾祖父与我的曾祖父是亲兄弟，原都家居广西桂林。大约在清道光末年、咸丰初年（约公元一八五一年后），以避乱先后北游。他的曾祖父一家人，路经湖南，就在湘潭落户。子孙辈便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父则入京会试成进士，宦游北方。我的祖父和父亲，均以桂林籍贯先后在北闱得中举人，从而一直沿袭说为广西人。虽然两地分居，却信息常通。一九一七年，我且曾入湘奉访。一九一八年，公更以避兵北来，即聚居我家中，时常叙谈往事。今为此文，大都依据公之口授而来，但难保无疏失。或失在公记忆不清楚，或失在我的记录不明确，大有待于治近代史者采访时加以勘正之。一九八一年九月，梁漱溟识。

梁公煥奎，字璧元，一字辟园。生于公元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自幼读书好学。十六岁随父宦游南京，常从邓白香先生学诗。此后雅好吟咏。晚年有自订《青郊诗存》付印。公盖尝于长沙浏阳门外筑有青郊别墅居之云。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公十八岁，得中秀才。一八九三年公二十四岁，分试得中举人，更见才华，有志事功，而此时恰是国家危难之秋。甲午（一八九四年）

中日大战挫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在朝野激起变法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固风动全国，而首屈一指必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倡导于上，地方士绅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多人鼓吹于下，宝箴之子陈三立介居官绅之间，沟通合作，相得益彰。成立南学会，发展及于全省各地。又开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其后卓有成就的人物，如蔡锷，如范源濂，均常受业其间，真可谓极一时之盛。而在当时，那许多新政设施和社会活动中，辟园公盖都直接间接参预的。例如，兴办新式教育，则受任学务处文案；兴办工矿实业，则受任矿务局文案（后升任提调）。一身兼数职，职位不高，而事属首创，多所辟划。其先受知于陈公宝箴，而其后任俞廉三、赵尔巽两公亦复加倚畀之故。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国几不国。谋国者群趋于出洋考察留学一途。公则建议于省当局，就乡试落第许多试卷中选拔其间可造人才派赴日本留学。此事既为当局采纳实行，即囑公经理其事，任为留日学生监督，率同所选拔诸生东渡，时为一九〇二年^①。其后，公赋诗曾有“四载浪游三去国”之句。此应是第一次去国。

公此次所率同东渡者，计有杨昌济、陈天华、刘揆一、石陶钧、朱德裳等多人，而公胞弟焕均、焕廷一并从行。盖公昆仲五人：公居长，其次焕章，字端甫；三弟焕彝，字鼎甫；焕均其四，字和甫；焕廷其五，字硕甫。诸弟以公之教诲提携，各有成就，而在事业上又是协同努力的。

当时，清廷为求人才以济时艰，有诏举办经济特科。湘省当

① 据朱德裳（师晦）《癸卯日记》卷首载：“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为日本之行。”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即一九〇三年二月。

局即荐公应征。公亟返国入京赴试。经录取后，命以特用江苏知县赴南京候补。于是，公携眷离湘移家南京。江苏省当局委任公为金陵火药局提调。今据公当时寄三弟鼎甫家书，颇叹息于官场之腐败。又自言：“两目昏翳，寻丈之外，不复能辨人眉目，遍求中西医莫得收效”。公双目失明，盖肇始于此时矣。曾有意东渡求医，而阻于日俄海战（一九〇四年事），一时未能成行。公自度对于夙昔所经手之学务和工矿实业，犹可从旁致力，遂即返湘。此后，公为病目而亟需求医东渡，又不能忘情湘中建设事业而留滞国外。约于一九〇五年去国外求医，翌年夏，由日本返回长沙。此时，双目失明已是定局，而公之年，方三十九耳。

如众所知，当时国人激于国难严重，既有康、梁倾右的君主立宪一派；又有孙、黄倾左的暴力革命一派。两派活动，多集于日本东京。而公盖三度旅游其间，处此问题之态度如何乎？公昔日旅东言行，今无可考。然其在湘亦有几件行事，可资旁证：一是公常因周道腴（震麟）先生困于南洋某埠，即以二千元相资助。此一事，一九五〇年周老在北京曾亲口为笔者言之。又一事，一九六四年三月，笔者曾闻章行严（士钊）先生谈及，昔年公主持长沙实业学堂教务，聘张溥泉（继）等诸先生为教员。章本人亦在应聘中；公发现他年轻，劝他宜求学深造，不必当教员。他接纳忠言，遂即东渡求学云。于兹可注意者，周震麟、张继，皆革命派著名人物。公既与之为缘矣，则公未尝倾右而拒左可知。

凡熟知清季汲汲奔走救国那许多人物事迹者，都晓得其间倾左倾右初未尝判然两途。孙中山先生不曾上书李鸿章乎？不曾与梁任公交往洽谈合作乎？又如唐才常，既曾在长沙热心维新运动于前，卒乃以投身暴动而被杀于后。类此事例不胜举。当然，末后此两派是水火不相容的。但若认为根源在阶级立场各不同而

来，则昧于中国社会之组织结构，不衷于事实之谈，终且无以自圆其说。

旧日中国，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局面。士、农、工、商四民，贫富贵贱，上下升沉不定，流转相通，阶级分化不明不强。海通以来，资本与劳工两阶级，乃渐萌见于一些工矿企业间。其起因：则洋务运动意在为国兴利，而落于剥削劳工遂无可免者。辟园公五兄弟，以经营华昌铋业公司起家致富于一时，即为此事例之一。其事未容殚述，却必扼举其要。于此，言其端要有三：

（一）一九〇八年，华昌铋业之跃然兴起，盖原于购得法国赫伦士米提炼纯铋的新技术。而此事则公之三弟鼎甫游学欧美寻访接洽以成者。公于双目失明后，一意培植诸弟学业，俾共成其业。诸弟资质个性不同，二弟端甫忠厚稳重，则以任板溪驻山经理，督飭工人群众；三弟鼎甫勤恳好学，则以出国求取技术新知；四弟和甫治事精干，才略不凡，则以任公司总经理；五弟硕甫年轻，通习英语，则以任驻美国办事处，掌握国际贸易情况（此职其后由姻戚李国钦继任）。

（二）价购法人炼铋新技术所需巨资，则全赖当时江南、河北、湖广、山东各省当局大力协助以成其事。而奔走联络其间者，则公之挚交杨皙子（度）。华昌既从国外购此项专利权，特呈请当时清廷立案予以保障。而其后业务发达，获利丰厚，则在清帝退位转入民国之时。但为报偿前此各省协助款项，特以二十五万元缴交中央农商部为调查各省地质经费。凡此用心行事，在官在商，皆有为国兴利之意存乎其间。不犹是当年维新运动之流风余韵乎！

（三）华昌公司走上西洋资本家经营企业之路，而好景不长，

趋于衰败者，其内外原由复杂多端。铤价始因一九一四年欧战军需而上升获利，公司方在投资大事扩充各项工程设备。而不料想战争息止，铤价遽跌，自陷于困境。又所委任之驻美经理，窃权巧图私利，而以跌价亏损归之公司。至于湖南适当南北交战要冲，其所受各方勒索、时局纷扰之累者，又不待言。辟园公昆仲，原是中国式的书生，不是西洋资本家一路人。其劳倦思退，有必然矣。

公病目失明后，行动不便。而时局颇多扰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曾避兵宁乡，迄于一九一三年始还长沙。一九一七年，复以衡山北洋军溃退而避乱汉口市区。翌年即携眷北上，聚居在我家中。一年后，始返湘安居。又于一九二八年出游沪上，漱溟适亦因事从广州抵沪，幸得一聚。不意次年公游息庐山小天池，遽尔逝世，享年六十有一。遗囑殓以僧人服装，盖公精神上皈依佛法非一朝夕。早在一九一八年京寓时，常囑漱溟共诵读楞严经以为日课者，曾一月有余也。公配曾夫人，与公伉俪甚笃，先三年（一九二六）既故于长沙。夫人所生唯二女，长培肃，次培悌，皆聪明好学，顾未有子。一九〇九年春，三弟鼎甫新举一子，公夫妇即引以为嗣，命名培伟，由夫人鞠育之（其后，鼎甫又有丧明之痛，遂由培伟兼挑）。今者，培伟既成立矣，其立身行事，不负先世令名。

左宗澍小传

左宗濂

左宗澍，字霖苍，长沙县人，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出生于长沙县大贤都常家冲坝上屋。祖父雋，清道光丙午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山西按察使。父辅，附贡生，历官河南省上蔡、封邱、西平、淮宁等县知县。

左宗澍幼年随父任所就学，弱冠钻研文史，尤醉心于康、梁变法之各种新书。光绪庚子、辛丑并科，改试策论，左得中北圻举人，以内阁中书派赴日本，入法政大学习政治经济。回国后，任清政府度支部库藏司长。一九〇七年因父丧返湘，一九一一年与黄钊、左学谦、常治、文斐、曹耀材诸人组织长沙自治公所。农历九月初一长沙光复，湖南都督府成立，左宗澍任民政司总务科长。一九一二年五月，长沙自治公所同人倡议创办自治女校，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推左宗澍为校长。一九一五年长沙商务总会改组，各行业会董推选左出任会长。在职期间，筹办湘省工农产品参加美国主办之巴拿马赛会，湖南绣品、瓷器、茶叶、夏布、鞭炮等特产，皆誉满海外，获金质奖章多枚。旋又创办长沙光华电灯公司，并协助长沙炼矿公司运砂出国，争取国际市场。

左宗澍在长沙商务总会（一九一七年改为长沙总商会）任职期间，湖南兵祸正烈，南北交哄，商民苦之。左会合绅商，维护

市场，竭尽心力。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阀大举南侵，张敬尧、吴佩孚率领重军，进据长、岳、衡、宝，与郴、永湘军对峙。而张敬尧兄弟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左宗澍弃职赴沪，与章士钊、聂其杰、袁家普、陈凤荒、胡子靖、朱剑凡、汤寿潜、傅君剑等人在沪成立湖南善后协会，创办《天问》周刊，成立南北请愿团，与省内外人士互相策应，发动驱张运动。嗣后谭延闿、赵恒惕相继主湘。事楚事秦，党争日亟。左宗澍不愿介入，退出政界，专心办理光华电灯公司及华昌炼矿公司等实业。

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兼主湘政，将湖南第一纺纱厂收归公营，委左宗澍为厂长。

一九二八年，左宗澍参加北伐，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采矿处长。大军进入冀鲁，陆续接管河南焦作、山东临清、枣庄、河北磁州、正丰、开滦各矿。或维持其秩序，或便利其运输，或解决其劳资纠纷，或禁制其军队骚扰，使各矿皆能正当经营。次年，转任开滦煤矿督办。矿本中英合资，主权操之于外人。左遇事据理力争，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工人利益。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左回湘家居。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年事日高，就养迁居江苏常熟。解放后，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一九六四年六月因心脏病不治，卒于寄寓。终年八十三岁。

左宗澍平生律己严谨。从政五十余年，每日皆有日记。凡读书治学，诗文尺牍，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战争胜负，年岁丰欠，商场盈虚，物价涨落，悉详记之。至于游迹所经，山川风景，道里远近，更历历如绘。数十年来，从未间断。章士钊先生曾在其日记前题词曰：“霖苍日记，视湘绮无其略，视越缦无其琐，视翁常熟、曾湘乡无其隐秘。视之史林，殆无愧焉。”不幸毁于十年动

乱，纸无片存，识者尤深惜之。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长沙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国语拼音专家黎锦熙

黎锦明

国语拼音专家黎锦熙，号劭西，祖居湘潭石潭坝乡长塘。据家人云，三岁识字不忘，四五岁成诵。七岁启蒙受学于长塘之段家屋庄塾师胡笔崖先生。课程参用西学，与从弟锦辉均以聪颖笃学见称。清末，长沙新学风气趋浓，中学、师范多已开设，两兄弟同时考入省立第一中学；终业后，又同时升学省立优级师范，兄史地科，弟绘画音乐科，概终其业。

民初，劭西受民主思想影响，喜论新学，与同里张平子（启汉）书信往来，都以民主改革为题，积书盈匣。长沙名士魏先朴先生者，首创开辟新文化，办宏文图书社，闻劭西昆仲议论，聘为编辑。问世者，各科书籍都有之。劭西兼授课史地于第一师范学校。未三年，北京友人闻其声名，荐于教育部塘审委员会任特约编纂员。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供职其间，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籍数以千计。锦辉与劭西同时赴京，初任众议院记室，以不习子政界，旋赴沪就中华书局之聘。

其时劭西赁宣外香炉营西横街四号住宅，邻居法官王氏，都以俭朴受称。劭西一家居内院，有余房，曰：“吾任职教育部，一身都是教育家任务。从兄妹数人，皆父松庵与母黄蕸抚养，多已终业于松庵自创之杉溪学校，弃其学则不知终极。吾当使数辈居今余房，以延其学。”

西横街四号对向，居户宛平王朴先生，亦教授名流，课余之暇，来劲西处，侈谈推行国语普及与国语注音字母拼音问题。其时国语注音字母拼音之推行任务已开端，首署者吴稚晖，领衔者八员，王朴（蕴山）在其内。遂渐次订正声母符号。共二十一声母，三十五韵母，前后陆续议成之。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间，劲西离教育部职务，并迁其庐于宣内西城机织卫烟筒胡同四号，除授课国语文法于北京师大国文系外，全力探讨注音字母之推行及京音问题之补充。聘张蔚如等任宣传工作，印字母表，并以汉字释其音，初学者因得其轻便。其时，劲西同事钱玄同教授悟此道之重，常来四号寓所究谈，乃涉及用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代注音符号的议案。悉力同意此举者，即赵元任博士。

议题渐久，意见分歧。赵博士以为“罗马字母，即英、德、法文之共同字母也，不如直接以英语拼音代之，简而便，学者一致弗累，何必繁絮哉！”然玄同教授闻之，怫然不悦，曰：“世上之事安有如此简便者！”遂来榆庐（即烟筒胡同四号）抨赵博士主张之非。劲西亦然之。

解放后，“拉丁字母及其拼音方式”的注音符号遂以确立，中央且决定，推行之法，必自小学教科书之语文课本始其教程。推行之后，学生的识字问题，可将死板记忆方块字的传统教学方法，一变而为以学习熟练之拉丁式注音及拼音法以识字。

今者，坊间各商品之中文拼音式，殆皆赵博士之拼音系统也，或以变更就范，或无变更。不变者，即赵博士之英语拼音方式也。

国语拼音及拉丁字式之拼音，劲西虽在一九三〇年间笃力推行不暇，但广其成者，自有其人，大体以悟性最强之教师为多。一九三〇年前后，劲西出动华北各省作巡回讲学，并随时发放学

习讲义，从学者多笃诚之士。其时劭西并印行《国语运动的商榷与发展过程》一卷于商务印书馆，专纪其事。

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国语文法》亦劭西代表著作之一。讲解文法不明之处，以图解解析之。虽然，其法皆西法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鸣钟之一也。

有其徒，自有其集体著作。劭西之徒所成的小字典，有助于青年补习，且能随中文版之书籍推行外邦，销数无夥。

一九五一年，予受华东区教育部差委之教师赵大深之召，为他代理福建师范学院工作，桌间有《学习辞典》。阅之，亦国语文法大师劭西为首之集体编著，半年间之成就，神速无比！予始知劭西大师平时兢兢业业，不废寸阴，今有助于新时代辞语之教学，诚难能而有异彩。

劭西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以教育界寄望之殷，于三十年代受任为北京师大文学院院长。解放后，任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大辞典编纂总主任等职，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谈论风生，语多恰切。

一九七八年，劭西逝世于北京。消息传开，知之者莫不涕泪沾襟。劭西自少习于简约，平居简出。近老，以宋、元、明理学之讽诵默识端其居止，愈益不苟言谈；不近其学者，以唯唯诺诺应之。通达世途，以至如此。

一九八四年一月于湘潭

（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坚持晚节，其乐融融*

朱伯深

先父朱剑凡病中时常深入浅出地将他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联系中国革命实践的心得，说给身边的儿女听。在讨论中，常援引毛泽东同志的话，喜欢说：“还是要照‘毛老爷’主张的做才行。”“毛老爷”是先父晚年谈话对毛泽东同志的昵称。他的上海寓所一直是他所认识的老革命战友们所信赖的联络通讯与会谈、休息的秘密点，因而时常迁易，以策安全。当时到过我家的，有地下党中央工作的同志：李富春、蔡畅、徐特立、何叔衡、石础（何老之女）、谢觉哉、李维汉、肖劲光、熊瑾玎、朱端绶、张唯一、董维键、周以栗、方维夏、柳直荀、龚饮冰、周毓明、曹伯韩、戴晓云、夏曦、凌炳、毛简青等。星期日，先父寓所总有同志们来下围棋、打麻将。先父看到这些同志在艰苦战斗中还可以轻松几个小时，总是乐不可支地亲自当炊事员，预备茶水。记得有一次，富春同志曾陪同聂荣臻同志来先父寓所作客，谈笑风生。当时党组织经常由李维汉同志与先父联系。最近李老听到我在写有关先父这部分的回忆录，特给我们兄妹来信（1979年11月9日），对先父晚年在上海的政治情况作了回忆。来信说：

* 本文系作者所写《我的父亲朱剑凡并略谈其创办的长沙周南女校》一文最后一段，特予补登。原作第一部分刊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

“那时党内许多同志也都回到上海(中央所在地)，谈及剑老时，对他有好评。那时间我和他往来，他曾提出申请入党问题，我表示他的愿望很好，可以向中央转达。同时希望他多看点马列主义书籍和我们党的宣传刊物(我给他看过党的刊物)，考虑成熟再正式提出申请，不幸他不久和我们永别了。”

一九三一年，为糊口计先父开了一个酒店。最初在上海旧法租界辣非德路，后迁沪东提篮桥旧公共租界东西华德路。不久先父胃癌恶性发作，进入旧法租界原霞飞路马浪路口刘之纲医师的申江医院，不久又转入宝隆医院。没有麻醉剂就止不住痛，终无起色，延至一九三二年春末去世。先父生前友好张唯一、董维键、戴晓云等主持丧事，安葬在上海公墓。葬毕，舅父魏肇文在《申报》上登了一则“代讣”，通告其他亲友。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上海，强将上海公墓铲平，改筑飞机场。幸得周南的学生周砥同志闻讯将先父的遗体移厝附近庙行。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先母在北京逝世，经领导批准，将先父遗灰运来北京与先母遗体同葬入八宝山烈士公墓。徐特立同志为之书立墓碑。张唯一同志一九三二年写了一篇悼词，在敌区白色恐怖下，我将原稿保留下来了。熊瑾玎同志一九五三年亲为书刻墓铭，铭曰：

“树植女校，肇公之业；拥护革命（原稿为“辨识群界”，一九五三年张唯一同志改为“拥护革命”），竟公之节；全公业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公已寄期望于嗣哲；物化歇墟，魂萦新国，公之精神其不灭。”

关于湘雅医学院史料的订正

凌敏猷

我所写的《解放前夕的片断回忆》一稿（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第232—243页），其中谈到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沅陵设立分院时，说：“后来日寇进犯长沙，附属医院和护士学校的人员及重要器材，均于事先向沅陵转移，但房屋和难以搬动的设备，则在‘文夕大火’中焚毁一空，至为可惜。”这里“文夕大火”四字系“日寇纵火”之误。“文夕大火”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自国民党军政负责人的错误措施；而湘雅院舍之被焚毁，则由于日本侵略军一九四四年从长沙撤退时的残暴行为。两者性质相左，时间不同。作为历史资料笔之于书，务必实事求是。

专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陈延年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俞兴茂

贵刊第十六辑《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三次回湘》一文中谈到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代表政治局向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时，说：

第二天上午，我在沈家大屋谢老住的房里见到了毛委员。……我当时曾问毛委员“您为什么又来了？”他说：“老头子（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习惯称呼）说，湖南问题弄得这样糟，要我负责。现在我就来负这个责。”我又问：“老头子为什么不干了？”毛泽东同志很风趣地说：“现在连他的儿子也反对他了（指陈延年同志在大会上当面批评陈独秀）。”上面的叙述清楚地含有陈延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其实在这次会议前，陈延年同志即已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辞海·陈延年》的叙述是：“陈延年一九二七年……六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牺牲”。在《历史档案》一九八二年第四期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陈延年同志遇害后杨虎致吴稚晖函》为题公布了他们馆藏的档案，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说：“我馆藏有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杨虎致吴稚晖函，谓业已将陈延年同志杀害。则陈延年遇害日期当在七月二日或七月二日以前。”从历史档案和《辞海》条目的介绍，可以判定，陈延年同志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或以前即已牺牲。如以社会上的另一种说法，陈延年同志牺

牲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的时间计算，他也绝不可能再出席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七八会议。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即查出席八七会议的名单中有没有陈延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中，陈列了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名单，其中就没有陈延年。李维汉同志对展出的名单中增加了一名刘吕群，仍然说明出席八七会议的名单中没有陈延年。但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中有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同志。作者很可能是将陈乔年误为陈延年。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48	例 2	二十七市尺	二尺七寸
49	18	五百一十八箱	十大箱
50	20	碇石湾	碇石湾
50	例 2	“联兴烟厂”	“复兴烟厂”
53	1、11、16、	马振春	王振春
53	16	左文虎	左文光
57	例 4、例 5	秦	寻
58	15	贵阳救护汽车	贵阳公谊救护队汽车
60	2.5	秦	寻
74	2	肖学悦、陈伯斋	肖孚悦、陈伯齐
74	3	土版书业	木版书业
74	注	肖学悦、陈伯斋经营过	肖孚悦经营过
75	9	叫细带	叫细纸
84	4	义由和	义和
84	例 3	煤炭	木炭
85	10	煤炭	木炭
86	17	基础	基数
87	1	本月下旬	本月中旬
87	2	二十多天	十多天
87	3	由然	自然
87	10	蔡勋	蔡小勋
87	11	经理韩安祥和叶南山	韩安祥的经理叶南山
97	17	丝条	丝缘
98	12	三百余元	三万余元
114	7.23	陈伯劬	陈伯勋
145	7	“黔靶靶”	“黔靶”
146	例 2	中庄	申庄
149	16	杈炳	杈柄
150	3	师札借	师札楷

续表

页	行	误	正
151	11	焚街	焚子
151	15	施	旋
153	19	日新昌	时新昌
157	17	意新綢庄	亿新綢庄
159	标题	鸿兴钱庄	鸿记钱庄
160	倒 3	法币一千万元	一百万元
163	6	“钱少爷”	“铁少爷”
163	10	糶照	糶紫照
167	12	陈甲三	程甲三
169	倒 7	冠湛	冠龙
170	3	逃难	逃离
179	6	三百年	三百多年
184	9	招进招出	抬进抬出
184	16	向卖方	向买卖双方
185	倒 1	湘潭药材的	湘潭药材行的
186	1	在店从业	在行从业
186	5	店里不给工资	行里所给工资较少
186	6	卖方客商	买卖客商
189	11	延寿寺	延寿亭
189	13	寺内	亭内

